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 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

蕭 瑶

秦嶺、淮河一線是將東北除外的中國東部季風氣候區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的天然分界線。南、北兩方的地理存在著明顯的分歧。歷史上南方曾相當長期地落後於北方，其自然環境、疾病以及醫藥衛生條件等因素與北上有何不同？所產生的影響為何？本文嘗試爬梳漢宋間的文獻記載以圖建立一初步的認識。

在古代醫學思想中，人與自然分別為大、小宇宙，彼此有一一相應之結構、組成部分及運轉的功能。而自然條件如水土、風氣等對人的健康、性情、智力、壽命等均有極大的影響。南土在古人的認識裡是土薄水淺、卑溼的地域；處在偏南的位置上，陽多而節候偏；而又多雨潮溼。與北方土厚水深，高亢爽壠；處於天地之中，陰陽相和；乾燥清朗大相逕庭。

在南方這樣的地理環境中，居民易於感疾，“丈夫早夭”。而這與在南土的自然條件中所孕育的各種“地慝”如瘴氣、射工、沙蟲等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南方居民在生產、生活、遊戲等活動中常有機會接觸南土的各種致病因素，而在飲水、糞便處理方面的不講求衛生以及信巫不信醫的習俗，加以醫藥的不足，導致南方人口多染疾病，早夭不壽。

南方的主要地方病有瘧疾、日本血吸蟲病、恙蟲病，以及絲蟲病等。溪毒、射工、沙蟲等病大致上就是今日的恙蟲病，但也可能包括了一部分的急性的日本血吸蟲病在內。

南土的地理環境及地方病、醫藥衛生等條件不但導致南方居民短命早夭、男子多疾長病，妨礙了南方農業或經濟的發展。也使得不具免疫力的南下北方人口，特別是戰士、戍卒以及民夫的大量染病死亡。這不但影響到對外戰爭、邊防和南方的治安，同時在兵役制度上，也不得不配合南土的自然環境來徵調土兵或南方土著民族服役。北人不願仕宦南土，導致南方不少地區職缺難補，行政效率不高，甚至不得不在某些地區限用當地人來任官，或形成了“南選”制。在國家財政措施上，也對南方“瘴鄉”特別照顧，即不施行酒榷制度，使瘴鄉居民能夠享有較廉價的酒來禦瘴。

一、引 言

由於中國的疆土幅員遼闊，東西、南北所跨有的經度、緯度都相當大，而各

地的地勢高下又頗不一致，地形也複雜多樣，因此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地理區域，各自具有其特殊的氣候或自然條件。

東北除外的中國東部季風氣候區，即青藏高原東部邊緣以東、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域，大體上就是兩千多年來華夏・漢族居住、活動所在的最主要的地盤。

對於這一區域，當代的地理學者常常認為秦嶺、淮河是將其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的天然分界線。¹其實，古代的人們對於這點，已有相當的認識，早在戰國秦漢之際即已如此。《周禮·考工記》說：“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明白地表示了淮水兩側的“地氣”不同。《晏子春秋·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²也清楚地指出淮河南、北的“水土”有明顯的差異。所謂“地氣”和“水土”，大致上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氣候或自然環境。東漢末應劭《風俗通義》說：“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凡俗也。”³其實，不論是俗說對，還是應劭的看法比較可靠；這兩種意見並不全然互相矛盾，反而是可以相互補充的。漢代這一法律當是有事實基礎爲依據的，否則自擇伏日與當地的氣候相齟齬就沒有意義了。然則漢帝國的中央已經深刻地認識到秦嶺之南的漢中、巴、蜀、廣漢跟秦嶺之北的地區在氣候以及植物生長季節上都存在著顯著的分歧。

其後，人們對秦嶺、淮河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的天然分界線講得更明確，儘管他們所揭舉的理由也許並不那麼重要、那麼充分。生長在淮畔的北宋著名文人

1 例如 George Babcock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pp.38-39。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 1934。又，竺可禎《中國的亞熱帶》一文也說：“我國亞熱帶的北界接近于北緯34度，亦即淮河、秦嶺、白龍江線直至東經104度”。見《竺可禎文集》，頁354。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林之光、張家誠也將“我國亞熱帶北界”定在“北緯33度的秦嶺、淮河一線”。見所著《中國的氣候》，頁308。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引文據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按《列子》、《說苑》等書或作“淮”，或作“江”字；而《太平御覽》等書引文亦如此。見該書，頁394，註11。

3 引文據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所輯佚文，見該書頁604。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張耒⁴就曾說過：“天遺清淮限南北。”⁵明代陸深《知命錄》也說：“寶雞南二十里爲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爲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⁶

秦嶺、淮河之南的地區，與北方相比，有較豐沛的雨量和更溫暖、甚至炎熱的氣溫以及更長的生長季節；絕大部分均屬亞熱帶氣候，其南部邊緣地帶則已進入了熱帶氣候的範疇；而北方則係溫帶氣候。⁷

《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⁸即指南方熱量富足，宜於植物的繁殖生長。雖然南方有比北方更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氣候條件，但在歷史上，除少數地區，如成都平原、長江三角洲等地外，南方，特別是嶺南地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始終是地廣人稀、比較貧窮的落後地區。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十分複雜的，疾病與醫藥衛生無疑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在北方相對地發展較高的情況下，由北方南下的人口經常是刺激或促成南方進一步開發的重要力量，而南方的疾病與衛生環境對他們的活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本文嘗試爬梳漢宋之間的文獻記載，以圖勾勒出南土自然環境的特色、南方特別猖獗的地方病以及醫藥衛生情況，並進而探討這些因素對當時人們的活動，特別是南遷北人的影響，藉以增進我們對歷史上中國向南方的發展這一重大課題的一個

4 《宋史》卷444，《文苑六·張耒傳》：“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

5 《張右史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五，頁60，《光山謠》。又陳造《江湖長翁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酌淮文》：“長淮渾渾蕩沸潏兮……天豈以是限南北兮”。

6 見《筆記小說大觀》13編，第五冊，葉3。台北，新興書局，1976年。

7 參考張家誠、林之光著《中國氣候》，頁467至474。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盛承禹等《中國氣候總論》頁399至407，410至411，422至449。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余顯芳等《中國的熱帶》，頁2至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學報》1972年1期，頁15至38）指出在近五千年間，中國氣候曾經發生過冷暖的波動。戰國、秦、西漢氣候溫和，東漢趨冷，迄晉代、南北朝均冷於今日。隋唐時變暖，北宋轉寒，至南宋初加劇。那麼，中國南北的分界線也曾有過南北向的推移進退。但這種變化是相當緩慢的。依竺先生的說法，東漢、北宋均轉趨冷，而東漢末的應劭、十一世紀晚期北宋的張耒仍舉出秦嶺、淮河來作南北的分界線是很值得注意的。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界線的向南收縮，對我們要探討的南方的認識影響不大。同時由於文獻的不足，我們也很難發現這種波動是否曾經造成疾病分布區域的南北推移等後果，因此本文不擬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8 引文據郭靄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頁76。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

側面的瞭解。

二、南北地理環境的差異與傳統醫學思想中地理因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天人相應不只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裡的重要觀念，也是中國古代醫學基本理論中具有關鍵性意義的觀念之一。如《淮南子·天文》說：“萬物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又《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也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臟，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⁹而其《邪客》篇則有更爲詳細、具體的敘述：

“黃帝問于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臟；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臍；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臍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在我們看來，這樣地把人與自然相比擬匹配，儘管有不少不合理的拼湊之處，但這幾段文字還是表明了當時人們認爲自然與人分別是大、小宇宙，彼此具有一一相對應的結構、組成部分及運轉的功能；人的生理、病理的變化和自然的運行、變遷也彼此相應。¹⁰因此在古代醫學中經常爲人們所稱述的一些致病之源

9 引文據河北醫學院校釋《靈樞經校釋》，下冊，頁26。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

10 關於“天人相應”，可參考劉長林《內經的哲學和中醫學的方法》，頁129至133。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

就是若干自然現象或構成宇宙的基本因素。如春秋時秦國的醫和說：“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傳》昭公元年）而《黃帝內經》裡因淫致疾的“六氣”則是風、熱、濕、火、燥、寒，也稱之爲“天地之氣”。（《素問·至真要大論》）即自然的運行、變化有所過度失當時，與之相應的人也因而生害致病。¹¹因此古人主張養生保健必須要避開這些天地之氣的失當情況。如《呂氏春秋·盡數》：“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即古人相信，不同的地理環境或特殊的自然條件對當地人的生理、疾病、壽命和智力、性情都有極可觀的影響或塑造作用，如《淮南子·地形》篇所說：“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瘡，木氣多樞，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瘻，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渾，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又：“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鷩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溼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僂，脩頸，印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所積也，蟄蟲之所

11 《呂氏春秋》中敘述人主行令違背季節時序，也會導致人民疾疫。如《孟春紀》稱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季春紀》）仲夏“行秋令……則民殃於疫”。（《仲夏紀》）這是在天人相應中，人的這一方行動失當而產生的後果。當然，實際上人主行令不時通常是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的。

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憲禽獸而壽……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頸，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

水對生命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管子·水地》篇說：“水……萬物莫不以生”。又：“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¹²不同的水質能影響到居民的性情，上引《淮南子·地形》篇已經述及；而對人的智力、習性或行為傾向的影響，《水地》篇講得更多：“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蠭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聚而稽，塽墉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遲，塽墉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懶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水質更影響到人們的健康，導致各種不同的疾病，《呂氏春秋·盡數》篇也說：“輕水所多禿與瘞人，重水所多瘧與蹙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人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尪與偃人。”¹³

綜上所述，古代中國人一如上古希臘人一樣，認為地理因素如氣、風、水、土等對人的健康或所患疾病起著重要的作用。¹⁴古人常用“水土”、“風土”、“土風”、“風氣”等語詞來代表某一地區的地理條件或自然環境。如上引《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國語·周語上》：“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韋昭註：“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尚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杜甫《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

12 古代希臘哲學家Thales 認為世界構成的本質是水。見W. Windleband,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p.37. trans. by Herbert E. Cushm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13 《博物志》也有類似的記載：“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犯，叢林氣蹙。”見范寧《博物志校證》，頁12。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4 古代希臘醫學經典著作《Hippocrates》，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其《氣、水、地》篇諸章即論述風、水、地等因素對人的健康或所患疾病以及性情的影響。見W. H. S. Jones, trans. Hippocrates, Vol.1, pp.65-137.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3.

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詩：“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¹⁵韓愈《與崔群書》：“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¹⁶又蘇軾《與章致平》尺牘：“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¹⁷北宋李虛己說池州（今安徽貴池）“井邑平曠，土風清和。”¹⁸南宋周必大稱瓊州“水土惡弱”。¹⁹而人們所以患病常常是因為不能適應或習慣某地的“水土”或“風土”，即所謂“不能（耐）其水土”（《漢書·鼂錯傳》），“不襲水土”、“不習水土”、“不服水土”、“不伏水土”、“不習風土”；反之，若是“服習土風”、“耐其風土”、“慣習水土”、“與水土之氣相諧”²⁰，就比較不容易感染疾病了。

這樣，要瞭解南北的地理條件，對雙方居民的健康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就不得不先掌握雙方在地理上的重大歧異。古代文獻常常提到南北兩方在地理上的差異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地勢上是北高南低，或西北高、東南低。《淮南子·天文》篇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又《原道》篇：“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這一神話足以反映在茫昧的遠古時代，人們已經注意到這一地理現象，這神話當即人們對此南北地勢特徵所以形成的一種解釋。

15 引文據仇兆鰲，《杜詩詳注》，頁1658。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6 引文據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頁109。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17 引文據孔凡禮點校本《蘇軾文集》第四冊，卷五五，頁164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18 見祝穆《方輿勝覽》（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六，葉一一，池州條引。

19 《文忠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九三，葉二四至二五，淳熙十二年與詹體仁侍郎儀之劄子。

20 分別見唐王焘《外臺祕要方》（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八《腳氣論》引《千金要方》；《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又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劉琳《華陽國志校注》，頁188。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宋張方平《樂全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六《論討嶺南利害九事》；釋繼洪《衛生補遺回頭瘴說》，見《嶺南衛生方》（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3年據日本天保12年刻本影印），卷上；《宋史》卷三三三，《張田傳》；《樂全集·論討嶺南利害九事》；蘇過《斜川集》卷五《論海南黎事書》（《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一百五，《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王棐《指迷方瘴癥論》（《嶺南衛生方》卷上）。

北方或西北地勢較高，古人常稱其“土厚水深”；而南方或東南地勢低下，則是“土薄水淺”。這是古代人們的普遍認識，無論是為了真實地瞭解自然現象的本身，或是從政治、軍事戰略上的需要來著眼，還是由藝術表現上的角度來考察，人們都指出了這一地理現象。如東漢思想家王充說“河北地高。”（《論衡·藝增》）《博物志》：“南方……土下水淺。”²¹晉郭義恭《廣志》：“北方地厚。”²²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水稻第十一》也說：“北土高原，本無陂澤。”²³梁隋之間，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也說：“南方水土和柔……北方山川深厚。”²⁴隋初高熲說“江南土薄。”（《隋書·高熲傳》）唐代朱朴曾經“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唐書·朱朴傳》）北宋的詩人楊億說：“蓋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²⁵山水畫名家郭熙說：“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臃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林泉高致》）醫家董汲《脚氣治法總要》亦云：“秦川地原高亢。”²⁶兩宋之際，李綱《論西北東南之勢》也說：“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謫官南遷雷州時，有《冬至》詩，歎嶺南“土薄”。²⁷南宋初李璆《瘴癘論》：“嶺南……地卑而土薄……大抵西北……土厚水深。”（《嶺南衛生方》卷上）陸游《老學庵筆記》也說：“吳中卑薄，斷地二、三尺輒見水。”²⁸

不過，土厚水深、土薄水淺是相對的，在土厚水深的北方也有土薄水淺的地

21 見《博物志校證》，頁十二。

22 《初學記》（司義祖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三，《冬》第四，《事對》，“地凍一丈”條引。

23 引文據繆啟愉等《齊民要術校釋》本，頁100。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

24 引文據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頁4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5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六一，《風俗雜誌》引《楊文公談苑》。

26 引文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葉三。

27 見《梁谿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四，《冬至》詩：“土薄葭灰難測候”。

28 引文據李劍雄校點本，卷十，頁131。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點，《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縫，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臈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新田則是相對地更爲土厚水深的地點。而在土薄水淺的南方，也可以看到土厚水深的地區。唐代李華曾指出錢塘江上游的衢州一帶就是這樣的，《衢州（今浙江衢州）刺史廳壁記》：“……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²⁹北宋樂史《太平寰宇紀》卷八九《江南東道一·潤州·金壇縣》：“今按，其地爽壇，水深土厚。”³⁰梅堯臣也有《周仲章通判潤州》詩一首：“昔過京口山，斷崖如鞶洛，抱谷黃芹泥，百丈聳垠崿。山嶺與江面，地脈水可度，欲鑿無淺泉，熟雲南土薄？君爲別乘去，便比北州樂，已免卑溼憂，仍離鴟鵟惡。”³¹聲稱潤州一帶絕非土薄水淺。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二九《岳州》條，“風俗”一目引郡志亦稱岳陽“土厚水深，故人性悍直。”類似的例子，在嶺南也找得到。唐房千里《投荒錄》也說高涼郡因“土厚而山環繞，高而稍涼，因以名焉。”³²然而這些都只是大範圍內少數區域的個別現象，不足以代表南北的普遍情形，而南北水土的基調，就古代人的認識而言仍是北地土厚水深，而南國土薄水淺。當然，水土的厚薄深淺並沒有固定不變的組合。土厚、土薄與地勢的高下有關；而水的深淺是指地下水距地面的深淺，即地下水位的高低而言的，跟地勢的高低就沒有必然的關聯了。明代王士性《廣志繹·江北四省》說：“關中土厚水深，川中則土厚而水不深。”³³四川較其東的南方地勢要高得多，但在水淺一點上却没有什麼分別。

與“土厚水深”相關的就是北土較爲爽壇乾燥，清朗，即如王充《論衡·藝增》篇所說的那樣：“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又晉葛洪《抱朴子·登涉》：“

29 見《全唐文》，卷三一六，葉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0 引文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九，葉十一。

31 引文據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5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 《方輿勝覽》卷四二，《高州·事要·郡名》引。

33 引文據呂景琳點校本，頁44。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中州高原，土氣清和。”³⁴董汲也說：“秦川地原高亢，春夏縱經霖霪，少有蒸濕。”（《腳氣治法總要》卷上）而南方“土薄水淺”給人們的普遍印象則是“下溼”、“卑溼”。戰國秦漢以來，人們對於這點講得很多。《史記·賈生傳》說“長沙卑溼”，當時的長沙國大致相當今日的湖南省。《史記·貨殖列傳》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南楚的“江南”部分約當今日的湘、贛兩省，則當時的江西也是人們心目中的卑溼之地。《後漢書·陳球傳》：“零陵下溼。”那時的零陵大體上相當現在湖南的南部。《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襃之。”其時衡山國約領有今皖、鄂兩省的接壤地帶。《史記·袁盎傳》說袁盎“徙爲吳相，辭行，〔袁〕種謂盎曰：‘……南方卑溼，君能日飲’……”。當年吳國的領土大約包有今江蘇及浙江南部等地。《漢書·地理志》在“吳地”一節末尾說“江南卑溼，丈夫早夭。”亦指今江蘇、浙北、江西等地爲卑溼地域。《論衡·言毒》篇也說：“江南地溼。”《晉書·文帝紀》：“南天下溼。”又《晉書·賈充傳》：“江淮下溼。”《隋書·食貨志》稱：“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溼。”隋末李桐客也說：“吳會卑溼”。（《唐書·循吏·張允濟傳》）生長在江南的唐代詩人張籍也有《江南曲》詩，說“江南……土地卑溼”。³⁵白居易《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詩：“九江卑溼地。”³⁶唐代本草學者陳藏器也說：“江淮已南，地氣卑溼。”³⁷董汲《腳氣治法總要序》：“江淮卑溼之地。”梅堯臣《送臨江軍監軍李太傅》：“三江卑溼地。”臨江軍即當今江西中部清江及其附近地區。

嶺南地區也是人們所熟悉的卑溼地區。《史記·南越列傳》記載了漢初南越王趙佗對嶺南的敘述：“南方卑溼。”《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南方者……其地下。”³⁸這“南方”的主要範圍也包括嶺南在內。《隋書·地理志》下：“自嶺

34 引文據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頁30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35 見《全唐詩》，卷十九，頁二〇五。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36 據顧學鵠校點本《白居易集》卷十，頁203。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37 宋唐慎微撰，金張存惠重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五，“玉石部下品”引。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

38 按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蕭延平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5年），卷十九《知地方》篇，“其地下”三字作“其地汚下”，注云：“汚下，溼也。”

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唐鄭絅《自序》：“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溼……”³⁹李璆《瘴癘論》：“嶺南……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又：“嶺南陰氣不收，又復卑溼。”至於四川，土厚而水不深，也十分潮溼，故元稹說：“巴地濕如吳。”⁴⁰

總之，從我國地貌上，自西至東的三級階梯來考察南北的地勢高下，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北方或西北地高、土厚水深，主要是指三級階梯中的第二級階梯，即秦嶺以北、太行山以西的黃土高原；而南土或東南低下、土薄水淺，則主要是由於四川盆地、雲貴高原除外的南方或東南地區，正處在比北方黃土高原差了一級的第三級階梯上，即巫山、雪峰山、雲貴高原東部邊緣之東的南方均屬全國三級階梯中地勢最低的第三級階梯。

其次，南北兩方在古代記載中常為人們述及的另一項主要地理差異是其地理位置的不同。北方是狹義的或指全國疆域的中部地區的“中國”的所在地，古代人們認為其地理位置正處在世界的中央，《鹽鐵論·輕重》篇記載了紀元前八一年參加鹽鐵等政策大辯論的文學說：“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⁴¹又《初學記》卷八《州郡部·河南道》：“河南府，周地也。風雨之所交也，陰陽之和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⁴²三國盧毓《冀州論》則主張天地相交、陰陽相會的地點在冀州境內：“

39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九，《草部中品之下·補骨脂》引宋蘇頌《本草圖經》所錄“唐鄭相國《自序》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溼，傷於內外，衆疾俱作……元和七年，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按《舊唐書·憲宗紀上》元和五年三月癸巳以前相“太子賓客鄭絖檢校禮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八年十二月“丙戌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據此，鄭相國當是鄭絖，唯所記年齡與本傳所載不合。

40 引文據冀勤點校本《元稹集》，卷十二《酬樂天東南行一百韻》，頁136。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41 引文據王利器《鹽鐵論校注》本，頁100。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42 洛陽早在殷周之際已被人們視為天下之中，《尚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逸周書·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即“地中”。這一記載也可以與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的何尊銘文：“隹（唯）王初鄭（遷）宅于成周……余其宅茲中國”相印證。“中國”當即因其位在“土中”而得名。見唐蘭，《何尊銘文解釋》及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均見《文物》，1976年第1期。按《周禮·地官·大司徒》：“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是自然條件最安適的地方。《鹽鐵論》等論中國、中州都本乎此。

冀州……東河以北、西河以來、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⁴³無論如何，北方或“中國”既處於“天地之中”，則南方離北方越遠，或越靠南邊，其位置就越偏。白居易在潯陽（今江西九江）時有《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今江西贛州）》詩：“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白居易集》卷十七）“天涯”對“天地之中”而言自然是十分偏遠的。雖然這無疑地是出於詩人的誇張，但對北方人來說，這些地方確是相當偏遠的。南朝陳徐陵《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⁴⁴則稱嶺南為“天涯、地角”，“地角”與“地中”相較，自屬偏外。又，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六：“欽州（廣西欽州）有天涯亭，廉州（廣西合浦）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轍窮途也。”⁴⁵嶺表地區，自秦漢以來一直是中國連續領土的最南端。晉王範《交廣春秋》：“朱崖、儋耳二郡……大海中，南極之外。”⁴⁶“南極”二字足以說明嶺南是全國最偏南的地區。

北方或“中國”的位置處在或靠近“天地之中”或“地中”，因此於陰陽無所偏、無所積，陰陽這兩個宇宙所由構成、演變的基本因素在這裡相會、相和。因而這裡氣候十分和適，即北宋晁補之所說：“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⁴⁷北宋曾鞏有《南湖行》詩二首，其一云：“生長江湖樂卑溼，不信中州天氣和。”⁴⁸這聯詩句也迂迴地透露了一般人們相信或認為“中州”不同於南方卑溼地區，是“天氣和”的。陸象山《大學春秋講義》也說：“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⁴⁹而南方，特別是嶺南地區，則因其位置偏處南端而天氣不和或陰陽不和，即《淮南子·地形》所說：“南方，陽氣之所積。”上引《素問》也說南方是“陽之所盛處”。又董錯說：“楊粵之地少陰多陽。”（《漢書·董錯傳》）王充也泛稱南方楚、越為“太陽之地”，南越為“陽地”：“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

43 《初學記》卷八，《河東道》第四，《論》引。

44 《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六八二，《書》十六，《邊防上》，葉二。

45 據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六，頁五二，1981年。

46 《水經·溫水注》（《四部備要》王先謙合校本）引。按《初學記》卷八，《嶺南道》第十一，《事對》引作《交廣二州記》：“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

47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二五，頁一五五下，《上皇帝安南罪言》。

48 《曾鞏集》（陳杏珍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五，頁六七。

49 據鍾哲點校本《陸九淵集卷》，卷二三，頁277。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則效。”（《論衡·言毒》）唐房千里《廬陵所居竹室記》：“楚之南當冬而且曠，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⁵⁰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⁵¹贛南如此，更偏南的嶺表自不能例外。曾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曾鞏集》卷十四）《方輿勝覽》卷四二《雷州》引《圖經》云：“州居海上之極南，氣候倍熱，所謂除夜納涼者容有之。”

大抵北方處在暖溫帶這一熱量帶上，夏熱冬寒，即所謂“陰陽之際”、“陰陽之所交”、“陰陽之和”、“陰陽之中”、“天氣和”；而南方炎熱，其所屬熱量帶則係亞熱帶乃至熱帶，即所謂“陽氣之所積”、“太陽之地”、“陽地”、“少陰多陽”、“陽氣多”；雷州半島係北熱帶或邊緣熱帶氣候，“氣候倍熱”是恰如其分的形容。

最後，古代文獻還告訴我們南方的雨量十分豐富，與北國的爽壇乾燥也大相逕庭。《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⁵²結果應龍“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大荒東經》）如果應龍只是失去了上天或停留在天上的能力，依照“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來看，應龍雖處在地上，仍然擁有降雨的神力。那麼，衆神生死搏鬥的戰場所在的冀州一帶，沒有理由會經常發生旱災才對。這樣，常常鬧旱災又是爲了什麼呢？初民給我們的解答是：“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經》）然則南方較北方多雨，自遠古以來即已如此。唐劉禹錫在朗州（今湖南常德）時，也有《砥石賦》云：“南方氣泄而雨淫。”泛稱南方降雨過多。杜甫在湖南時，郭受答以詩云：“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⁵³認爲多雨是由於地卑的緣故。但四川及雲貴高原土地高厚，却以多雨著稱。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庸蜀之南恆雨

50 《全唐文》，卷七六〇，葉二一。

51 《知不足齋叢書》本，冊六，卷三，葉十一。

52 引文據袁珂《山海經校注》，頁4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3 《砥石賦》見《劉夢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十一。郭受詩見《杜詩詳注》，頁1982附載郭受《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詩。

少日，日出則犬吠。”⁵⁴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說牂柯郡因“上值天井，故多雨潦。”四川西部因多雨，有好幾個地方都號稱是“漏天”。張守節《史記正義》說：“《華陽國志》云：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嵩州（四川西昌），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爲‘漏天’。”（《史記·孝文本紀》）《文選》卷二十八鮑照《苦熱行》呂延濟注云：“越嵩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杜甫《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云：“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杜詩詳註》卷十二）宋人任升《梁益記》說：“大、小漏天在雅州（四川雅安）西北，山谷高深，沈晦多雨。黎州（四川漢源北）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⁵⁵又《太平寰宇記》卷七九《劍南西道八·戎州》，南溪縣（今四川南溪）條：“大黎山、小黎山管開邊縣界，四時霖霪不絕，俗人呼爲‘大漏天’、‘小漏天’。”又，陸游在山陰時有《雨夜》詩說：“吳中地多雨”。⁵⁶

如前所述，既然古代人們認爲地理環境或自然因素與人類的健康或所患疾病關係至密，那麼上述南北地理上的不同對兩方居民健康的影響又如何呢？上引成公六年《左傳》已經宣稱“土厚水深”地區的居民較不易生病，而生活在“土薄水淺”之處則難免“有沉溺重臈之疾”。李華說衢州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即本乎此。《孫子·行軍》篇說：“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唐李筌注云：“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注云：“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宋梅堯臣注謂：“高則爽壠，所以安和……下則卑溼，所以生疾”。張預注亦云：“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⁵⁷也表示了相同的認識。楊億對於這點也有所體驗，“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溼，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臥潁陰，濱嵩山之麓，井水深

54 見《柳河東集》，頁541。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55 《方輿勝覽》卷五五，《雅州》，“風俗”項下“黎風雅雨”條引。按《天中記》卷三引文作“黎縣”，誤。

56 見《劍南詩稿校注》，卷七六，頁4149。（錢仲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7 引文及注釋均見《十一家注孫子》（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頁149。

數丈而絕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濕；蓋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痼疾。”（《宋朝事實類苑》卷六一《風俗雜誌》引《楊文公談苑》）南宋岳珂《桯史》卷九《蠲毒圓》條說：“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⁵⁸這意味著有人甚至相信生長在“土厚水深”環境中的人可能稟賦特異，體魄較爲強健。

南方土薄水淺，居住者易於感疾，古人常常認爲因其卑溼，削短了當地居民的壽命。上引《史記》說：“江南卑溼，丈夫早夭”。賈誼出任長沙王大傅，也因“長沙卑溼”而“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史記·賈生傳》）《史記·南越列傳》：“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細玩其上下文意，也是表示在卑溼的南方，命不得永；東西蠻夷，其衆無幾，甚或裸身，猶且稱王；既已自棄，何不稱帝聊以自娛，快活幾天？⁵⁹又上引《淮南子·地形》篇也說“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溼居之，其人……早壯而夭。”

依前所述，中州是“陰陽之和”、“天氣和”、“含衆和之氣”、“土地和適”的；而南土則“少陰多陽”，“不得氣之中正”，即不和的。上引《淮南·地形》篇說：“暑氣多夭”。可見陽氣盛多對人們的性命極爲不利。《唐書·李泌傳》：“初帝（肅宗）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甚危。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玄宗）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憚，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這裡“南方氣候

58 引文據吳企明點校本《桯史》，頁104。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59 按《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文字與《史記》有異，作：“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顏師古注：“羸謂劣弱也。”王先謙《補注》引何焯曰：“《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顏注非。”

惡”雖然是指蜀地而言的，但結合上文南北“天氣和”、不和等敘述來看，把這句話看成是泛指整個南方也不為過。天氣不和或“氣候惡”對人們的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王充說：“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論衡·訂鬼》）當即指此。東漢末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說：“氣不和，故民疫病也。”李璆《瘴瘡論》也指出嶠南瘴疾“上熱下寒之證”即因感“陽燠陰濕不和之氣”而產生的。

總之，南土的自然條件是炎熱潮濕的。杜牧《上池州（安徽貴池）李使君書》說：“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⁶⁰這樣看來，就古人的認識來說，南方的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健康或性命的安全確實有相當嚴重的危害性。

三、古代南方的自然環境、生活習俗與地方病

南方“土薄水淺”或“土地卑溼”、“氣候惡”或天氣不和，易致疾病，使人早夭，然則其機制安在？上引《左傳》說“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墮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臍之疾”；又說新田“有汾、澗以流其惡”。那麼疾害之源當是水土之“惡”了。《左傳》宣公十五年：“川澤納污，山藪藏疾。”則大自然的山川藪澤確實生產、蓄藏著一些對人類的健康構成威脅的危害性因素。古人也把這些來自土地的致病或危害性命的因素稱為“地慝”。《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慝。”鄭玄注：“地慝，若障、蠱然也……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唐賈公彥疏：“云若障、蠱然也者，謂土地所生惡物。障即障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這些害人的“惡物”都是些什麼呢？二鄭沒有全數開列出來，只舉了障氣、蠱毒和一些毒蛇等幾個例子。

既然北方“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而南土卑溼，“丈夫早夭”，是不是南方的自然環境孕育、蓄藏著較多危害性嚴重的“地慝”呢？如下文所述，古代人們確實相信是這樣的。《太平御覽》卷九五〇引《博物志》說：“深山窮谷多毒虐之物：氣則有瘴癘，人則有工蟲，獸則有虎，鳥則有鳩，蛇則有蝮，蟲則有射工、沙蟲，草有鉤吻、野葛，其餘則蛟、蟒之屬生焉。”雖然沒有交代這些“毒虐之物”或“地慝”都生長在那些地區的深山窮谷之中，但從古代典籍所載，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多數大都生在秦嶺、淮河一線的南方。“人則有工蟲”一句不詳，姑且不

60 引文據陳允吉校點本《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93。

論，現將各項惡物的生長地域分述如下。《楚辭·大招》：“魂乎無南！……山林險隘，虎豹蜿只！”東漢王逸章句：“言南方有高山深林，其路險阨，又多虎豹，匍匐蜿蜒，以候伺人也。”在東南西北四方中，只在南方提到虎，當是南方虎特多之故。由於虎與本文主旨無關，這裡不擬論述。

《論衡·言毒》篇說：“鳩鳥生於南。”南朝梁陶弘景將其所見諸本《神農本草經》中漢魏、蕭梁之間諸名醫所增補的資料彙輯成《名醫別錄》一書，書稱：“鳩鳥，毛有大毒……一名鴟目，生南海。”⁶¹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也說：“鳩鳥……出交、廣深山中。鴟目鳥……江東人呼爲同力鳥。”⁶²唐蘇敬等撰《唐本草》，其卷二十，《有名無用》“鳩鳥”條，自注云：“此鳥，商州（今陝西商縣）以南，江嶺間大有。”則鳩鳥在漢、宋之間的記載裡，大抵只產在秦嶺以南的地區。

王充說：“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西南。”（《論衡·言毒》）《神農本草經》說：“鉤吻……一名野葛。”⁶³漢魏之際，華佗弟子吳普撰《吳普本草》稱野葛爲：“秦鉤吻生南越山或益州。”⁶⁴《名醫別錄》說：鉤吻“生傅高山谷及會稽東野。”按《漢書·地理志》會稽有冶縣，王充稱野葛爲“冶”葛，則“東野”當即“東冶”。傅高山所在不詳。《唐本草》注云：“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間巷間皆有。”唐劉恂《嶺表錄異》也說：“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誤食之……不得解藥，半日輒死。”⁶⁵然則鉤吻或野葛的產地也在南方。

至於蝮虺，《楚辭·招魂》說：“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又《大招》：“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王虺騫只。”淮南王劉安上書漢武帝說閩越“林中多蝮蛇、猛獸”，“蝮蛇蠭生”。（《漢書·嚴助傳》）《說文解字》第十三上：“閩，東南越，它種。”⁶⁶說閩越是蛇種或與閩地多蝮蛇不無關係。王充說：“江南地溼，

61 據尚志鈞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頁297。

62 見唐《新修本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日本森氏藏影寫卷子本），卷二十《有名無用》，鳩鳥條注引。

63 據曹元宇輯注《本草經》（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頁181。

64 據尚志鈞等輯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頁50。

65 魯迅校本，卷中，頁15。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

66 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藏版段注本，十三篇上，葉六一。

故多蝮蛇。”（《論衡·言毒》）張籍《江南曲》歌咏江南，也有“土地卑溼饒蟲蛇”一句。在西南方蛇也為數甚夥，《華陽國志·南中志》說“自僰道至朱提”的“步道”沿途“多蛇蛭虎狼。”杜甫在夔州時，有《南極》詩一首說：“歲月蛇常見”。（《杜詩詳註》卷十八）樊綽《雲南志》亦稱石門外出至雲南途中亦有“毒蛇”之害。⁶⁷南宋晚期曾經久居嶺南的釋繼洪撰《續附蛇虺蠱諸方》，說：“五嶺之南不惟烟霧蒸濕，亦多毒蛇猛獸，故前賢有詩云：‘霧鎖瓊崖路，烟籠柳象州，巴蛇成隊走，山象著群遊’。又《編類集》及《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廣郡多蛇虺、蜈蚣。愚既表出瘴癘論方，又不得不附治蛇虺蠱數方，以濟人之緩急。”（《嶺南衛生方》卷中）大致上我們可以斷言，蛇虺之害亦以南土為夥。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顏師古注：“即射工也，亦呼水弩。”劉向認為蜮生在嶺南。《楚辭·大招》：“魂乎無南！……鰐鱠短狐……魂乎無南！蜮傷躬只。”王逸章句：“鰐鱠，短狐類也。短狐，鬼蜮也。”“言復有鰐鱠鬼蜮，射傷害人。”“言魂乎無敢南行，水中多蜮鬼，必傷害於爾躬也。”《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鄭玄注：“水蟲，狐蜮之屬。”賈公彥疏：“云水蟲、狐蜮之屬者，蜮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者也。”都說蜮生在南方。按《博物志·異蟲》：“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⁶⁸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則說射工“江淮水皆有之。”⁶⁹葛洪則說產於“江南山谷之間。”（《抱朴子·登涉》）然則除了像魯國等少數記載之外，射工大抵也是南國的水土之害。⁷⁰

67 據趙呂甫《雲南志校釋》本，卷一，頁3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68 《博物志校證》，卷三，頁三七。但“射工蟲”中“工”字誤為“上”字。

69 孔穎達《詩·小雅·何人斯》“為鬼為蜮”句《正義》引。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70 除了魯及《周禮·秋官》的記載是在北方之外，《搜神記》也有一則蜮發生在北土的故事：“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法苑珠林》卷四十三引）

西晉車永與陸雲書：“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鄧（浙江寧波市東）令……卒有此役，舉家慘感，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寧波市西北）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蟲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⁷¹《抱朴子·登涉》篇：“江南山谷之間……又有沙蟲。”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說：“山水間多有沙蟲……今東間水無不有此……比見嶺南人初有此者，即以茅葉刮去……東間山行，無處不有。”⁷²元稹在通州《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詩之三有句云：“滿身沙蟲無防處。”（《元稹集》卷二十一）《舊唐書·西南蠻傳》：“南平獠者，東與智州、南與渝州（四川重慶）、西與南州（四川綦江）、北與涪州（四川涪陵）接……土氣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蟲、蝮蛇。”唐人《朝野僉載》卷五云：“山南、五溪、黔中……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爲沙蟲，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看來川、黔一帶，沙蟲之害，頗爲猖獗。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二“沙虱”條末附錄有“沙蟲”一物，並引五代杜光庭《錄異記》云：“潭、袁、處、吉等州（湖南長沙、江西宜春、浙江麗水、江西吉安）有沙蟲，即毒蛇鱗甲中蟲。蛇被苦，每入急水中碾出。人中其毒，三日即死。此亦沙蟲之類也。”⁷³這樣看來，沙蟲同樣是南方的土產。

瘴癘之氣主要也分布在南土。東漢章帝建初元年（七五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後漢書·楊終傳》）即當時認爲淮水流域，“障毒互生”，其地遷民愁困足以感天動地，導致災害。除廣陵外，淮陽等三國領土多在淮北。淮北猶且被視爲南方，有障毒之氣，則淮水以南廣大的暑溼地區當也不能例外。曹植有《七哀詩》云：“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文選》卷二十八鮑照《苦熱行》李善注引）指出瘴氣發生在南方。隋孫萬壽有詩稱：“江南瘴癘地”。（《隋書·文學·孫萬壽傳》）李白長流夜郎，杜

71 見《陸士龍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十所附車茂安書。

72 《外臺祕要方》卷四十，《沙蟲毒方六首》引。

73 引文據劉衡如校點本，第4冊，頁2367。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按曾慥《類說》所錄《錄異記》作“沙虱”。（《筆記小說大觀》31編，冊1。）

甫《夢李白》詩也有同一詩句，擔心長江中游以南地區的瘴癘之毒會傷害到故人。杜甫在四川時也頗有一些詩句述及當地或南方的癘氣，如《悶》：“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雷》：“南方瘴癘地”。元稹在四川通州《夜坐》詩有句云：“雨滯更愁南瘴毒”。將“南”、“瘴”二字連用，說明了瘴氣主要是在南土。《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宅土熇暑，封疆障癘”。李善注：“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即南方的瘴氣主要在今雲貴和嶺外地區。

雲貴的瘴氣十分著名。《三國志·蜀書·王連傳》：“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華陽國志·南中志》說：“興古郡（今雲南東南部）……特有瘴氣。”《太平御覽》卷七九一引《永昌郡傳》：“興古郡在建寧南八百里，郡領九縣，縱經千里，皆有瘴氣。”《水經·葉榆河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梁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牂柯郡談指縣引《南中志》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⁷⁴

嶺南也是人們熟悉的瘴鄉。《三國志·吳書·陸凱傳》附弟《陸胤傳》：“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說：“嶺氣多瘴。”（《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上《序例》）北宋劉攽《送人之官嶺南》詩說嶺南“地溫饒瘴毒。”⁷⁵《宋史·兵志十》：“廣南瘴癘之鄉。”蘇軾在惠州時《與吳秀才》書說：“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蘇軾文集》卷五十七）“號爲瘴癘地”足以顯示南土爲瘴鄉一事廣爲人知的程度。⁷⁶

綜上所述，秦嶺、淮河以南在古人心目中確是毒害或“地慝”甚多的。《抱

74 西南地區，在古代文獻裡還有不少有瘴害的水域，如《水經·若水注》：“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又禁水“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爲傑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故諸葛亮言：‘五月渡瀘’。”

75 見《彭城集》（《聚珍叢書》本），卷十，葉十四。

76 Edward H. Schafer 所著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一書中有專論嶺表瘴氣(miasmas)的一節(pp.130-134)，雖對原始文獻有嚴重的誤解，但仍可參考。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朴子·登涉》篇：“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蟲也。’韓愈在嶠南陽山縣（今廣東陽山）時有《縣齋讀書》詩說：“南方本多毒。”⁷⁷稱嶺外多毒害。又曾撰《黃陵廟碑》說廣東潮州是“厲毒所聚”之地。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也說：“今嶺南多毒。”

根據王充的意見，南方多毒不是偶然的，毒就是“太陽之熱氣”、“陽氣”或“烈氣”、“溫烈氣”。《論衡·言毒》篇說：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蠻，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憇，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憇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脹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蠻，在草則爲巴豆、冶葛，在魚則爲鮀與鯀鯀。故人食鮀肝而死，爲鯀鯀螯有毒……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飲鳩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螯，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

即南土陽氣偏盛，提供了諸種毒害孕育、生長的溫床；而南方又多雨潮溼，據上引王充、葛洪的看法，“地濕”或“暑濕鬱蒸”也是宜於各種水土惡物繁殖的適宜

77 引文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二，頁1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78 引文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葉十一。

條件。隋唐之際，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疫癘病候·瘴氣候》說：“夫嶺南青草、黃茅瘴猶如嶺北傷寒也。南地暖，故太陰之時，草木不黃落，伏蟄不閉藏，雜毒因暖而生。”⁷⁸交代了瘴氣之毒是在暖熱的氣候裡發生的。唐呂向注《文選》卷二十八鮑照《苦熱行》詩即直截地說：“瘴氣，毒熱氣也”。而周去非《嶺外代答·風土門·瘴》也對嶠南瘴氣所由產生的背景做了這樣的敘述：“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⁷⁹

總之南方地偏，陽氣盛多，是所謂的“太陽之地”或“陽地”，土地又復潮濕，在這樣的環境裡，孳生出大量有毒的草木、禽蟲或毒氣就十分自然了。

依上文所述，瘴氣的分布，多在南土。除了南方陽氣偏盛或氣候炎熱的緣故之外，古人認為瘴氣之起還跟南方的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等自然因素有關。周去非說：“南方凡病皆謂之瘴。”⁸⁰這意謂著南方人認為瘴氣是南土許許多或一切疾病的病源。然則瘴氣在南土當是極為普遍，無處不存，無所不在的。那麼“瘴”這

79 引文據《筆記小說大觀》本，29編，三冊，卷四，葉二。

80 同上。關於“瘴”的討論可參見馮漢鏞，《瘴氣的文獻研究》，《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11卷1期，頁44至47。“瘴氣”包含有多種不同的疾病。但我們認為宋以前，主要是指瘧疾中的惡性瘧或間日瘧的惡型發作。唐王燾《外台秘要方》卷五引《備急》說：“夫瘴與瘧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嶺南率稱爲瘴，江北總號爲瘧。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又《太平寰宇紀》卷七七，《劍南西道·黎州》“漢源縣”條：“漢水……從和姑鎮山谷經界通望縣入大渡河，不通舟船。每至春冬有瘴氣生，中人爲瘧疾。”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說“嶺南春草、黃茅瘴猶嶺北傷寒”，周去非《嶺外代答》也說“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這跟古代醫學把瘧疾歸入“傷寒”類的疾病中有關，例如《千金要方》即將各種瘧病方歸在《傷寒方》中（卷三十五）。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說自己在通州時“瘧病將死”，自注又說“至通州，染瘴危重”；又《痞臥闌幕中諸公徵樂會飲因有戲呈之十韻》詩題稱“痞”，而句有“溫瘴氣難排”，可見瘴即瘧。而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去夏微之瘧”句自注：“去年聞元九瘴瘧。”也說明了當時經常將此二字互換使用，二者實指一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據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也說“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薰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瘧狀。”因此我們主張宋以前瘴主要是指瘧疾（特別是惡性瘧）而言的。司徒尚紀說“所謂瘴氣，實際就是熱帶森林中，由於枯枝敗葉的堆積所分解出來的各種有害氣體以及瘧疾對人的危害。”（見所作《刀耕火種在海南島的歷史演變芻議》一文注7，刊於《熱帶地理》，七卷三期，1987年9月）。這一說法有多處不妥，一是古代文獻所記瘴氣所在地區範圍廣大，絕不僅限於今日的熱帶地區；其次古代文獻中瘴氣常生於水面，跟枯枝敗葉沒有什麼關係。

種“地慝”究竟是什麼？怎麼會這樣廣泛地流布在南土呢？劉恂《嶺表錄異》說：“嶺表山川盤鬱結聚，不易疏泄，故多嵐霧作瘴。”指出瘴疾生於大地山川所起的嵐霧。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今福建漳州）》詩說：“關山到漳窮，地與南越錯，山川鬱霧毒，瘴癘春冬作。”⁸¹也表示瘴癘疾病是起於山川鬱結的霧氣所產生的毒害作用。

我國南方山地丘陵甚多，古代文獻給我們的訊息是瘴氣即起於山嶺。《水經·溫水注》：“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昧縣。縣故濱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言下之意，建寧等處，山地有瘴是常事。元稹在四川時有《茲》詩三首，其一云：“陰深山有瘴”。蘇軾在循州（今廣東龍川西）時所作《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第三首有“山深瘴重多寒勢，老大須將酒自扶”一聯。⁸²李綱《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說虔南（在今江西南部）一帶“山多瘴癘”。⁸³張孝祥《鷓鴣天》詞云：“長驅萬里山收瘴，徑度層波海不風。”⁸⁴都表示瘴氣出於山地。上引陳藏器亦言“嶺氣多瘴”。又較早，“瘴氣”常作“障氣”，如上引《周禮·地官·土訓》鄭玄注及《後漢書·楊終傳》均是，“阜”字邊也說明了瘴氣和山陵丘阜有關係。南朝宋陳延之《小品方》及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都提到“山瘴癘”⁸⁵，即由“山瘴”所引起的瘡疾。這一語

81 引文據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年《臨川先生文集》本，卷七，頁135。

82 引文據《欒城集·欒城後集》（曾棗莊等校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2，頁1140。

83 《梁谿集》，卷一百七，葉七。又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許沛藻等點校點本，1987年）卷中：“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十：“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

84 引文據徐鵬校點本《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32，頁313。

85 見《外台秘要方》卷五《山瘴癘方》引。又高文柱輯校《小品方輯校》（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頁68。按《小品方》作者陳延之的年代，學者提出過不少看法，彼此之間，分歧甚大。可參考高文柱《小品方輯校》一書附錄：《小品方之研究》，頁172至183。胡乃長《小品方考》，見《中華醫史雜志》1981年11卷2期，頁116至119。1985年日本學者在尊經閣文庫中發現了《小品方》古卷子本殘卷，陳延之的時代才得以確定。見崔志俊譯《中國失傳醫著小品方第一卷古抄本在東京發現》（《河南中醫》1987年2期，頁36）；任旭《小品方殘卷簡介》及廖育群《陳延之與小品方研究的新進展》，見《中華醫史雜志》1987年17卷2期，頁71至73；74至75。

詞更把生於山嶺的瘴氣名為“山瘴”。陳延之還把山瘴稱作“山毒”，更可以表明瘴氣是發生在山地的地慝或毒害。

依照古人的看法，山嶺所以多瘴氣，山上的林木也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城陽恭王祉傳》說長沙國零道的春陵鄉（今湖南寧遠北）“地熱下濕”，有“山林毒氣”，依下文所述，“山林毒氣”當即瘴氣的別名。杜甫在夔州《驅豎子摘蒼耳》詩首聯云：“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又蘇轍《和子瞻過嶺》詩有“山林瘴霧老難堪”一句。（《欒城集·欒城後集》卷二）《宋史·地理志六》說：“廣南東、西路……山林翳密，多瘴毒。”都指出了林木或山林跟瘴氣的關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秋七月：“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⁸⁶又北宋鄭俠《紀連（今廣東連縣）守植道傍木》詩：“由吾太守愛民深，孜孜利民惟不足，以爲烈日長道難，加茲嶺外炎暑酷，黃茅鬱蒸之烈氣，重嵐固結之濃毒……”⁸⁷則荒野的茅菅雜草也脫離不了干繫。范成大《桂海虞衡誌·雜志》所說：“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滲氣鬱勃蒸薰之所爲也”。其中的草莽滲氣的作用當即指此而言。由於草木皆稟惡氣而能產生毒害，不必像冶葛、巴豆那樣須服食始中其毒，因此宜盡力避免接觸這些毒草，唐李紳《趨翰苑遭誣構六韻》說：“草毒人驚勁，茅荒室未誅。”⁸⁸元稹《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也勸他說：“毒草莫親芟。”

南方河川縱橫交錯，湖泊星羅棋布。而瘴氣也發生於江湖水中。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湖間露氣成瘴。”（《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五《玉石部下品》引）上述盤水及不津江都有瘴氣。元稹《表夏十首》之三：“江瘴炎夏早，蒸騰信難度。”又《寒》：“江瘴節候暖，臘初梅已殘。”均指江河溪流在節候轉暖或炎夏時水面上蒸騰冒發起有毒的霧氣而言。常起瘴氣的河流就成了“瘴江”，如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詩第一首說山南西道（今四川東部）通州（四川達縣）：“四面千重火雲合，中心一道瘴江流。”又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眨潮州路八千……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其《瀧吏》詩稱潮州之惡溪云：“惡溪瘴毒

86 引文據上海師範學院等點校本，14冊，467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87 引文據《西塘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葉24。）

88 引文據王旋伯《李紳詩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聚。”則惡溪當是潮州著名的一條瘴江。嶠南的瘴江尤爲人知，甚至用以名郡，或成爲河流的專名。《宋書·州郡志》越州條下有臨漳郡，《南齊書·州郡志》：“越州，鎮臨漳郡。”而杜祐《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漳”字作“瘴”：“廉州……晉又爲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瘴郡及越州……大唐置廉州”。自注云：“州界有瘴江。”《太平寰宇紀》卷一六九云：“晉又爲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瘴郡，以界內瘴江爲名。”宋歐陽忞《輿地廣紀》卷三十七亦作臨瘴郡。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十廣南西路廉州條注：“《南齊志》云：越州治臨漳郡……土有瘴氣，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故臨漳郡又名臨瘴郡。”⁸⁹《元和郡縣圖志》稱：“州界有瘴江，名爲合浦江”。又：“州西南至廉江入海處約二百里，其海口有梁德鎮，亦是往安南水路”，“自瘴江至此，瘴癘尤甚，中之者死。”

海面蒸發的水氣所成的霧則稱“海瘴”。韓愈“黜守潮州”即“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祭湘君夫人文》)又其《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南宋李石《論養生書》謂：“東南海瘴，毒厲蒸濕，薄人膚肉。”⁹⁰而冒發瘴霧的海域則是“瘴海”，如李綱謫居海南島時有詩云：“草屋叢篁裡，孤城瘴海端。”

總之，古人把南土山川湖海所蒸發的人們認爲有害的霧氣稱爲“瘴氣”，也稱作“瘴氣”(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又稱爲“瘴霧”，如蘇轍《郭論》詩：“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古代人認爲“氣如雲烟”⁹¹，因此瘴氣又名爲“瘴烟”，如白居易元和十四年贈元稹詩云：“君還秦地辭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范石湖《重遊南嶺》詩：“我從蠻嶺瘴烟來。”⁹²或稱“烟瘴”，如《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天禧五年五月燕肅言：“嶺南最處遐遠，攝官校吏多務阿私…

89 按“瘴江”尚見於其他地點，如《元和郡縣圖志·嶺南道》藤州镡津縣：“瘴江，在縣東南”。賀次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又《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二容州條引唐人《郡國志》云：“有瘴江水”。

90 《方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葉十一。

91 《論衡·談天》：“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又《自然》篇：“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

92 《范石湖集》頁1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93 見《藏海居士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葉十。

…官司不詳事理大小，即行通對，往來萬里烟瘴之鄉……”。山氣蒸發稱嵐，因而又叫“瘴嵐”，如李綱《入江西境先寄諸李二首》之一：“萬里瘴嵐來海外。”或稱“嵐瘴”，如宋吳可《後聞警》有句云：“長秋南奔苦嵐瘴。”⁹³又稱爲“瘴雲”，如白居易《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詩述九江夏季云：“瘴雲稍含毒”。又《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云：“秋瘴江雲毒”。又黃山谷謫居涪州時《次韻林宗送別二首》第二首云：“何時幽谷回天日，教保餘生出瘴雲。”或直接稱爲“煙嵐”，如秦少游《寧浦（今廣西橫縣）書事六首》之二云：“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⁹⁴即稱自身多病，非緣嶺表瘴氣爲害。或只稱爲“煙”，如蘇軾《題鬱孤台》詩：“澤國風煙晉，平居念少游。”⁹⁵楊萬里《南海集》中有《明發龍川（今廣東龍川西）》詩一首，云：“山有濃嵐水有氣，非煙非霧亦非雲，北人不識南中瘴，只到龍川指似君。”說瘴“非煙非霧亦非雲”，當只是強調其致病的有害性質而已，他自己也使用“瘴霧”、“瘴煙”等語詞。⁹⁶

葛洪《肘後方》有“度瘴散”，其效用是：“辟山瘴惡氣。若有黑霧鬱勃及西南溫風，皆爲疫癘之候方”。⁹⁷已指出瘴氣的具體面貌是“黑霧鬱勃”的模樣。范成大也說瘴氣色深如墨，其《步入衡山》詩云：“墨染深雲猶似瘴。”（《范石湖集》卷十五）而楊萬里《送彭元忠縣丞北歸》詩：“君從循州來，却向饒州去……黃茅起煙如黃沙，瘴母照永曼陀花。……”（《誠齋集》卷十六）則瘴氣又像“黃沙”。大抵南方稱瘴的都是十分濃鬱的嵐霧，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八《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所說“畲烟濃似瘴”當即指此而言。⁹⁸楊萬里《瘴霧》詩也有很具

94 《淮海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十一，頁四十。

95 見《斜川集》卷三。按蘇軾此詩係用《後漢書·馬援傳》：“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96 見《誠齋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七，葉十二。《瘴霧》詩見葉十五，《明發龍川》第二首首句云：“優入蠻溪受瘴煙”。

97 《葛洪肘後備急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校勘本），卷二，頁54。

98 引文據《四部叢刊》初編本，頁47上。《廣西通志·輿地五》說：“天氣炎蒸，地氣卑溼，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

體的描述說：“午時猶未識金烏，對面看人一似無”。（《誠齋集》卷十七）

此外，南方多蛇，有些人認為瘴霧和蛇類有關係，如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雲煙蟒蛇氣，刀劍鰐魚鱗。”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瘴窟蛇休蟄，炎溪暑不徂。”梅堯臣《書竄》：“英州五千里……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宋徽宗敕臣下撰集的《聖濟總錄》卷三十七《瘴氣》也說在廣南“七、八月之間，山嵐烟霧蛇虺郁毒之氣尤甚，故當是時，瘴疾大作。”又說“二廣七閩多山嵐烟霧蛇虺郁毒之氣。”⁹⁹而在三峽地區多蚯蚓，人們則相信蚯蚓在瘴霧致疾的作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范成大第二次登南岳時很有信心地說：“我從蠻嶺瘴煙來，不怕雨雲埋嶽趾。”（《重遊南嶽》）但來到三峽地區，足染雲霧，又不免擔憂起來，其《一百八盤》詩云：“疇昔辭桂林，自謂已出嶺，蛻蟬蠻煙中，恍若醉夢醒。今來峽山路，步步躡雲頂，仍聞蚯蚓瘴，顧與嶠南等”。這是由於當地蚯蚓極多，人們以為“蚯蚓祟人能作瘴”（《入秭歸界》）的緣故。這些當然都是錯誤不實的認識。

實際上南方多霧、山嶺、河川湖海等水面多霧並非異事。當代地理學者告訴我們：“從我國年平均霧日分布圖上仍可以看出一個總趨勢，也就是我國東南半壁霧多，而西北半壁霧少”。即東南半壁空氣較濕潤，富於水氣；而山上或山頂因海拔較高，上升氣流中水氣遇冷凝結成霧；南方多山，山間的河谷盆地因有河川湖泊，水氣豐富，在夜間河谷盆地兩側或四周山坡輻射冷卻的冷空氣沿著山坡下流，使河谷盆地中的水氣凝結成霧；海面水氣也比較多，也易於成霧。¹⁰⁰劉恂所說的“嵐霧作瘴”大體上是指山嶺間的河谷盆地的情形而言的。

上述的一些“地慝”，如蠱、短狐，依下文所述，其存在或致病的機制，按照現代醫學的標準來考量的話，實在是使人無法接受的。而“瘴”依古代較流行的一種看法，如果主要是指瘧疾而言的話，就今日科學的知識來看，實際上也與霧無關。儘管如此，南土，特別是嶠南地區，炎熱潮溼的自然環境，依照現在的衛

99 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年校點本。按《廣西通志》卷八十四《輿地五》還引有類似的說法，如：“草木蔚薈，則虺蛇出沒其間。嵐霧之所蒸，毒氣之所釀，積而為瘴”（《梧州府志》）；“草木蓊鬱，虺蛇出沒，日蒸水氣，積而為瘴”（《郝浴《通志》）；“深山密箐，蟲蛇草木之毒鬱蒸成瘴。溪壑間如絲如縷，如霧如雲，或香酸，或飯氣焦臭，皆瘴也”（《太平府志》）。

100 見張家誠等《中國氣候》頁403、409。又張家誠等《中國的氣候》，頁236、239。

生學或熱帶醫學的調查，確實是宜於許多致疾或傳播疾病的因素孳生繁殖的。在古代文獻裡也常稱南方是“炎瘴地”，如白居易曾稱道州（在今湖南西南）、江州（在今江西北部）、通州（今四川達縣）、忠州（今四川忠縣）為“炎瘴地”¹⁰¹，北宋蔣堂也說“五嶺，炎瘴之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丙午條）。李綱《題唐氏所藏崔白畫雪中山水》詩：“南方炎熱瘴癘地”。（《梁谿集》卷三十）“炎”與“瘴”連用，多少也表明了南方的地理條件與疾病之間的關聯。那麼在南土範圍內確實因其異於北方的特殊地理環境而存在著不少只適應或較適應在南方自然條件下生存、繁衍、活動的病原體和擔當疾病感染媒介的生物，並且由於其活動而引起一些只有南方才有或南土遠較北方常見、流行的疾病。換言之，即在南方存在著一些地方病。近年的調查顯示在全國範圍內為患最為普遍的五大寄生蟲病，即血吸蟲病、瘧疾、絲蟲病、黑熱病和鉤蟲病，其中除黑熱病主要為禍於北方外，血吸蟲病只流行於南方，而其餘三者均以南方為嚴重流行區域，基本上可以說是南土的地方病。¹⁰²

在南方人們所以感染這些常見的地方病，除了自然地理的背景之外，還跟當地居民的一些生活習俗、信仰、日常生產活動等人文因素有關。這裡我們只打算敘述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幾項。

一是南方多河川、湖泊，隨著水利事業的進展，溝渠縱橫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即所謂的水鄉澤國在南土是極常見的景象，因而生產及日常活動常在水上、水中或水邊與水接觸，《淮南子·原道》說：“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縷不綺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說的地點雖是嶺南，但“陸事寡而水事衆”未嘗不是整個南方的普遍現象。南方多

101 見所作《和陽城驛》、《潯陽宴別》、《寄蘄州簟與元九因題六韻》、《不准擬二首》：“憶昔謫居炎瘴地”自注：“予自左遷江峽，凡經七年”即指忠州。

102 按上海出版之《大眾醫學》1950年12月號（5卷2期），《前言：地方病防治前夕》、金寶善《地方病在廣大農村中的重要性》、應元岳《瘧疾在臨床方面的認識》、姚永政《瘧疾的管制》等當代中國著名醫學家之論文均稱瘧疾、血吸蟲病、黑熱病、鉤蟲病等為“地方病”。但到50年代末“地方病”一詞所指已有不同的內容，不含上述各病，同時使用亦較嚴謹。本文“地方病”則仍依較早的意義和用法。又可參考日本學者宮下三郎，《宋元の醫療》一文有“南遷と風土病”一節，亦稱上述等病為南土風土病，即地方病。見叢內清編《宋元時代の科學技術史》（日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7年），頁129至134。

水田，《史記·貨殖列傳》：“楚越之地……火耕而水耨”。又《漢書·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火耕水耨的農作方式十分常見，農民經常有機會與水接觸。杜光庭《錄異記》卷七：“廬山西南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煉丹於此，感到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之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¹⁰³宋羅願《新安志》卷二《敘貢賦》：“歙（安徽歙縣）之人芸以三、四，方夏五、六月，田水如湯，父子袒跣膝行其中，泥深泥，抵隆日，蚊蠅之所撲緣，蟲蛭之所攻毒，雖數苦，有不得避，其生勤矣。”¹⁰⁴由這兩段文字，可以看出有些地區的水中蓄藏著相當有害的因素，對農民的健康是十分不利的。

《史記·貨殖列傳》：“楚越之地，地廣而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漢書·王莽傳下》：“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隋書·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鹽鐵論·論畜》：“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李綱《田家四首》之一描寫南方農家的景象和生活說：“江村煙水遠……田疇塍稅稻，網罟足魚蝦……”（《梁谿集》卷五）南土居民經常捕撈水中的魚蝦螺蚌，這樣也就免不了在水中或水畔接觸到水了。

南方炎熱，人們也常在河湖中洗澡。《尚書大傳》：“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¹⁰⁵《漢書·五行志》：“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又：“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又《賈捐之傳》：“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論衡·變動》：“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六《嶺南道十·貴州》說當地的“里人”也有“男女同川而浴”的風俗。《嶺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蠻》條也說猺族婦人“群浴於川”。

南方人善游泳、操舟是北方人所熟知的。《淮南子·道應》：“白公問於孔子……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

103 引文據《津逮祕書》本，11集，141冊，卷7，葉3，“異水”條。

104 引文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葉十九。

105 孫星衍《孔子集語集解》，頁135，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

主術》篇：“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又《齊俗》篇：“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在水邊清洗衣物、器皿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華陽國志·南中志》：“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臨海記》：“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器，流失酒杯，後出於井中。¹⁰⁶宋王闢之《漁水燕談錄》卷八《事誌》：“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于江邊，爲鱷魚所食。”這也得與水接觸。

儘管遠在新石器時代河姆渡文化的南方先民已經開始鑿井了。¹⁰⁷但一直到很晚的時代，甚至今日，還有為數極多的南土居民仍舊飲用著天然的河流溪泉、湖泊沼澤的水。如《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太平經·起土出書訣》：“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固多病不壽者，何也？”¹⁰⁸《舊唐書·西南蠻傳》：“東謝蠻……依樹爲層巢而居，汲流以飲。”又《李臯傳》：“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按《冊府元龜·牧守部八·興利》的記載更詳細：“嗣曹王臯貞元初爲江陵……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餘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汲陂澤，至夏與牛畜同潦，或汲水數里，行旅重困，臯乃令合錢作井，民以爲便。”¹⁰⁹《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梓夔路察訪熊本言：夔峽州郡民間無井飲，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兩溪水，分布之衢巷……”。

嶺表地區這種情形十分普遍。李綱自注其《錢申伯自海陵避地臨汀聞余北歸相迓於武平（今福建武平）賦詩見意二首》之一說：“嶠南多飲溪流，至武平始得

106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三七引。

10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1期，頁42、49至51。《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頁14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又可參考楊鴻勛的《河姆渡遺址木構水井鑒定》一文，見所著《建築考古學論文集》，頁52至5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108 據王明校《太平經合校》本，卷45，頁121。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109 《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據明刻影印本），卷六七八，葉十二。直到五十年代末湖南湘陰的居民還有“以湖水作為飲用水”的。見湘陰縣委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湘陰縣血吸蟲病個人防護工作的經驗》，《人民保健》1959年第3號，頁280。

井泉甘冽。”（《梁谿集》卷二十七）南宋初章傑《嶺表十說》之九說：“道路多無井飲，而瀕江之民與夫舟行者皆汲江水。其間豈無邂逅遇毒者？此行路之人所以多疾病也。若經烹煎，則非生水。此廝役輩大率飲冷，故尤蹈其患。”（《嶺南衛生方》卷中）《唐書·地理志七上》廣州南海郡南海縣下注云：“山峻水深，民不井汲，都督劉巨麟始鑿四井。”《輿地紀勝》卷一百十《廣南西路·潯州·古癩》：“井一十三所，咸平六年（1003年）以潤水毒惡，飲者多病，於是開鑿井一十三所。”《嶺外代答·風土門·瘴地》：“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

長江流域也極為常見。北宋石介《記永康軍（今四川灌縣）老人說》稱：“永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水凍涸，人去永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焉。其艱也如此。”¹¹⁰《梁書·良吏·何遠傳》：“遷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卷二七《機汲》：“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¹¹¹張籍《江南曲》也說：“江南人家”的情形是“無井家家飲潮水。”陸游《入蜀記》卷三：“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即生活在船上的人亦飲江水。北宋李端叔《卜算子》詞云：“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¹¹²透露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側面。¹¹³

這些牽連到水的日常生活活動、生產勞作所以有危險，是由於這些水有時受到污染，成了危害人們健康的疫水。上文所述潯州十三井即因居民飲用潤水多疫病而開鑿的；周去非也擔心橫、邕等四州的飲用水受到毒物的污染。章傑也說嶺外的江河水難免沒有毒害。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則明白地宣稱嶠南的溪潤水都有毒：“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潤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

110 見《徂徠石先生文集》（陳植錄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九，頁105。

111 《劉夢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二七，頁162。

112 李之儀《姑溪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九至十。

113 這樣取得飲用水的方式在有些地區一直晚到當代還是沒有改變。見《元史·良吏·楊景行傳》：“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黃叔筠《海南島白沙縣少數民族瘧疾調查》（《中華醫學雜誌》）38卷5期，1952年5月）說海南白沙縣“黎區沒有水井，喝的是河裡的生水”。見頁423。又鄭偉如等《日本血吸蟲病之臨床觀三五五例病案之分析》（《中華醫學雜誌》37卷10期，1951年10月）頁829：“江南農村的河流為飲水及洗滌用水之重要來源。”

陸行多飲之……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間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¹¹⁴他們這種顧慮絕不是過敏的杞憂。上引《左傳》已說“川澤納污”，《論語·子張》也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河川在古代不只匯集各段落與支流沖刷來的泥沙、雜物，也容受人們所拋棄的各種廢物或垃圾。¹¹⁵《淮南子·要略》：“夫江河之腐敗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瀆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即人們認為江河廣大，人們的廢棄物不足以使其全面或嚴重污染。但實際上，有些污染的嚴重後果並不是基於古代科學水平所做的過低估計能夠預料得到的。譬如受到有血吸蟲病的患者所排泄的含有血吸蟲卵的糞便的污染，這樣的水就有可能使飲用者以及在這些水中、水畔活動或經過的人受到血吸蟲病的侵襲。¹¹⁶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墓主，第一代轪侯夫人可能就是因為在受污染的疫水上泛舟遊玩而感染了日本血吸蟲的。¹¹⁷

而古代人們的一些生活習俗正製造出了這一重要的環節。最遲自漢代以來，已有記載說南方有一些終身居住、生活在船上的水上人家：“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東漢桓帝永興二年（154年）但望上疏說巴郡郡治江州（今四川重慶）的居民有“結舫水居五百餘家”。（《華陽國志·巴志》）唐李肇《國史補》卷下：“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大曆、貞元間，有渝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¹¹⁸這些水上居民或船上的乘客在舟上活動所產生的垃圾或排泄物就是河川湖沼的污染源之一。《論衡·雷虛》給了我們重要的訊息：“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這裡所說的“洿”，即“污”，究

114 據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029。

115 《宋史·河渠七》說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就是一個例子。

116 湖南湘陰縣血吸蟲病防治工作者勸導人們要注意的事項中，就有“不喝生冷水”、“不屙野糞”兩件事。見湘陰縣委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前引文，頁279。

117 見談正吾《西漢女屍怎麼會患血吸蟲病》，《歷史大觀園》1988年3期，頁23。

118 據汲古閣本，卷下，葉二十二。

竟指什麼，不易確定，依《雷虛》篇上下文來看，極可能指排泄糞便而言。¹¹⁹明末徐霞客與僧靜聞相約偕往雲南雞足山一遊，途中舟行路程甚多，《徐霞客遊記》卷二下《楚遊日記》記靜聞在湘南夜泊時曾“因小解涉水登岸”，自注云：“靜聞戒律甚嚴，一吐一解，必俟登涯，不入于水。”卷三下《粵西遊日記》又記載靜聞抱病在舟中的情形：“靜聞以病後成痢，堅守夙戒，恐污穢江流，任其積垢遍體，遺臭滿艙，不一浣濯；一舟交垢（按：當是“訴”之誤字）而不之顧。”¹²⁰靜聞堅守佛教戒律，不嘔吐或排泄糞便於江河水中，而他人則並不如此。這樣，王充所說的“人飲下流”或在下流活動的人就有染病的危險了。

其次，廁所建在靠近水邊之處也造成水的污染。宋王質《雪山集》卷六《玉淵龍記》記廬山五老峰傍有瀑布，下墜於深潭，“是爲玉淵”，“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於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爲廁，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爲是雌龍也……”¹²¹這個故事說明了當時已有人利用河岸來興建廁所。這種設想並非絕無僅有的念頭。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獵》提到當時留居中國的阿拉伯商人也有類似做法：“番禺有海獵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蕃人，本占城之貴人也……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定居城中……居無洩區，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廁鏗然有聲。”直到近年的調查研究表明不論是在中國南方，還是在菲律賓，這種水邊的廁所都是污染水源，傳播血吸蟲病的一個重要環節。¹²²

七世紀後半期唐沙門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便利之事》談論僧侶們便後“洗手洗身”的事，說：“江淮地下，瓮（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即爲洗淨。

119 又可參見拙作《關於兩漢魏晉時期養豬與積肥問題的若干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本4份，1986年。

120 引文據褚紹唐等整理本《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01、445。五十年代湖南湘陰縣血吸蟲病防治工作者展開管糞工作，始將全縣的水上居民，即船民、漁民的船上裝上馬桶，設了糞罐，“作到了船舶有馬桶（或糞罐），改變了過去糞便入河、飲用疫水的現象”。見湘陰縣委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前引文，頁280。

121 引文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葉三至四。

122 見張國高《看江南鄉村的環境》，《大衆醫學》1950年6月號，4卷2期，頁80。

宜應別作洗處，水流通出為善。”¹²³其實，這麼做也免不了會污染土壤和水。

另外，上引《冊府元龜》李臯在江陵一帶為民開井的事提及江陵一帶的居民用水“悉汲陂澤，至夏與牛畜同潦”。這也是極不衛生的，由於牛等家畜同樣可以自然感染日本血吸蟲病，成為保蟲宿主，其糞便同樣可使陂澤成為疫水。¹²⁴

在近年展開的血吸蟲病防治運動中，加強糞便管理是一不可或缺的環節，而管制人們在河邊洗刷馬桶、糞具則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這種習俗起源於何時，很難考察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杭城戶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運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已。”¹²⁵雖有人收去，但馬桶勢必常清洗，估計清洗的地點就在河湖水渠岸邊。則最遲在宋代已有大量城鎮人口年年日日地因洗刷糞具而嚴重地污染著水源。

人畜隨地大便而產生的野糞也是當代醫學工作者在致力於糞便管理時所不能輕易放過的水土污染源。范成大《驂鸞錄》說“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漿家皆不設圍溷，行客苦之。”¹²⁶明末徐霞客也提到湖南永州愚溪橋附近“石甚森

123 據台北，白馬精舍印經會景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2125號，頁218下欄。

124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九引《抱朴子》：“南方水牛，無冬夏，常臥水中”。梅堯臣《江畔》詩：“江畔蓼蒲碧無主，吳牛夜駢江干歸”。《玉編》：“駢，馬轉臥土中”即指牛在江畔泥水中翻身打滾。陸游也有幾首詩敘述牛在水中、水邊活動的情形。《十二月八日步自西村》：“牛跡重重野水濱”。《遊雲門諸蘭若》：“牛行響白水，鷺下點青秧”。《牧牛兒》：“溪深不須憂，吳牛自能浮”。鄭偉如等前引文，頁830：“著者在鄉間常見牧童牽牛至溪中，牛即排糞排尿。查我國鄉間牛群之患血吸蟲病屢見各家報告，任牛糞沾污河水之惡習，其有利於人類血吸蟲病之傳播，無可置疑”。徐秉鏡等《廣東的地理環境同血吸蟲病流行的關係》一文指出在廣東的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秋冬水位退落後，大批的牛隻放牧在草塘裡，牛糞占這時期及春水剛開始漲時期污染水源的主要地位”。見《中華醫學雜誌》1958年11號，1038頁。又，中華醫學會《新中國血吸蟲病調查研究的綜述》也說“根據調查”，感染日本血吸蟲病的家畜以“耕牛的感染率最高，耕牛感染後，不但每天排出大量糞便，對人的危害很大……”，見《人民保健》1959年第1號，頁14。近年血吸蟲病防治工作者也說：“水牛糞中〔血吸〕蟲卵數較黃牛為少，但水牛喜排糞于河邊及水田中，故水牛血吸蟲感染的流行病學意義不亞于黃牛。”見毛守白等《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20，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年1版，1982年第5次印刷。

125 引文據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245。1956年。

126 據《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3至14。

幻”，但“行人至此以爲溷圍，污穢靈異，莫此爲甚。”¹²⁷估計在古代，野糞也是十分常見的。

這些都是導致土壤及水源污染的因素。

再則是南土居民，包括非漢人的少數民族在內，雖然也有醫藥知識，也採用醫藥治病，如唐《新修本草·菜部》卷十八，《蒜》條下自註：“與胡葱相得，主惡蟻毒、山溪中沙蟲、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時用之也。”¹²⁸《嶺外代答》卷四：“間有南人熱瘴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瘴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唇，其法捲其唇裡，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並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出血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瘴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瘴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是得汗法耳。人之上、下唇是陽明胃脈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足見南方人有病亦用針、藥治療，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還是有效的。

然而在文獻中，特別是南來的北方人心目中，南方人有病不訴諸醫藥而祈求鬼神或施行巫術，或置病人於不顧的習俗卻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如《唐書·循吏·羅珦傳》：“擢廬州（今安徽中西部）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四《次韻定國聞蘇子由臥病績溪》：“炎洲冬無冰，十月雷虺虺。及春瘡癘行，用人祭非鬼。巫師司民命，藥石不入市。”¹²⁹南宋初王之道《故李公孝先墓誌》記李孝先爲無爲縣（今安徽無爲）令，當時“南方信禳，雖至父母癘疫，子棄不敢侍。里中有蹈此者，公責以大義，且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瘡，理也。爾乃不問醫而問巫，愚亦甚矣！”¹³⁰宋李觀《邵氏神祠記》：“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

127 《徐霞客遊記》卷二下《楚遊日記》，頁213。按野糞在水源污染、傳播血吸蟲病上有重要意義，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湖沼地區防制血吸蟲病的經驗》，《人民保健》1960年第2號，頁89。波爾德列夫，《關於消滅血吸蟲病措施的幾點意見》，《中華醫學雜志》1956年第4號，頁401。《湘陰縣血吸蟲病個人防護工作的經驗》，《人民保健》1959年第3號，頁278。《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69。

128 按原文“山溪中”缺“山”字，據《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二八，葉三引文補。台南，正言出版社據光緒甲辰武昌柯氏刊本影印，1977年。

129 引文據《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四，頁三十四上。

130 王之道《相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九，葉五。

於神。”¹³¹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又卷三：“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智），因信巫祈鬼。”

一〇四六年蔡襄《太平聖惠方後序》：“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過醫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¹³²南宋梁克家說：“慶曆中，蔡公襄爲守，尤深惡疾家依巫索祟之弊，蓋非獨古田然也……然不擇貴賤，愚者常易惑；不問富貧，弱者常易欺。故風俗至今未能盡革。每一鄉率巫嫗十數家，姦民與爲道地，遇有病者相爲表裡，既共取其貨貲，又使其不得訪醫問藥以死。如是者可痛也。”¹³³

《唐書·李德裕傳》：“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禱巫，雖父母癟疾，子棄不敢養。”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四《潤州州宅後亭記》：“吳、楚之俗，大抵信禱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焉。民病且憂，不先醫而先巫。”¹³⁴

兩湖也有這類風俗。北宋劉摯《荆南府圖序》說鄂西江陵一帶的居民“尚鬼，病者先巫後藥。”¹³⁵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荆湖民俗……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親族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¹³⁶周必大說湘西“俗病，屠牛祭鬼。”（《文忠集》卷七十四）《梁書·止足·顧憲之傳》說衡陽“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

四川也有報導，《舊唐書·高士廉傳》：“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遙以哺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十二月：“李惟清……下邑人，嘗爲涪陵（今四川涪陵）尉，民尚

131 據王國軒校點本《李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三十，頁337。

132 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九《土俗類一·戒諭·勸用醫》。

133 《淳熙三山志》卷九《公麻類三·諸縣祠廟》末自注。

134 據管成學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35 見《忠肅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葉1至3。

136 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十九。

淫祀，疾病不療治，聽命於巫。”王安石《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稱閬州（今四川閬縣）“氓疾不治，謁巫代醫。”¹³⁷范鎮《東齋記事》卷四：“廣安軍（今四川廣安）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1040年）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¹³⁸程顥《華陰侯先生墓誌銘》：“調知巴州化成縣（今四川巴中），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¹³⁹《宋史·周湛傳》：“通判戎州（今宜賓市一帶），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爲事。”又，“壁山（今四川壁山縣）有淫祠，民病輒解牛以祭。”（《文忠集》卷三十四）李石《皇甫孺人墓誌》：“掌蜀學……弟子員至千餘。春煽疫，同舍畏厲鬼，不肯視病。”（《方舟集》卷十七）

至於嶺南則更爲著名。《獨醒雜志》卷三：“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九月“覽《邕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於是下詔“嶺南諸州”長吏，要求對當地人民“病不求醫”等習俗，“深宜導化，使之悛革”。（《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雍熙二年九月）《嶺外代答》也說“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十月：“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南宋張栻在靜江軍（今廣西桂林市）所發《諭俗文》說“管下舊來風俗不美”，其中有兩項，一是：“愚民無知，遇有災病等事，妄聽師巫等人邪說，輒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棺，栖寄它處，謂之‘出祖’”；另一項是：“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淫祀誨禱，因循至死。反謂祈禱未至，曾不之悔。甚至臥病在床，至親不視。”¹⁴⁰又“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己巳條）秦觀《雷陽書事》詩說：“駢越風俗殊，有病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瞽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主治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淮海集》卷六）南宋初章傑《嶺表十說》之八云：“俚俗有病，必召

137 《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九十六，頁603。

138 《叢書集成初編》本，卷四，頁二六。

139 見《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王孝魚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四，頁504。

140 《南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五，葉十五、十七。

巫覡而祭鬼神。士大夫咸笑其信巫不信醫。”¹⁴¹

與病不求醫相關的就是南土缺醫少藥。在交通不便的山區尤其如此，元稹《叙詩寄樂天書》說自己“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夏多陰霪，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¹⁴²杜牧《祭周相公文》也說桐廬（今浙江桐廬）“晝有毒霧，病無與醫。”¹⁴³南宋王棐說“過桂林以南無醫藥。”（《嶺南衛生方》卷上《指迷方瘴瘧論》）蘇東坡在嶺南也屢言無藥。¹⁴⁴即使有少數醫師，也是醫術十分有限的，而市場上則很難買到藥材。上引蔡襄《太平聖惠方後序》已表明醫藥的傳布因人們“左醫右巫”而受到顯著的影響，章傑檢討嶠南信巫不信醫的習俗時也指出“蓋嶺外良醫甚鮮，凡號爲醫術者，率皆淺陋。又郡縣荒僻，尤乏藥材；會府大邦，間有醫藥，且非高價不售，豈閭閻所能辦？況於山谷海嶼之民，何從得之？彼既親戚有疾，無所控告，則不免投誠於鬼，因此而習以成風者也。”信巫不信醫與缺醫少藥兩者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章傑並說“近歲北醫漸至”，但在嶺南醫藥的普及還是相當緩慢的。¹⁴⁵長久以來南方常見的這種“信巫不信醫”和缺醫少藥的情況，所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是耽擱延誤了病人救治的時機，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助長了疾病的蔓延，導致更高的疾病死亡率。

總之，南方的氣候或地理特徵、醫藥衛生條件、居民的一些生活習俗和信仰，使得許多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的病原體和疾病傳播媒介生物獲得了理想的生存空間，得以大肆繁殖、活動，導致人們產生一種普遍而深刻的現象，即南土的地

141 關於這類的記載還有不少，不必一一列舉，筆者將另撰文討論。

142 《元稹集》，卷三十，頁353。又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之三說：“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

143 見《樊川文集》，頁205至206。

144 《與王庠》尺牘之一：“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第二首：“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水……無醫藥”。《與姪孫元老四首》之一：“海南連歲不熟……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酢醬等皆無。”《與參寥子》第十七首：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所撰《藥誦》：“吾始得罪遷嶺表……地無醫藥，有亦不效。”

145 萬曆四年（1576年）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鄒善重刊《嶺南衛生方》時命婁醫安道附以八證及李東垣《藥性賦》於後，安道按語云：“北人初至百粵，及於遐荒絕域之地，其業醫者，既鮮且繆。”（鄒善《原序》及卷下按語）可見醫藥在嶺表的傳布到這時還在許多地點存在著不少困難。

方病十分猖獗，而北方則不如此。

四、幾種主要的南方疾病

(一)瘡疾

據上文所述，南土是多疾病的。瘡疾就是南方的一種主要的流行疾病。陳邦懷先生認為在殷墟甲骨文中已經有了“瘡”字¹⁴⁶，這一主張並沒有得到古文字學者的普遍接受。¹⁴⁷但學者認為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了“虐”字，並且與“蠱”字連用，作“蠱虐”。¹⁴⁸則可能當時假借“虐”為“瘡”字。據《說文解字》七篇下，“瘡”是“寒熱休作病”。許慎還告訴我們另外兩個瘡病的字，一是：“痞，有熱瘡……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痞。”另一個是：“疚，二日一發瘡也。”鄭玄注《禮記·月令》“民多瘡疾”說：“瘡疾，寒熱所為也。”劉熙《釋名》說：“瘡，酷虐。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五《釋言》：“疚、痞，瘡也。”¹⁴⁹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也說：“痞，瘡疾。”此外，還有一個“瘴”字，唐代王贊《外台祕要》卷五：“《備急》：‘夫瘴與瘡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嶺南率稱為瘴，江北總號為瘡。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

按中國傳統醫學的診斷主要是根據病患的體徵，所診斷的疾病名稱也多是證候的名稱，因而中國古代醫學的治療也是根據臨床病理現象來著手進行的。¹⁵⁰像上引許慎、劉熙對瘡的解釋，又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惡寒發熱如瘡”

146 見所著《甲骨文零拾》中第139片之考釋。葉42至4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

147 袁庭棟、溫少峰贊同其說，見所撰《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頁326至327。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但考古研究所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七·十一，頁304 只將陳先生所釋為“瘡”之字隸定為“牴”，而非“瘡”。又李孝定先生亦只將該字收入《甲骨文字存疑》中，見頁4527至4528。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

148 見裘錫圭《甲骨文字考釋（八篇）·釋虐》，《古文字研究》第四輯，頁161至162。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149 《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五，頁54。

150 參考朱顏《中國古典醫學症候治療的一般性規律（續）》，《中華醫學雜誌》1954年第11號，頁865至868。葉橘泉《如何研究中醫中藥治療血吸蟲病》，頁296，《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4號。沈悟岐《癩疝與絲蟲病》，頁168，《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4月號。

等都是以症候名病的例子。然而以現代醫學的認識而言，具有周期性的發冷、發熱臨床證候的疾病，並不限於由瘧原蟲所引起的瘧疾病。例如早期的黑熱病表現的臨床證候不夠典型，其中的瘧疾型病人可每日或隔日發作一次發冷、發熱、出汗；其中的雙峰熱型病人則每天有兩次發作。這些症狀，在沒有實驗室診斷的情況下，即使在今天也可能誤診為瘧疾，在古代當是包含在瘧疾一名之內的。¹⁵¹古代醫家所說的“瘴瘧”一名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按《內經》說：“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瘴瘧’。”其後《傷寒論》、《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在敘述瘴瘧時均沿相而不改。但北宋徽宗敕臣下編撰的《聖濟總錄》卷三十四在此之外提到了另一種瘴瘧的症狀說：“瘴瘧發作有時，但熱不寒，頭痛不安，通身俱黑，大腸祕結，小便黃赤。”其中“通身俱黑”或許就是黑熱病患者臨床表現的面部、四肢及在某種程度上軀幹的皮膚因色素沈著而逐漸變為黑暗的症狀。¹⁵²結合黑熱病在中國，特別是北方的廣泛分布來看，在傳統醫學的瘴瘧裡包含著有由利什曼原蟲所引起的黑熱病並不是不可能的。

對於得病之因，古醫家有許多說法，各家之間也不全一致。《素問·瘧論》：“瘧瘧皆生于風”；“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又《陰陽應象大論》篇說：“夏傷于暑，秋必瘧瘧。”《諸病源候論》敘述山瘴瘧說：“此病生於嶺南帶山瘴之氣……皆由山溪源嶺嶂濕毒氣故也……原其所歸，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氣，二、風溫痰飲，三、加之鬼厲，四、發以熱毒。”關於“瘴氣”的感染，《聖濟總錄》卷三七有相當具體的說明：“七、八月之間，山嵐烟霧蛇虺郁毒之氣尤甚。故當是時，瘴疾大作，不論壯老……或衝烟霧，或涉溪澗，但呼吸斯氣，皆成瘴疾。”¹⁵³《外台祕要方》卷五引許仁則之說：“此病之候，乃有數種。亦有宿患

151 見高鏡朗編著《古代兒科疾病新編》，頁144至145。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6年。又可參考鍾惠瀾主編《熱帶醫學》，頁687。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

152 見應元岳著《熱帶病學》，頁36至37。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按有些記載說瘴病患者全身發黑，不知是否是黑熱病或同時患有黑熱病。

153 更晚的《明醫雜著》也說：“春秋時月，人感山嵐瘴霧毒氣，發寒熱，脇膈飽悶，不思飲食。此毒氣從鼻口入內也”。見明朱崇正附遺於楊士瀛《仁齋直指方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印明嘉靖庚戌刊本），卷三，葉四十三。又，按上引《呂氏春秋·盡數》及下文所述，古代人普遍認為霧有害於健康。但也有少數道士認為“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也，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因而有“服霧之道”或“服霧法”。見梁陶弘景《真誥》（《學津討原》本），卷十三，葉四。

痃癖，飲食失宜，因節氣初交，亦生此病。亦有痰滯積聚，久不通散，冷熱相攻，亦生此疾。亦有地居卑濕，時屬暑熱，內有宿病，外感惡氣，亦生此疾。亦有盛夏蒸熱飲冷，冷熱間隔，秋夏氣交，亦生此疾。以要言之，終由飲食失常，寒暑乖宜，上熱下繫。”至於南宋陳言《三因極一病症方論》則主張瘧病的“外因”有“傷寒”、“傷風”、“傷於暑熱”、“因汗出復浴，濕舍皮膚及冒雨濕”、“陽虛陰盛，多感陰濕”等；總之，是“外感風、寒、暑、濕”。其“內因”則是以“蓄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失志傷腎”等；總之，是“臟氣不和，鬱結涎飲所致”。另外，還有“不內外因”，例如“胃瘧”是由於“飲食飢飽所傷胃氣而成。”《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八，寶慶新增方，勝金圓條下說：“一切瘧病，發作有時，蓋因外邪客于臟腑，生冷之物內傷脾胃”。¹⁵⁴章傑《嶺表十說》之一指出：“夫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痰結。”又說：“回頭瘴，大率得之道途間冒暑氣，與夫飲食居處失度也。”

當然在這些因素之中，一個估計是最古老的病因，就是“瘧鬼”。衛宏《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瘧）鬼。”¹⁵⁵上引《諸病源候論》也說“鬼厲”是瘧病的病因之一。孫思邈《金千翼方》中更詳細地開列了十二種不同的“瘧鬼”。（《外台祕要方》卷五《十二時瘧方一十二首》引）《聖濟總錄》也說：“本於鬼神”是瘧疾的病因之一，即在人們身體虛弱的情況下，“鬼邪投間而入”也可使人發瘧病。（卷三十四《諸瘧統論》，卷三十五《鬼瘧》）梅堯臣《聞刁景純侍女瘧已》詩也說：“蠶師尤飲食，冷滑滯在脾。次聞有鬼物，水火陰以施。”（《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三）人鬼之外，葛洪還指出“獮猴之鬼，令人疾瘧。”（《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抱朴子》）

此外，《嶺表錄異》及唐代鄭熊《番禺雜記》都記載了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病因，即所謂的“瘴母”：“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¹⁵⁶盛弘之《荊州記》也提到一則十分特殊的致瘧病因：“

154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點校本）頁78至81。《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劉景源點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年），卷八，頁277。

155 《後漢書·禮儀志中》注引。又《論衡·訂鬼》篇：“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宋曾慥《類說》卷三十五所錄《事始》“疫鬼條：祀紀曰：顓頊氏有二子，生而亡者，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

156 鄭熊所記瘴母見宋曾慥《類說》（台北，新興書局影印《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一編，第一冊），卷四。

始興含淮（按：當是“洭”之誤字）縣（今廣東英德西北）有翁水，下流有聖鼓，橫在川側，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瘧疾。”¹⁵⁷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醫學文獻當中，對瘧疾所以感染發病的病因、病理、臨床證狀以及治療，最早的有系統的論述，見於《素問·瘧論》篇。論云：“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頸，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又《素問·刺瘧》篇說：“令人先寒，酒漸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¹⁵⁸

現代醫學將人類所患的四種瘧疾（間日瘧、三日瘧、惡性瘧、卵／蛋形瘧）所共有的典型臨床發作分為四期。首先，是前驅期，患者有疲乏、不適感。等到瘧原蟲在人體內進行的無性生殖發展出明確的節奏性之後，臨床體證才會顯現出接下來的三期。按鄭玄注《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一句說：“志倦則欠（打哈欠），體倦則伸（伸懶腰）”。又注《禮記·曲禮上》“君子欠伸”句說：“君子有倦意也”。則“欠伸”指精神、身體均感疲倦而言。《內經》所說的“伸欠乃作”就是指在出現疲倦不適的體證之後，周期性的寒熱發作就開始了。即《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雜病》“剋效餅子”條所說：“一切瘧病發作有時，先覺伸欠，乃作寒慄。”第二期是發冷期或寒戰期，患者全身發抖，下巴抖動；即所謂的“寒慄鼓頸”。接下來是發熱期，有高熱，頭痛劇烈，口渴，多想喝涼水，即《內經》所說“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最後是出汗期，就是《刺瘧》篇所說的“熱去汗出”。可見《素問》的作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瘧疾典型發作的四個階段。

《瘧論》篇也指出瘧疾的發作有其周期性，有“日作”，有“間日而作”，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等。間日瘧和蛋形瘧是“間日而作”的，也就是上引《說文解字》所說的“癢”；當然，今日醫學告訴我們，發熱期不規則的惡性瘧也可以隔天發作一次。“間二日”發的則是三日瘧。至於“日作”的就比較複雜些，即可能包括下列幾種情形，有每天發作的惡性瘧，無免疫力病人初次感染發作的間日瘧，還有間日瘧、蛋形瘧、三日瘧的雙重、三重感染所造成的每日發作，以及同

157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按《水經·洭水注》：“翁水……西南流注于洭，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崖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雖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撞者，輒有瘧疾。”與此稍有不同。

158 引文據《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頁220，刪去“酒漸”二衍字。

時感染或混合感染了兩、三種瘧原蟲時所產生的“日作”。當然最後一種情形，其寒熱休作的臨床表現就更複雜了。

金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瘧非脾寒及鬼神辯》說“瘧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瘧皆不死”。¹⁵⁹或許由於他居住在北方，對“嵐瘴”（當然是其中的惡性瘧）的證狀無法多接觸，知道得不夠詳細，未能多加敘述。但南方的醫家或好事者就有比較細緻的觀察了。南宋王棐《指迷方瘡瘧論》說瘧“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疾瘧，謂之‘冷瘧’；重者蘊熱沈沈，晝夜如臥炭火中，謂之‘熱瘧’；其尤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痘瘧’。冷瘧必不死，熱瘧久而死，痘瘧無不死者。”《嶺外代答·風土門·瘧》所載與此略有不同：“南方凡病，皆謂之瘧，其實似中州傷寒……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疾瘧，謂之‘冷瘧’；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炭火，謂之‘熱瘧’；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痘瘧’。冷瘧未必死，熱瘧久必死，痘瘧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宋太醫助教許洪《指南總論·論瘧瘧證候》也提到“瘧瘧病”“有啞不能言者”。¹⁶⁰釋繼洪《治瘧續說》也說：“痘瘧即熱瘧之甚者。”（《嶺南衛生方》卷中）章傑《嶺表十說》之九告訴我們痘瘧病患的病程一般十分短促，很快即可導致死亡：“瘧類不一，而土人以痘瘧最為危急，其狀初得之即失音，不過一、二日不救。”據今日醫學的認識來看，惡性瘧凶險型中的腦型或昏迷型以及腦型間日瘧病例的病程中有時會出現語言困難或失語現象，即使是在治癒之後，還可能殘留失語的後遺症。痘瘧當即指出現失音或語言困難證候的上述幾種類型的瘧疾。周去非所說的“重者”和“更重者”或“熱瘧”當都是惡性瘧，惡性瘧一般沒有寒戰，只有畏寒感，高熱者多見，即所謂“純熱無寒”、“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炭火”；其中的“更重者”當是惡性瘧中出現持續高熱的病例或凶險型中的超高熱型，持續高熱的發熱期往往可以長達二十至三十六小時以上。¹⁶¹

159 引文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0 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所附《指南總論》卷中，頁448。

161 以上所述有關瘧疾之各點，可參考鍾惠瀾主編《熱帶醫學》，頁662至663。“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局”編《瘧疾防治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頁17至20。吳征鑒、毛守白等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頁10至11。

《本草經》中還有“鬼瘡”一名¹⁶²，《聖濟總錄》卷三十五：“論曰：鬼瘡者，外邪之所乘也。人真氣內虛，神守不固，則鬼邪投間而入。故恍惚喜怒，寒熱更作，若有所持而屢發屢止也。治法宜禳去之，而兼以祛邪安神之劑。”¹⁶³又，《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說：“病者寒熱日作，夢寐不祥，多生恐怖，名曰鬼瘡。”又南宋朱佐《類編朱氏集驗醫方》卷二《傷寒門·諸瘡》中“五苓飲子”一方能“治瘡疾發作，讐言妄語，如感鬼神，或時大叫”的證狀。¹⁶⁴按在發熱期中，病情較重的患者可以出現讐妄的現象，特別是在惡性瘡凶險型的腦型或昏迷型以及超高熱型中，常有昏迷、精神錯亂或讐妄等症狀；腦型間日瘡也有少數病例表現出定時性昏迷、尖叫亂語等症狀。許洪在論瘡瘍證候時也表示患者有時會表現“發熱不寒，渾身似火，頭痛煩渴”、“讐語亂言”的情況。¹⁶⁵鬼瘡當即指此而言。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先體病源》：“八醫者：……四論鬼瘴……鬼瘴謂是邪魅……”鬼瘴無疑即鬼瘡的別稱。

《金匱要略·瘡病》：“病瘡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瘥，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瘡母’”。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傷寒方·溫瘡》：“瘡歲歲發，至三歲，或連月發不解者，以脇下有痞也。”《仁齋直指方論》卷十二《痃瘡方論》也說瘡疾“彌年閱歲”之後，“邪氣伏藏脇間，結爲癥癖，謂之‘瘡母’”。¹⁶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六：“病者經年不差（瘥），差後復發，遠行久立，下至微勞，力皆不任，名曰‘勞瘡’。亦有數年不差，不藥不斷，結成癥癖在腹脇，名曰‘老瘡’，亦曰‘母瘡’。”又《嶺南衛生方》卷中：“癥瘡者，胸脇間有氣癖一塊。”所謂“癥瘕”、“氣癖”、“痞”、“瘡母”，當是指病患有肝、脾腫大的體證。脾腫在瘡疾發作次數增加時，

162 《本草經》，《草部下品》：“芫華，味苦溫有毒。主治……蠱毒、鬼瘡……”。

163 《千金要方》卷三十五有“禳瘡法”、“治瘡符”。《千金翼方》治“十二時瘡”的方法也近乎壓勝巫術；《外台秘要方》所錄“禳瘡法”中有“書瘡法”、“咒瘡法”。

164 朱佐書據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校點本，頁33。

165 證妄症狀，見鍾惠瀾，前引書，頁663。吳征鑒、毛守白等，前引書，頁11。《瘡疾防治手冊》頁18、20。趙叔惠《惡性瘡的惡型發作》，《中華醫學雜誌》，1957年第7號，頁544。翁德立《間日瘡的特殊臨床表現和并發症》，《中華醫學雜誌》1973年5期，頁301。按《傷寒論·辨太陽脉證并治下》已提到讐妄的情形是可以像看到鬼一樣：“婦人傷寒……晝日明了，暮則讐語，如見鬼狀者。”（《四部叢刊》初編本）

166 這一“瘡母”與上述瘡病病因的“瘡母”不同。

會逐漸增大，質地變硬；肝腫則發生在脾腫之後；在發作幾次之後，病患會出現貧血現象，長期患者可導致嚴重營養不良和嚴重貧血。“勞瘡”所說的當即嚴重營養不良或貧血的情況。《儒門事親》卷一《瘡非脾寒及鬼神辯》：“又有瘡瘍，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狀如覆杯，是爲瘡瘍，猶瘧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¹⁶⁷說的也是上述的病情。梅堯臣的兩首詩則給了我們一個具體的例子，《聞刁景純侍女瘡已》：“前時君家飲，不見吹笛姬。君言彼娉婷，病瘡久屢治，隔日作寒熱，經時銷膏脂……今雖病且已，皮骨尚尪羸。”又《景純以侍兒病期與原甫月圓爲飲》詩也說刁氏侍女：“渠今纏瘡尚苦羸。”

按照今日醫學的瞭解，間日瘡和蛋形瘡可以“復發”，而惡性瘡、三日瘡則有“復燃”的問題。古代醫學則不及於此而均視為再發。如《仁齋直指方論·治證提綱·瘡後調理》說：“瘡之爲厲，大抵連綿。有病瘡以後，或飲食失節，或恚怒傷中，或梳洗感風，又再發者。”另外還有所謂的“回頭瘡”。釋繼洪《衛生補遺回頭瘡說》：“舊傳出嶺有‘回頭瘡’者，大概與在廣而發瘡及方入廣而不伏水土者不異。”即在北歸出嶺之後發瘡，因而稱爲“回頭瘡”。“回頭瘡”極可能是在嶺表已經感染了瘡疾，等到出嶺之後，潛伏期剛好結束，於是症狀就開始發作了；或者是曾患過瘡疾，已經治愈，出嶺之後，剛巧復發或復燃。

上引《金匱要略》說瘡疾十五天或一個月即可自“愈（癒）”。確實蛋形瘡症狀較輕，發作次數一般在六次以內，易於自癒。而間日瘡在不加治療的情況下，其周期性的症狀發作，頭一、二次較輕，而後加重，隨著患者免疫力的產生，症狀又逐漸減輕。患者約經六到八次或多至十次的反復發作，即可自行緩解，不治而愈。”¹⁶⁸那麼《金匱要略》的作者在間日瘡的預後上和今日醫學的認識大體上是相當一致的。李觀《聞女子瘡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詩：“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溼地，頗失飲食節，脾官驕不治，氣馬癰如絣，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發。江南多此疾，理不憂顛越……”即基於這一預後的論斷而說的。張從正以及《指迷方瘡瘡論》及《嶺外代答》中“冷瘡”、“熱瘡”、“痘瘡”的預後，從當時的醫藥科學水平來衡量，大體上也是精到可信的。¹⁶⁹

167 脾腫大、貧血等症候可參考鍾惠瀾上引書，頁663。《瘡疾防治手冊》，頁11至13。

168 見鍾惠瀾上引書，頁663。應元岳，前引書，頁7。

169 應元岳，前引書，頁13。

瘧疾在地球上的分布非常廣泛，其範圍大致介在北緯60度和南緯40度線之間。¹⁷⁰端拱元年（988年）宋真宗“謂宰相曰：‘今歲炎暑尤甚。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¹⁷¹劉禹錫《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袁公挽歌》詩云：“丹旐發江臯，人悲膺亦號。湘南罷疹市……”（《劉夢得文集》卷十）稱湖南南部的定期集市為“疹市”。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交代了“疹市”的意義：“蜀有疹市而間日一集，如疹瘧之一發，則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為市喻。”¹⁷²用瘧疾的冷熱發作來比人生裡的年年歲歲的寒暑更替和集市的熱絡與冷清，又用瘧疾病患的羸弱來比喻老齡的衰弱，可見古代中國人對它並不陌生。歷史所載受瘧疾之苦的人為數相當可觀。《左傳》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¹⁷³哀公二年記載晉國趙氏與鄭戰於鐵，將戰之時，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可見瘧疾在春秋時代的中國北方是相當常見的。漢光武帝雲臺二十八將之一的景丹極可能就是因瘧而致命的。《後漢書·景丹傳》記建武二年（26年）“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注引《東觀漢記》說：“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魏晉之際皇甫謐《玄晏春秋》自述說：“夏四月，予瘧於河南，歸于新安不瘳。”（《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那麼這位長年羸疾的處士也曾受過瘧疾的折磨。《隋書·柳機傳》附子《柳述傳》：煬帝“徙述于龍川郡（今廣東惠州）……述在龍川數

170 吳征鑒、毛守白等，前引書，頁9。

17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太宗端拱元年。又李綱《苦熱行》詩：“人生寒暑為寇仇，何異瘧腐脂髓搜。”亦有此意。

172 據李裕民點校本，頁30。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73 按《左傳》襄公七年，鄭國“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俞樾《群經平義》以為“瘧疾”古本作“虐疾”，猶言暴疾。可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953。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按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卷八《十三經病疏·左傳病疏》，頁348。對此“瘧”亦以為可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年。余巖又認為“齊侯疥，遂痁”或是因化膿菌所成之瘡癤引起間歇性寒熱休作的化膿熱，而不必是瘧疾。見同書，頁131至134。

年，復徙寧越（今欽州北），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極可能也是因惡性瘡而喪生的。劉智才也因“遭厲虐（瘡）疾，終于雲安郡奉節縣（今四川奉節）之里第。”¹⁷⁴杜甫在長安時（約在754年），有《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一首說：“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熟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可見他受了長達百日的瘡疾之苦，病癒後還相當虛弱。後來他西走洮隴，仍然沒有擺脫瘡疾的糾纏：“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原註：時患瘡疾）》）這次的病當是間日瘡。764年在四川又作《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末四句說：“瘡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仍然困於寒熱之苦。杜甫遷居夔州之後，《寄薛三郎中璩》詩有句云：“峽中一臥病，瘡癘終冬春”。可見他在十多年間飽嘗了瘡疾之苦。¹⁷⁵韓愈《納涼聯句》：“炎湖度氛氳，熱石行犖礧，瘠飢夏尤甚，瘡渴秋更數。”又有《謫瘡鬼》詩一首，這樣看來，他也曾患過瘡病。¹⁷⁶柳宗元《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說自己“孤囚廢錮，連遭瘡癘羸頓，朝夕就死。”估計他也困於瘡疾之苦。他的親戚裴瑾“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竚泄卒。”（《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誌》）呂溫之弟呂恭爲桂管都防禦副使，離職後“至廣州，病瘡加癰，六月二十八日卒。”（《柳河東集》卷十《呂侍御恭墓誌》）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年）元稹貶爲江陵士曹參軍¹⁷⁷，白居易有《聞微之江陵臥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雲膏寄之因題四韻》詩云：“已題一帖紅消散，又封一合碧雲英，憑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瘡，且圖遙慰病中情……”元稹亦有答詩題爲《予病瘡樂天寄通中散碧腴垂雲膏仍題四韻以慰遠懷開拆之間因有酬答》，他又有詩描述自己的病狀說：“脹腹看成鼓，羸形漸比柴。”（《瘡臥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因有戲呈三十韻》）身體是瘦弱了，而且還出現了腹水，但元稹這次瘡病看來還不算嚴重。元和十年（815年）春，元稹量移通州司馬，到後，瘡疾再度發作，這次則十

174 其碑今在洛陽關林。

175 杜甫各詩之著作年代、地點均依仇兆鰲《杜詩詳注》。

176 參考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264至265，又頁427注五九。

177 《元稹集》卷十一有《泛江玩月十二韻序》：“予以元和五年自監察御史貶授江陵士曹掾”。

分危險了。其《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云：“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馬通州，二十九日與樂天於鄂東蒲池村別，各賦一絕。到通州後，予又寄一篇，尋而樂天貺予八首。予時病瘧將死……”又自注詩云：“元和十年閏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聞樂天授江州司馬。”他的《聞樂天授江州司馬》詩也說：“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仍悵望，暗風吹雨入寒窗。”他並為自己安排了後事。¹⁷⁸劉禹錫也曾在嶺表染瘴發瘧，其《謝上連州（今廣東連縣）刺史表》說：“臣自發柳州，便染瘴瘧，扶策在道，不敢停留。”（《劉夢得文集·外集》卷九）符載在江西旅途中也得過瘧病，其《寄南海王尚書書》說自己“一昨徑理扁舟，遠離潯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百餘里，防護無術，玷疾動作，藥物荒乏，鄰於委踣。以今月十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¹⁷⁹。

蘇軾在知績溪縣（今安徽績溪）時，也曾苦於瘧疾。他得的是三日瘧：“偶成三日寒兼熱”（《病中郭尉見訪》）他又有《復病》三首，由此推測他這次的瘧病已經痊癒或緩解，但在經過一段時期後，他的瘧病又再次發作了，發病時間則在早晚：“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答王定國問疾》），他形容說：“寒作埋冰雪，熱攻投火湯”（《復病三首》之二）。由《復病》第三首來看，他的病程還相當長：“一病五十日，復爾當解官。”¹⁸⁰二程的母親可能就是死於惡性瘧，程頤《上谷郡君家傳》：“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¹⁸¹宋嚴用和《濟生方·諸瘧門·諸瘧論治》說：“或乘涼過度，露臥濕處……遂成此疾。”透露了有不少瘧病患者有乘涼露宿的經驗。南方夏秋之間，蚊蚋猖獗，因露宿而為蚊蟲叮咬，感染

178 白居易《與微之書》：“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敘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

179 符載《寄南海王尚書書》，見《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180 按《復病三首》云：“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日短至”通常指冬至，但在冬至時染疾的機會較小，又其三云：“一病五十日”，則此處“日短至”不可能是冬至，而是夏至，夏至到立秋（“秋氣初”）約四十五日有餘，因此說“一病五十日”。

181 若二程之母發病的時間再遲些，發作於北歸道中，就是所謂的“回頭瘧”了。

瘧疾並不足為異。這種致病的途徑在今日的流行病學上還是屢見不鮮的。¹⁸²二程之母極可能就是這樣致瘧的。秦少游有《謫瘞鬼文》一篇，云“邗溝處士秋得瘞之疾”（《淮海集》卷三十一），據此推測他可能也患過瘧疾。北宋末范致祥任官南安軍（今江西大庾），病瘧死於當地。1986年河南方城縣古莊店鄉金湯寨村范致祥墓出土的第4號石刻《宋故亡弟南安軍判官范仲和哀挽詞》有云：“嗟汝平生最可傷，少年丹桂早芬芳，一門春色生常棣，萬里秋風起雁行。何事遠官留庾嶺，竟罹煙瘴殂蠻荒。”¹⁸³那麼，他極可能是因惡性瘧而喪命的。兩宋之際王洋《食鱠》詩：“老妻生過計，爲我鱠鮮鱗……瘧餘病尚在，欲飫嫌羶腥。”¹⁸⁴可見他吃過瘧疾的苦頭。王之道《謫瘞鬼文》：“予歲在甲寅（1134年）夏五月病瘧，踰十日良已，而兒女輩自是多苦此疾，至丙辰（1136年）夏而不能去。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自少以至長，由內以及外，一日而臥床者八人……九月予復苦寒熱，危與死鄰……”（《相山集》卷二八）則是王家大小八口都遭受了瘞鬼肆虐。李綱也有過瘧疾的經驗。¹⁸⁵趙鼎也曾苦於瘧疾。¹⁸⁶洪适的第三子也生過瘧病。¹⁸⁷胡宏的“長兄亡于瘴毒”¹⁸⁸，陸九齡任“全州（廣西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¹⁸⁹，都可能是因惡性瘧而導致死

182 見何琦《近年來我國的瘧疾研究》說：“在某些地區，如河南及山東等省，當地許多居民在夏季有露宿習慣。當中華按蚊達到足夠數量的時候，也可以引起嚴重的後果。”（《科學通報》1965年5月號，頁403）。《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9。《瘧疾防治手冊》，頁97：“夏秋露宿戶外，增加了人蚊接觸的機會……這些都可加劇瘧疾的傳播”。

183 見《文物》1988年11期，頁61。南陽地區文物隊等《河南方城金湯寨北宋范致祥墓》一文。

184 《東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葉十八。

185 《梁谿集》卷七四，《乞宮祠奏狀》：“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衝冒暑熱，得痢瘧之疾，久不痊愈”。卷一一五，《與呂相公第六書別幅》：“道途擾擾，且苦店疾”。卷一百二十，《與張柔直左司書》：“區區行次南豐，被旨徑赴長沙，遂此改途。至清江，適瘧痢大作梗，羸劣殆不能支”。尚有其他記載，不必多引。

186 宋林季仲《竹軒雜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葉八，《與趙參政書》：“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未知沿路勞頓，瘧疾不至再作否？”

187 《盤洲文集》，卷七十五，《第三子墓銘》。又卷七十二《祭鄧提舉妻恭人文》稱其妻致死之病因爲“嵐熏霧染”，估計也是因瘧致死。

188 《胡宏集》（吳仁華點校本），頁一九五，《被召申省劄子》。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89 《陸九淵集》，卷二七，《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頁316。

亡的。陸游在淳熙八年（1181年）秋得了瘧疾，有《病瘧後偶書》一詩，病情也是纏綿不斷，正如其《病中夜興》詩所說那樣：“病瘧秋來久未平”。兩年後他又寫了《予秋夜觀月得瘧疾，枕上賦小詩自戲》一首。¹⁹⁰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江西術者奇驗》條說：“咸淳甲戌（1274年）之春，余爲豐儲倉，久以病瘧不出。”¹⁹¹那麼他也受過寒熱之苦了。

當然還有更多在歷史上無名的瘧病患者。古代人已經對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作過一些值得注意的流行病學的觀察。曹植的眼光是相當銳利的，他看出來在疫癟流行期間，疫死的人們多具有特別的身分或屬於特殊的社會階層：“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癟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二《疾病部·疫癟》引）即大體上在傳染病爆發流行時，感疾喪命的多是些下層社會的窮苦人家。估計即因這些人生活條件較差，日常起居的環境較不衛生，而又因生活勞動的需要不得不暴露在疫區的範圍之內，以致個人及全家傳染而喪失了性命。曹植所提供的信息是很有意義的。就瘧疾的感染而言，從梅堯臣的《聚蚊》詩可以看出，確實富貴人家是比較不易染病的：“貴人居大第，蛟綃圍枕席，嗟爾於其中，寧夸臂如戟？”而廣大的農民、貧戶就不同了。三國魏傅巽《蚊賦》：“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口。嘴鋭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搏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訖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凌膚體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¹⁹²雖然不知道蚊子叮咬爲人們帶來的可能的病害，只注意到它對農工生產的負面作用，但卻特別指出了男耕女織的這些下層社會的勞動生產者嚴重地受到蚊蟲的侵擾。北宋陸佃《埤雅》卷十一《蚊》說：“蠶，民蟲；蚩，甿蟲；田牧者病焉。”¹⁹³指出蚊蟲叮咬的受害者主要是農民。由此可推測，瘧疾患者當亦以農民爲最多。

190 各詩繫年據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第三冊，頁1051、1055、1199。

191 《津逮祕書》，14集，169冊。

192 見《藝文類聚》卷九十七，《蟲豸部·蚊》引。作者名爲“傅選”。《三國志·魏書·傅嘏傳》稱嘏“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今從《三國志》作“巽”。

193 引文據《益雅堂叢書》本，卷十一，葉十。

上引羅願《新安志》說歙縣農民袒身耕作，蚊蟲撲緣，亦不得避。按《宋書·孝義·郭世道傳》附子《郭原平傳》說其母“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¹⁹⁴看來在南方，這種習俗由來已久。裸身勞作，更易於為蚊蟲侵犯，而農民實在也沒有空去管蚊子的叮咬，宋洪舜俞《平齋文集》卷八《憫農》詩云：“麥黃蠶登簇，秧青雨催耕，農家竭作時，無工搏蚊蟲。”¹⁹⁵今日流行病學提供給我們的訊息是：感染發病的瘧疾病患，絕大多數是農民。¹⁹⁶看來這現象是由來已久，自古已然。農夫之外，奴婢僕使等勞動者也一樣有較高的機會感染疾疫。蘇東坡在惠州《與林天和》尺牘第十五首說“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浹之間，喪兩女使。”李綱《海康與許崧老書》：“自抵嶺海，幸與小子無恙。然從者物故過半，瘴癘之鄉真可畏也。”又《與李蕭遠郎中書》：“自寓瘴海，隨行使令者物故過半。”¹⁹⁷章傑《嶺表十說》之七說：“北人之來嶺南，婢僕多病瘴。蓋勞役之人，飲食乖度，晝多冒暑，夜多寢地；又凡事不能忌慎，故先受甚弊。既與之同休戚，宜加意戒之。”歸咎於婢僕的生活條件差，又不多加留意。實際上是因為他們勞作奔走，接觸致病因素的機會較高的緣故，但“先受其弊”則是確切的報導。

在不同性別人群的疾病分布上，現代醫學工作者指出瘧疾的發病率是男多於女，這是由於暴露於致病因子的機會男高於女而產生了這一結果。¹⁹⁸古人對於這點也有相當精到的觀察。釋繼洪《治瘴用藥七說》之七：“《攝生方》謂南方男子多瘠，而婦女多肥；男子多弱，婦人多力。此亦陽泄陰盛之驗也。故本土婦人不甚染瘴。”按鄭樵《通志》卷六九《藝文略》第七《醫方類》第十有《廣南攝生方》三卷，釋繼洪所引當即此書。《嶺外代答》卷三《惰農》條說“深廣”地區“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卷四《風土門·廣右風氣》也說桂林之南“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卷十《蠻俗門·十妻》：“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

194 《宋書·孝義·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

195 《四部叢刊續編》本，卷八。

196 《瘧疾防治手冊》，頁97。

197 見《梁谿集》，卷一百十，一百十四。又卷二十四《初發雷陽有感二首》之一：“父子相隨幸良厚，僕奴半死涕空潸。”

198 《中國醫學百科全書·流行病學》，頁5。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

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即大致上嶺表地區男性較多疾，而婦女則較少疾。

古代人們已知道瘧疾是可以傳染的，《東觀漢記》：“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鄧〕訓身爲煮湯藥，咸得平愈。”（《後漢書·鄧禹傳》附子《鄧訓傳》注引）《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六還記載有“疫瘧”一詞：“病者發寒熱，一歲之間，長幼相若；或染時行，變成寒熱，名曰疫瘧。以歲運推之。”按《說文解字》：“疫，民皆病也。”《論衡·命義》：“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呂忱《字林》說疫是“病流行也。”¹⁹⁹“疫瘧”當是包含瘧疾在內的傳染病暴發流行。今日的流行病學告訴我們：一個人群移入一個新的地區，對該地區原存在的疾病沒有抵抗力，一旦感染，就可能會發生流行；在瘧區的人由於早年多患過瘧疾，均獲得相當程度的免疫力，而外地人，由於不具備免疫力，進入全瘧區後，不被感染的十分罕見。²⁰⁰古代人常用水土不服來解釋，即所謂“民易水土，必至疾疫”（《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可以說和現代醫學的認識正相暗合。從王肇所述方書說廣南地區“南人生長其間，與水土之氣相諳。外之人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輕重之異。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可免矣。”（《嶺南衛生方·指迷方瘴瘧論》）及周去非所說：“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嶺外代答·風土門·廣右風氣》）都可以看出這意思。

戰爭或大規模的調動民工和逃難所造成的大量人口的流動、遷移或聚集，往往可以引起瘧疾暴發流行或蔓延。這也是今日流行病學中的普遍認識。²⁰¹張從正指出：“治平之時，常瘧病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役紛冗，朝戈暮戟，略無少暇……余親見泰和六年丙寅（1206年）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回。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昏晬懊憊，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次歲瘧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彌年。”“故瘧常與酷吏之政

199 司馬光《類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汲古閣影宋鈔本影印，1984年），卷七下引。

200 徐恩霆等主編，《流行病工作手冊》，頁175。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中華醫學會，《新中國瘧疾調查研究綜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號，頁306。鍾惠瀾，前引書，頁651。

201 《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9。

並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瘧氣應于後；或瘧氣行于先，而酷政應于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爲醫設，亦于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合者也。以前人論瘧者未嘗及于此，故予發之。及知聖人立瘧之名，必有所謂云。”（《儒門事親·瘧非脾寒及鬼神辯》）他的看法跟現代的醫學知識可謂若合符節。按《金史·章宗紀》泰和六年“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這次起兵南下，據說是動員了全金國的力量：“泰和舉天下全力，驅弘軍以爲前鋒”。（《金史·楊雲翼傳》）可見這次聚集、流動的人口是極可觀的。金軍越過淮水，深入今安徽、湖北境內。次年初僕散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泰和七年二月薨。”（《金史·僕散揆傳》）他死於什麼疾病，史書失載。而由元帥完顏匡統率道出唐、鄧的部隊，因“久圍襄陽，士卒疲疫”（《金史·完顏匡傳》），傳染病在戰地已經蔓延開來。因此回到北方後終於引起了張從正所報導的瘧疫暴發流行。我們可以確定，這是一次明顯的由南方瘧區帶回傳染源而引起的暴發流行。

歷史上在南方因戰爭、戍邊而徵調大量士兵以及從事配合軍事行動所必需的運輸等徭役的民夫，由於出入疫區而產生的嚴重的疾病（包括瘧疾在內）流行是相當多的。現將漢宋之間所發生的較明確的事件的有關記錄依時間的先後開列如下：

- 1 呂后七年（前181年）趙“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史記·南越列傳》）
- 2 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史記·司馬相如傳》）“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史記·西南夷列傳》）
- 3 王莽天鳳元年（14年）“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擊益州，出入三年，疫疾死者什七。”“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漢書·西南夷傳》、《王莽傳》）
- 4 天鳳三年（16年）“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漢書·西南夷傳》）

- 5 漢光武建武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交趾土多瘴氣”，“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鶩跔跔墮水中”。“二十年（44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後漢書·南蠻傳》、《馬援傳》）
- 6 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武陵蠻寇沅陵……馬援率四將軍”“將十二郡募士及施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次年“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後漢書·光武帝紀》、《馬援傳》、《宋均傳》）
- 7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公入荊州”，“自江陵征〔劉〕備”。周瑜曰：操“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公至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三國志·周瑜傳》、《魏武帝紀》、《吳主傳》）又，“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蔣濟傳》）
- 8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魏武帝紀》）
- 9 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寧“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三國志·甘寧傳》）
- 10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三國志·司馬朗傳》）
- 11 吳大帝黃龍二年（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數千人還。”“權欲遣偏師取夷洲及朱崖，皆以譖〔陸〕遜，

遜曰‘……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全〕琮，琮曰‘……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毒氣，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三國志·吳主傳》、《陸遜傳》、《全琮傳》）

- 12 吳大帝赤烏五年（242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吳主傳》，又參上條《陸遜傳》及《全琮傳》）
- 13 魏少帝芳嘉平五年（253年）“吳大傅諸葛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合肥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三國志·三少帝紀》、《諸葛恪傳》）
- 14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交州牧陶璜上言：“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暑溼，多有毒氣，加累年征付，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晉書·陶璜傳》）
- 15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竇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今廣西欽州北）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唐書·南蠻傳下》）
- 16 開皇平陳之後，廩狄士文任貝州（今河北清河一帶）刺史，“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北齊書·廩狄干傳》附子《廩狄士文傳》）
- 17 開皇十七年（597年）“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周〕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隋書·周法尚傳》）
- 18 隋煬帝大業四年（608年）“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廣東潮州）浮海”“擊流求，得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隋書·東夷·流求國傳》、《食貨志》）

- 19 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年）“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輦餉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屬於路。”（《舊唐書·南蠻·南詔蠻》）
- 20 “廣德（763至764年）、建中（780至783年）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唐書·突厥傳上》）
- 21 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籍死，百無一還。”“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韓愈《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黃家賊事宜狀》、《唐書·孔巢父傳》附從子《孔戣傳》）
- 22 “南蠻自大中（十二年，858年）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宰相楊收議罷北軍。”（《唐書·南蠻傳中》、《楊收傳》）
- 23 盧攜說僖宗：“咸通（860至873年）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中藏空虛，士死瘴癘。”《唐書·南蠻傳中》）
- 24 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黃巢在嶺南，“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唐書·逆臣下·黃巢傳》）
- 25 僖宗廣明元年（880年）淮南高“駢令大將張璘渡江討賊，屢捷”。“巢數卻，乃保饒州（今江西鄱陽），衆多疫。”“春末，賊在信州（今江西上饒）疫癘，其徒多喪。”（《舊唐書·僖宗紀》、《唐書·逆臣下·黃巢傳》）
- 26 昭宗大順元年（890年）陳敬瑄“將士皆為〔王〕建俘，城中謀降者，〔田〕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唐書·叛臣下·陳敬瑄

傳》)

- 27 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楊行密屢敗孫儒兵……儒食盡，士卒大疫”，“儒病痞”。“六月行密聞儒疾瘡”，“病甚，股弁不能興”，“戊寅，縱兵擊之……儒軍大敗。”(《資治通鑑》卷二五九，《唐紀》七十五，昭宗景福元年、《唐書·孫儒傳》)
- 28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年)“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會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轉運使許仲宣驛聞，詔班師。”(《宋史·太宗紀一》、《許仲宣傳》)
- 29 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帝謂輔臣曰：‘湖廣擊蠻吏士，方夏瘴熱，而罹疾者衆，宜遣醫往為胗視。’”(《宋史·兵志十》)
- 30 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二十六日內降劄子，臣寮上言：臣昨南方州軍連年疾疫瘴癘，其尤甚處，一州有死十餘萬人。”(林億等進《外台祕要方》表)
- 31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詔：頃以東兵戍嶺南，冒犯瘴癘，得還者十無五、六。自今歲滿，以江、淮教閱忠節、威果代之。”(《宋史·兵志十》)
- 32 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交趾寇廣南，陷邕、欽、廉”，“郭逵敗交趾於富良江，獲其僞太子洪真”。“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瘡。”其中“運糧死者八萬，戰士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宋史·郭逵傳》、范祖禹《范太史集·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程頤《河南程氏遺書·洛陽議論·正叔論安南事》)
- 33 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沈括“任閩中，嘗擁兵捕山寇，過漳浦，軍人皆感瘡。用此[方]治之，應時患愈。”²⁰²
- 34 “郭逵南征，建所得廣源峒為順州”，陶弼“留知順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十七、八，弼亦疾甚”，“終於官”。(《宋史·陶弼傳》、《外國·交趾傳》)

202 見沈括《蘇沈良方》(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治瘴》。

- 35 神宗元豐三至五年（1080至1082年）“瀘州（今四川瀘州）夷乞弟侵擾，詔邊將討之”。“乞弟平，班師。”“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宋史·神宗紀》、司馬光《涑水紀聞》。黃庭堅《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爲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 36 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黎州（今四川漢源北）五部落蠻”之變，“調縣、潼（今四川綿陽、三台）之軍二千八百人，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蠻人已退，而官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瘴……敗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九《庚子五部落之變》）
- 37 理宗寶祐六年（1258年）李曾伯《可齋續藁後·奏邊報及乞兵》：“得邕倅趙立十四日書，其辭頗急迫。本司今年調兵萬人在邕，苦於瘴癘，立以爲可用之兵僅千餘人。”²⁰³
- 38 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江淮諸路官兵入嶺……炎方煙瘴，易至染疾，斃者相枕藉。桂林雖號清淑，今亦有氣候矣。如邕、欽、宜，則毒霧熏蒸，有全軍而損其半者。”（《可齋續藁後·回奏庚遞宣諭》“敵人去冬及邕境，瘴死者固多……今聞敵之斃於瘴者固自不少；然我師去冬以瘴而故，只邕管一處，亦三千餘人。自古南方用兵，上霧下潦，蓋所共苦。”（《回奏庚遞宣諭》）
- 39 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劉敏中《平宋錄·撫勞戰士》：“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於堅城下，經有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不戰而疫死者，無歲無之。”²⁰⁴
- 40 端宗景炎二年（1278年）《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符讖門·兵讖·永新兵禍》：“永新（今江西永新）稱兵，安福（今江西安福）有胡秀才季立……中夜親見有緋衣神坐於城樓上，指揮鬼卒等去永新救援善良，毋使刀

203 引文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葉64。

204 引文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葉4。

兵、瘧痢泛及。未幾，劉泗洲槃統軍經過，去征永新，闔邑罹禍，兵後所存民戶，百不及一，瘧痢又復盛行，死者無數，慘矣哉！”²⁰⁵

當然戍邊在非戰爭時期，即平時也是不斷的、長期進行的軍事活動，受調派往南方邊疆的戍卒大量地染疾致死的情況，因而也是長年不斷的。《唐書·張柬之傳》：“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今雲南北部），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宜罷姚州……”他這建議意在藉著罷州而撤除這支戍邊的部隊，以免除子弟兵年年疫死不歸的悲劇，但他的提議沒有被武則天所採納。於是這長久以來剝奪子弟兵性命的慣例也就延續了下去。

另外，南方在唐宋時期還發生過城市或軍隊駐紮營區因嚴重的瘴疫流行，而不得不搬遷徙到另一個新地點的事件。《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記載說漳州“初置於今漳浦縣西八十里，開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縣東二百步舊城是。……乾元二年（759年）緣李澳川有瘴，遂權移於龍溪縣置，即今州理是也。”在漳州西邊的汀州則係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州初置在雜羅（今福建龍岩），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歷十四年（779年）移理長汀（今福建長汀）白石村，去舊州理三百里。福州觀察使承昭所奏移也”。（《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江南東道十四·汀州》）

在西南方則有雅州。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四十七《成都府路·雅州·景物下》雅安山條云：“州治舊在其上，以有瘴，皇祐、景德間徙治山下”。按皇祐（1049至1053年）爲仁宗年號，景德（1004至1007年）爲真宗年號，二者相隔四十餘年；且皇祐在後，景德在前。此處當有誤，疑“祐”或是“朝”字之誤。

在嶺外，則有欽州遷進了新建的州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四月：“欽州深在山谷間，土煩鬱，人多死瘴毒。推官建安徐的獻策於轉運使，請徙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均食。築城郭，立候樓，爲戰守備。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廬肆。皆徐所爲”。到天聖三年（1025年）五月己丑又“徙廣南宜州懷遠軍（今廣西三江南）於江口寨，以舊城多瘴癘，而江口可控扼安化蠻人出入也。”（同上，卷一百三）雖然徙邑的目的在於取得軍事形勢上的優越位置，但疾病衛生因

205 引文據金心點校本，頁61。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素也是極重要的考慮。次年五月“癸未詔徙南儀州（今廣西岑溪南）於岑雄驛，以舊州地險，中多瘴霧之毒，吏民歲死者衆故也。”（同上，卷一百四）

按《宋史·仁宗本紀三》記載慶曆六年（1046年）“春正月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善地”即沒有或瘴毒稀少的處所。蘇軾在黃州《答畢仲舉》尺牘亦云：“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這是遷移駐軍戍所，以避瘴害。陳仁璧給了我們一個時代更早的具體事例，《興化軍（今福建莆田）廳壁記》：“皇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秋七月，詔移軍於茲而建之……舊軍之地，山崗晝暝，溪流夏寒，屯彼師徒，時多瘡癘。旋聞上詔移之莆邑。”²⁰⁶

城市或軍營正是人口集中，往來或流動頻繁的聚落，較易於引起疾疫的暴發流行，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

瘡疾流行的時間和地域的分布，無疑地和媒介蚊蟲的種類、地形、地勢、溫度、溼度等因素有極密切的關係。瘡疾的傳播媒介是按蚊（*Anopheles*），近年的調查和研究顯示，在我國境內存在的近60種按蚊中，具有流行病學意的媒介蚊種只有中華按蚊（*An. sinensis*）、雷氏按蚊嗜人亞種（*An. lesteri anthropophagus*）、微小按蚊（*An. minimus*）、大劣按蚊（*An. dirus*），舊稱巴拉巴蚊（*An. balabacensis*）、日月潭按蚊（*An. candidiensis*）、溪流按蚊（*An. fluviatilis*）等幾種，其中又以前四者尤其重要。中華按蚊除新疆、青藏高原外，遍布全國各地，也最常見，主要孳生在水稻田及其灌溉系統的水域中，湖沼、池塘、窪地積潦也是其適宜的孳生場所。陸游《熏蟲效宛陵先生體》詩：“澤國故多蠶”，正是湖沼地區真實情況的寫照。其數量在五、六月急迅增加，到七、八月時期到最高峰。雷氏按蚊嗜人亞種主要分布在北緯33度以南，西起四川，東到沿海的廣大地區。最常見孳生於有水草或植物的水坑、溝渠、稻田、池塘中，在八、九月間數量最多。微小按蚊分布在北緯33度，特別是北緯25度以南的山地丘陵地區，孳生在流速緩慢、水質清涼的溪流岸邊雜草中，由於對孳生場所的要求較嚴，因此就限制了它的分布，只見於山區，而不見於平原地區。大劣按蚊分布在桂南、海南島、滇南、藏東南等地，多孳生在遮蔭良好的山澗岩石溪床凹陷所形成的窪地淺水中，雨後的積潦中也有。雨季後的九、十月是大劣按蚊數量的高峰期。日月潭按蚊的分布地域大致與微小按

206 見明弘治癸亥（1503年）周瑛等著，清同治十年（1871年）刊《重刊興化府志》，卷二十六《禮記·藝文志·紀載類·城府》，葉十四。

蚊相近。多生在雜草叢生的荒田積水中，其次在多草（或稻）可遮蔭的稻田、灌溉溝、溪溝和小片積水中。蚊口數量的多少與稻作季節和降雨季節的分布有密切關係，在熱帶水稻可以兩作的地區，一年中甚至可以出現兩次數量的高峰。適宜瘧疾傳播的平均相對溼度在60%以上，當相對濕度降到52%以下時，蚊蟲就停止了吸血活動。²⁰⁷

而我國的瘧區則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地帶。（一）自然無瘧區，包括東南隅除外的青藏高原、東北的山區、乾旱的黃土高原、以及伊犁河、喀什噶爾河流域的水稻區除外的西北邊疆荒漠高原地區。在這地區以外，則是其它三個瘧區。（二）北緯33度（大致上即秦嶺、淮河一線）以北地區，是一非穩定性的低瘧區，通常只有間日瘧，傳瘧媒蚊最主要是中華按蚊，發病高峰多在八至九月。（三）北緯25度到33度之間的地帶，是非穩定性的中低度瘧區，間日、三日、惡性瘧都有，而以間日瘧為主，山區較平原地區嚴重，傳播期可長達六到八個月，發瘧高峰期也在八至九月。（四）北緯25度（大致上即五嶺一線）以南的地帶，平原地區是非穩定的中、低瘧區，山區則是穩定的高瘧區和全瘧區。四種瘧疾都有，幾乎全年都可傳播瘧疾，八到十月是發病高峰期，地屬熱帶的海南島則在五到六月。²⁰⁸

根據上述的訊息，我們就可以比較明確有效地掌握古人對瘧疾流行的時間和地域分布的認識。我們可以確定，古代人已經清楚地瞭解到瘧疾的傳染或蔓延具有季節性的升高現象。《左傳》定公四年（前506年）春三月，晉荀寅說：“水潦方降，疾瘧方起。”春季間已有瘧疾為害，而秋季才是發病的高峰期。《周禮·天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禮記·月令》說在“孟秋之月”“行夏令……則民多瘧疾。”《素問·金匱真言論》也說“秋善病風瘧。”都表示瘧疾最為流行的季節是在秋天。《桂海虞衡志·雜志》說“邕州（今廣西南寧）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與今日的調查瘧疾傳播期幾乎全年都是，而八到

207 《瘧疾防治手冊》，頁96。

208 《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9。《瘧疾防治手冊》，頁102至104。

十月是發病高峰期正相符合。上引王安石《送李宣叔倅漳州》(福建漳州，正在北緯25度線南)詩說“瘴癘春冬作”正說明了當地瘧疾傳播期長，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發病。宋陳復齋有詩說福建惠安(今福建惠安，北緯25度線稍北)“藍水秋來八九月，芒花山瘴一齊發。”²⁰⁹以及往來嶺南者常稱“黃茅瘴”也都表明了秋季是發病最多的時期。

楊億說：“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一《風俗雜誌》引《楊文公談苑》)洪适在嶺南所撰《禱東廟文》：“說者謂閏歲多瘴”。又《秋饗諸廟文》也說：“說者謂：逢閏必瘴。”則當時人們認為在嶺表地區的瘧疾流行還存在著較明顯的周期性的大流行或暴發。如以古代曆法的置閏方式，即十九年七閏來看，則平均約每兩年八個半月就有一次嚴重的瘧疾流行出現。但這種看法是否精確可靠，目前還沒有辦法判斷。

在流行地域方面，上引《漢舊儀》說“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瘧)鬼”。這則神話交代了瘧疾的病因，也透露了遠古時代的江南或南方就是遠甚於北土的瘧疾流行地區。上引孫萬壽“江南瘴癘地”句及李覲《聞女子瘧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江南多此疾”句也都可以跟這一神話互相發明。而上引《後漢書·楊終傳》則表示淮水流域已是“障毒”為患的地帶。上述古人認為是致瘧之因的瘴氣或嵐霧的分布主要在南方，這點無疑也迂迴間接地告訴了我們，古代人已明白地觀察到：南方，相對於北土來說，是個瘧疾盛行的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工作揭露了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區遠古以來的農作物就是水稻。²¹⁰《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穀宜稻”。(《逸周書》卷八《職方》篇與此相同)《淮南子·地

209 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刊《安溪縣志》，卷一，《輿地類·風俗·氣候》葉十六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重印。

210 新石器時代中期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杭州灣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以及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三期文化，修水山背遺址，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東南沿海地區的疊石山文化、石峽文化、雲南賓川白羊村遺址等均發現人工種植的稻的遺存。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頁125至169。最近在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現了距今8200至7800年之間的稻穀、稻殼遺存，雖尚待鑒定是否人工栽培的稻，但當時已有稻作農業是極可能的。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孢粉分析與古環境探討》二文，均刊於《文物》，1990年8期。

形》：“江水肥仁而宜稻”，“南方……其地宜稻”。《史記·貨殖列傳》記“江”、“淮以南”的“楚、越之地”的居民多是“飯稻羹魚”的。《漢書·地理志下》說“巴、蜀、廣漢”也是“民食稻魚”的地區。上述中華按蚊等傳瘧媒介等與稻作有關，從這點也可以瞭解江、淮以南的南方被古代北方人視為瘧疾流行的地區，並不足為異。

長江流域的一些山區，如上引《後漢書》所說長沙零道春陵鄉有“山林毒氣”之害，又《梁書》卷二十一《殷鈞傳》：“出為……臨川（今江西東部）內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這些當多是微小按蚊在傳播瘧疾，多少也意謂山區的瘧疾流行程度較平原地區的要高些。方勺《泊宅編》卷中：“虔州龍南（江南龍南）、安遠（江西安遠）二縣有瘴。”曾敏行則指出這裡的瘴害極嚴重：“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獨醒雜志》卷十）在西南富順監（四川富順）、瀘州（四川瀘州）、淯井監（四川珙縣）也是以“地多瘴疫”著稱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九月甲辰條；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己巳條）可以看出越靠南邊瘧疾流行越嚴重。

許洪《指南總論·論瘴瘧證候》說“此一證，二廣及漳州界上多有之，餘處無。”又《聖濟總錄》說：“瘴氣獨盛於廣南”。這兩家的說法大致上跟近年北緯25度以南瘧區的劃分相符。在這個以惡性瘧為主的高度流行區中，微小按蚊是主要的傳瘧媒介，其孳長生息的環境只限於山地及其附近，上述的“山瘴瘧”、“山毒”、“山溪毒氣”、“山林瘴霧”等引起的瘧疾實際上就是山溪間微小按蚊叮咬的結果。

然而在嶺嶠以南，瘧瘧流行的程度，因地點的不同，還有高低之分。例如《舊唐書·地理志》容州北流縣（廣西北流）條：“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²¹¹則認為北流之南的地區，疾疫流行較為嚴重。自然，古代文獻所提供的流行情報，有時是相當不可靠的。例如白居易曾有詩說江西有瘴，在離開江西時更有“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之感歎，給人的印象是：江州

211 按《太平寰宇記》卷167，《嶺南道十一·容州》北流縣條下云：“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十人”下多一“去”字。

是個危險的瘴疫流行地區。但他在江州時給元稹的信裡卻說“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²¹²又使人產生江州是個不錯的地方的感覺，前後自相矛盾若此。白居易《和陽城驛》說“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而《太平寰宇記》一百一十六卻說道州“大抵炎熱，元無瘴氣”。二者也大相牴牾。對嶺表的記錄也一樣。如杜甫《寄楊五桂州譚》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其後白居易又有《送嚴大夫赴桂州》詩說：“桂林無瘴氣”。自此以還，後人幾乎都說桂林無瘴，如張栻說：“靜江氣象開廓，風氣疏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雜志·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然而《宋史·兵志十》記神宗熙寧年間，“桂林以瘴癘，間徙軍於全、永（廣西全州、湖南零陵）”上引李曾伯奏稿也說桂林“今亦有氣候矣。”又宋人胡珵《道護錄》：“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寶、雷、化，說著也怕’（分別在今廣東陽春、龍川西、梅州、新興、茂名東北、信宜南、海康、化州）。八州惡地，〔劉〕安世歷遍七州。”²¹³。《劉安世言行錄》記安世於“二廣間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者，無所不至。”（《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二《諫議劉公》引）按《慶元條法事類》卷七十五《刑獄門·編配流役》中“名例勅”說：“諸稱遠惡州者，謂南恩（廣東陽江）、新、循、梅、高、雷、化、賓（廣西賓陽）、容（廣西容縣）、瓊（海南瓊山）州，昌化（海南儋縣西北）、萬安（海南萬寧）、吉陽（海南崖縣西北）軍”。²¹⁴共十三個州、軍。而周去非卻說：“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廣西合浦）、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廣西平樂）與湖南、靜江（桂林）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廣西橫縣）、邕（廣西南寧）、欽（廣西欽州）、貴（廣西貴縣），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廣東英德）爲小法場。”（《嶺外代答·風土門·瘴地》）則對雷、化二州及海南各州、軍的看法與向來通行的意見又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英州也沒有列在上引法典所刊載的“遠惡州軍”名單當中。另外，趙汝适《諸蕃志》卷下也說：“昌化……地無煙瘴、水潦之患”。²¹⁵

212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十日《與微之書》，見《白居易集》卷四十五。

213 《三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十二，《諫議劉公》引。

214 據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靜嘉堂文庫抄本。1976年。

215 引文據馮承鈞撰，《諸蕃志校注》，頁147。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六月“壬午廣南東、西路轉運使言：所部梅、春、循、新、邕、欽、融（廣西融水）、桂、昭、容、白（廣西博白）、瓊、崖等州皆煙瘴之地。”與上述各瘴害嚴重州軍相提並論的還多出了融、桂、白三州。李綱《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則稱“梅、循、惠、廣、端、康、封、梧、昭、賀等州，皆煙瘴深處。”（《梁谿集》卷六十五）又揭出了惠、廣、端、康、封、梧等州。而南宋末番禺人李昴英却說：“廣〔州〕山寬海鉅，嵐霧散泄，故無瘴。”²¹⁶

在這些“遠惡州軍”當中，春州這“大法場”是沒有什麼人懷疑的。李符說：“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子條）又《宋史·刑法志三》：“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而英州雖稱“小法場”，殆與春州實不相上下：“廣東路瘴癘惟英德府爲最甚，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即誣伏，亟就刑責以出。”（《宋史·刑法志二》）欽州也十分著名：“欽州深在山谷間，土煩鬱，人多死瘴毒”。（《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宋史·徐的傳》）我們推測大致上這是由於外來無免疫力的人到了這些地區，和帶蟲免疫的當地人雜處，因而引起嚴重的暴發流行而導致大量外來人的死亡的結果。這樣，也給人們留下了這些地方是瘡癘高度流行地區的印象。

上文提葛洪《肘後方》裡有“度瘴散”一方，他認爲這藥方具有“辟山瘴惡氣”的效用，並指點了觀察瘴氣的要點。又說這藥“辟毒、諸惡氣，冒霧行尤宜服之。”不論這藥方是否真實有效，它說明了當時已經有意識地下功夫來配製藥劑，進行瘡疾的預防工作。白居易在江州《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詩有句云：“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又《十二年（817年）冬江西溫暖喜元八寄金石凌到因題此詩》：“今冬臘候不嚴凝，暖霧溫風氣上騰。山腳崦中纔有雪，江流慢處亦無冰。欲將何藥防春瘴？只有元家金

216 見《文溪集》卷二，《壽安院記》，葉十一。道光二十年（1840）刊《粵十三家集》本。

石凌。”則元氏有防瘴瘡藥名“金石凌”。按元稹有《遣病十首》，第一首云：“服藥備江瘴，四年方一癘。豈是藥無功？伊予久留滯。滯留人固薄，瘴久藥難制。”則在江陵時元稹曾服藥防瘴，所服或即“金石凌”。其配方是什麼，已難考出。但結果在第四年時元稹還是得了瘴瘡，而且還不算輕。至於檳榔、酒等防瘴的作用，容後再敘。

在治瘡方面，《素問》有《刺瘡》一篇，提出了對各種不同症狀的瘡病的各種不同的刺法、取穴；並指明病患如果是“脈緩大虛”的，就“宜用藥”，而“不宜用針”。更揭示了針刺治療必須掌握準確的時機：“凡治瘡，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今日醫學科學工作者的實驗已經證明針刺治瘡確實有效，同時《內經》首先揭舉的這一刺療時機更是不可違背的真實經驗。而《內經》所指出的合谷穴，孫思邈《千金要方》“灸瘡法”所舉出的大椎穴，以及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所說的：“大椎治瘡久不愈”，“陶道治瘡瘍，寒熱洒淅”，“合谷”“治寒熱瘡瘍”、“治身寒熱瘡病”，“大椎”“治溫瘡、瘰瘍”²¹⁷等穴都是今日臨床證明有效的治瘡穴位。²¹⁸

在服用藥物治療方面，自漢至宋已發展出針對各種不同症候的幾百種不同的藥方，使用的藥物種類的數量十分可觀。《本草經》已表示有些藥如蕘華“主治……溫瘡”。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常（恆）山、蜀漆（或蜀漆葉）及青蒿三味藥。《本草經》：“恆山，味苦寒。主治傷寒寒熱，熱發溫瘡”。“蜀漆，味辛平，有毒。主治瘡及逆道寒熱，腹中癥堅痞結”。《吳普本草》：“蜀漆葉，一名恆山。”《名醫別錄》：“恆山……生益州山谷及漢中”，“蜀漆……生江林山及蜀、漢中，恆山苗也。”按常山，別名黃常山、鷄骨常山，為虎耳草科、黃常山屬植物黃常山（*Dichroa febrifuga* Lour.）的根，其苗或嫩枝葉稱蜀漆。²¹⁹自一九四〇

217 見《鍼灸資生經》（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瘡》，葉六十三至六十四。

218 見羅榮翹，《瘡疾的針灸治療法》，《北京中醫》，第3卷，11期，頁27至28，1954年11月。呂世琦《祖國醫學對瘡疾的認識和治療》，見《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7月號，頁27。孫心楚、彭學川，《針刺治療瘡疾22例臨床觀察》；又，王翹楚，《針灸治療瘡疾的療效與辨證論治》。均見《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8月號，頁5至6；頁7至8。

219 見樓之岑，《常山的生藥鑑定》，《中華醫學雜誌》，1954年第11號，頁869至870。高德明，《涌吐藥（上）》，第（3）“常山”，《浙江中醫雜誌》，1957年9月號，頁43。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學研究所等，《中藥志》第二冊，頁515。北京，人民衛生出

年代以來，化學、藥理、臨床醫學科學工作者已經證實常山所含的甲、乙、丙三種常山鹼的抗瘧療效，甲種與奎寧相等，乙、丙二種是奎寧的四〇至一百五十倍。²²⁰《金匱要略》所載治瘧的三個藥方中就有一個“蜀漆散方”，方以所用的蜀漆爲名；《肘後方》中三十二個治瘧藥方中，使用常山的就有十四個；《千金要方》的四十個療瘧方中，使用常山、蜀漆，或兩者兼用的有十九個，用常山或蜀漆命名的藥方有五個；《外台祕要方》所列治瘧九十四藥方中，用常山或蜀漆，或兼用兩者的共有六十一個，以常山或蜀漆爲名的則有三十七個；《聖濟總錄》所收二百六十二個療瘧藥方內，含有常山或蜀漆或兩者的，共有一百三十四個，藥方名用常山或蜀漆的有四十二個。足見漢宋間已常用這味有效的藥來進行治瘧了。陶弘景注《本草經》說蜀漆：“云是常山苗，而所出又異者，江林山即益州江陽山名，故是同處爾”。（《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十引）他不但注意到常山的產地，而且還特別揭示出其形狀和效用：“出宜都（湖北宜都）、建平（四川巫山），細實黃者呼爲雞骨常山，用最勝。”（同上）宋寇宋奭《本草衍義》也說：“常山，蜀漆根也……如雞骨者佳”。²²¹釋繼洪所列“截瘧散”也說常山要用“雞骨樣者良。”（《嶺南衛生方》卷中）唐代甄權《古今錄驗方》“療一切瘧大有驗朱砂丸方”特別指明要用“蜀常山”，都強調了產地的重要性。夏侯拯“桃人常山丸方”也說“其常山須蜀者始堪使用”。（《外台祕要方》卷五）

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說蜀漆、常山：“此二味爲治瘧之最要。”（《經史證

版社，1982年第二版。又《全國中草藥匯編》（上），頁744。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王浴生主編，《中藥藥理與應用》，頁1024。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但曹元宇所輯注的《本草經》，頁194“恆山”條注一却稱常山的學名爲*Orixa japonica*, Thunb.。按這是芸香科植物“和常山”或“日本常山”，又稱“臭常山”的拉丁學名。可參考高德明，上引文，頁43及上引《中藥志》第二冊，頁515，518至519。樓之岑，前引文。姜周行，《幾種中藥研究的近況》，《中華醫史雜誌》，1954年第1號，頁31。

220 姜達衡，《常山的化學》；金蔭昌，《常山的藥理研究》；分別見《中華醫學雜誌》1954年第11號，頁871至872；873。高德明，前引文，頁43。唐汝愚等《常山鹼乙與檳榔鹼的抗瘧試驗》，《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2月號，頁37至39。上引《中藥志》第二冊，頁517。王浴生，上引書，頁1025。《四川中藥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卷，頁261。又薛愚主編《中國藥學史料》（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年）頁430至431。

221 引文據顏正華等點校本，卷11，頁70。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

類大觀本草》卷十引)李璆也極力強調常山治瘧的功效。釋繼洪《治瘧續說》：“常山乃瘧瘧要藥。李待制(璆)云：‘欲去根本，非常山不可’。此說最當……如上二方(截瘧散)並有神效，其功正在常山”。

在傳統醫學的療瘧藥物中，常山之外，另一經現代科學實驗、臨床研究證明有效的是青蒿。青蒿是菊科植物黃花蒿(*Artemisia annua L.*)，目前最早的記載見於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中，用“青蒿大把二”來治牝痔，並說：“青蒿者，荆名曰萩。”²²²《本草綱》：“草蒿……一名青蒿。”沒有說它主治瘧疾，其後陶弘景以迄唐、宋各本草都未記載用青蒿療瘧。倒是葛洪的一個藥方只用青蒿一味藥來治瘧。(《肘後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其後《聖濟總錄》有八個治療藥方用了青蒿，另兩個用了青蒿子；前者中有七個也同時用了常山，而不用常山的那個藥方名為“青蒿湯方”。青蒿的療瘧效用到南宋才進一步受到人們的注意。汪南容《治冷熱瘧瘧脈證方論·熱瘧治法》說熱瘧“只用挑草子之法”，即用針刺治療，然後“乃以青蒿水與服，應手而愈。”(《嶺南衛生方》卷上)他指出“南方挑草子之法不可廢也”。又建議“士大夫不幸而染熱瘧，亦只得求南人針法以刺之”。周去非《嶺外代答·風土門·瘧》也記錄了同樣的針刺和服青蒿水的治療瘧法，但他還提到“青蒿散”這藥方：“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瘧疾，服之有奇驗。”²²³

總之，到宋代為止，古代中國人確實已經發展出了有效的物理抗瘧療法，即針刺及藥物療法，發現了抗瘧生藥的有效品種。²²⁴

(二)日本血吸蟲病及恙蟲病

血吸蟲病和恙蟲病也是南土流行或較為流行的疾病。血吸蟲病在世界上也是為害甚劇的寄生蟲病。目前在中國境內只存在日本血吸蟲，即*Schistosoma japonica*

22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頁88。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又，《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55。

223 近年利用青蒿療瘧，甚有成效。見李蔚普《青蒿的抗瘧療效》，《北京中醫》，第三卷，第九期，頁17至18。1954年9月號。范太濤《青蒿素栓治療惡性瘧疾的臨床觀察》，《新中醫》1988年1期，頁35。青蒿研究組《抗瘧新藥青蒿素的研究》，又中藥研究所藥理研究室《青蒿的藥理研究》，均見《中國中醫研究院三十年論文選》，頁366至369；370至381。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

224 見陸淵雷、何雲鶴《中醫治瘧的經驗》(《中醫雜誌》，1955年第一號)，其摘要刊於《中華醫學雜誌》，1955年第三號，頁288至289。

Katsurada，因而把日本血吸蟲病簡稱為血吸蟲病。當患有血吸蟲病的人、家畜如牛、豬等，以及野生動物如鼠類等的含有血吸蟲卵的糞便排放或施用至湖澤、江河、溝渠、水田中後，蟲卵遇水很快就孵化出毛蚴，游動於水中，並迅速找到其獨特的中間宿主，即湖北釘螺（*Oncomelania hupensis*），鑽入螺體內發育成為尾蚴。尾蚴從螺體逸出後，浮游於水面，再鑽入其最終宿主體內。這樣，就導致了其最終宿主的血吸蟲感染或血吸蟲病。本世紀初，古病理學家在古埃及第二十王朝時代（前1250年至前1000年）的兩具木乃伊的腎臟內發現了已經鈣化了的埃及血吸蟲卵，人們才得以知悉，19世紀中葉發現的肆虐埃及多年的埃及血吸蟲病的歷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²²⁵無獨有偶，在中國境內於1905年確診出了第一個血吸蟲病例。在50年代末，有人據此宣稱在中國境內血吸蟲病已有約六十年的流行歷史。²²⁶但在此之前，醫學史工作者早已提出了血吸蟲病自三千多年前已經在中國流行的說法。²²⁷到1972年和1975年先後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及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的兩具古尸內都檢出了日本血吸蟲卵，證實了在長江中游兩湖地區血吸蟲病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流行歷史。²²⁸

由於日本血吸蟲對其中間宿主的特異性要求極為嚴格，只有湖北釘螺一種。而湖北釘螺不能在寒冷、乾燥的環境中生存、繁殖，只存活在北緯33度以南的地區。在這條地理分布界線之北，是沒有血吸蟲病的，因此血吸蟲病只流行於淮河

225 Marc Armand Ruffer, *Studies in Paleopathology of Egypt.* pp.18-1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226 見《五年來我國衛生事業大發展》，《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2月號，頁1轉載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

227 見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頁3至4，19至21。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

228 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古屍的肝臟、直腸及乙狀結腸組織中均發現了成堆的日本血吸蟲卵，每堆蟲卵數目從幾個到幾十個不等，最多的可達一百多個。見湖南醫學院主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古屍研究》，頁202至213，288至2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975年在湖北江陵縣鳳凰山168號西漢初期墓出土古屍的肝臟、迴腸末端、乙狀結腸和直腸壁內也發現了成堆的日本血吸蟲卵沈著，並形成蟲卵結節，導致死者生前出現日本血吸蟲性肝硬變。見武忠弼主編，《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墓西漢古屍研究》，頁20至21，162至189，21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以南的南方也不是偶然的。²²⁹ 到50年代末，在醫學工作者的努力下，發現北自淮河南岸的江蘇寶應縣，南到兩廣，西起川、滇，東到浙、台的三百幾十個縣市都有血吸蟲病的流行或有血吸蟲病病例的報導。估計約有近一千萬人的病患，而受到此病威脅的人口可高達約一億人左右。²³⁰ 醫學史工作者在此之前已經瞭解到血吸蟲病在中國境內的廣泛流行，設想這樣一個廣泛流行的疾病在傳統文獻中不可能一點踪影都沒有，他們在龐大的古代醫學資料中極力搜尋，企圖找出能夠確定是關於日本血吸蟲病的記載。大致上在學者之間有下列幾種看法。

范行準先生據傳統醫學中“蠱毒”、“水腫”部門的下血痢、吐血、腹水等記載認為有一些血吸蟲病被劃入了古典醫學的蠱毒和水腫門中去了。他雖然注意到“蠱”有許多不同的意義，也把其中的生殖系統疾病、迷信或巫術等部分和血吸蟲病區分開來，但他在沒有較充分的其他資料的支持下，把代表血吸蟲病的蠱跟殷虛甲骨文中的蠱字和《山海經》中的蠱聯繫了起來，主張在紀元前十五、六世紀時已經發現了這一疾病，並且這種疾病盛行在古中國的西北地區，隨著南方的被征服，北土的人群南侵而向南傳播，到了晉代、南朝時，血吸蟲病在長江流域已相當猖獗，唐宋以降，更蔓延到了福建、嶺南、雲貴地區；而在血吸蟲病南移的同時，北方的地理的變動却使得它在當地失去了立足之地。²³¹ 日本學者宮下三郎也指出南宋楊士瀛《仁齋直指方論·蠱毒·蠱毒方論》：“其候：面目青黃，力乏身痛，唇口乾焦，煩燥而悶，胸脇妨滿，肚脹皮堅，腹中鞕鞕，切痛如蟲齧，

229 按湖北釘螺“孳生地區1月份平均氣溫都在0℃以上，全年降雨量都在750毫米以上。”（《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11。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第2版）1月份平均氣溫0℃的等溫線正在北緯33度左右，我國的“日本血吸蟲病有嚴格的地理分布界線，在北緯33度以北沒有此病，因為日本血吸蟲病的中間宿主釘螺不能在乾燥寒冷的環境裡生存繁殖。沒有釘螺的地區或已消滅了釘螺的地區，就不可能有血吸蟲病流行。”（《中國醫學百科全書·流行病學》），頁4。

230 錢信忠《總結群衆性的學術經驗為迅速消滅五大寄生蟲病而奮鬥》，《人民保健》，1959年第1號，頁3。《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頁2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按本世紀一〇年代日本人曾在台灣濁水溪流域從事調查，但只在牛、羊、狗等動物的糞便中找到血吸蟲卵，而沒有發現血吸蟲病患者。見Kaoru Morishita, Yoshitaka Komiya and Hisakichi Matsubayashi (ed.) *Progress of Medical Parasitology in Japan*, Vol.1 p.197.

231 范行準《有關日本住血吸蟲病的中醫文獻的初步探討》，《中華醫學雜誌》，1954年第11號，頁862。又范氏，前引書，頁3至4，19至21。

又如蟲行，唾吐鮮血，小便淋瀝，大便膿血雜下……”中有許多類似日本血吸蟲病的證候。²³²范行準先生這說法影響相當可觀，有不少的追隨者。例如姜春華先生大抵沿用其說，但在感染的途徑上作了補充，據《肘後方》、《千金要方》所載沙蟲、水毒病的因涉水或入水洗浴而得病，以及感染後的皮膚症狀與受血吸蟲尾蚴侵入後所出現的皮炎症相近似而認為這兩者其實就是血吸蟲病。²³³其後李益三先生從感染途徑、流行地區、疾病症狀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宣稱《肘後方》等醫籍所記載的射工毒、溪（水）毒病就是今日的血吸蟲病。²³⁴蔡景峰先生也表示《肘後方》所記載的中溪毒或水毒、射工等病實際上就是血吸蟲病。贊同這種意見的學者也很多。²³⁵

為了討論的方便起見，現把有關沙蟲、水毒、射工等病的有關文獻摘錄如下。

關於射工，據上文引《漢書》等記載，它有蜮、短狐、短弧、水弩、狐蜮、鬼蜮等名，下列資料顯示，它還有射影、射蜮、水狐等別名。

《詩·小雅·何人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毛傳：“蜮，短狐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卷六《毛詩音義中》：“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孔穎達《正義》：“《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山海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

232 見宮下三郎，前引文，頁131。

233 見所作《祖國醫學對血吸蟲病的認識及其防治方法》一文，《大眾醫學》1956年10月號，頁447至448。

234 見所著《祖國醫學對於血吸蟲病的認識及其治療藥物的探討》，《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7月號，頁13至15。

235 其所撰《肘後備急方的科學成就》（《新醫學雜誌》，1979年1月）一文未見，其中有關血吸蟲病的討論，轉引自薛愚主編《中國藥學史料》頁187附注。持同一意見的相當多，如上引《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古屍研究》（頁288），《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西漢古屍研究》（頁172至173），《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冊（頁226）等。前二者也將“沙蟲”列爲血吸蟲病。

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抒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東漢服虔《春秋左氏傳解》：“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漫漫蜮蜮，故曰灾。禮曰惑君則有。”（《周禮·秋官》序官《蠻氏》賈公彥疏引）

《搜神記》：“漢光武中平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測（按，當作‘得’）也。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

《玄中記》：“水狐者，視其形，蟲也，見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

又唐人撰《郡國志》云：“建州（今福建建甌）夢水有涉虱，又云獨蟲，一名蜮，似龜，射人。所中之處生瘡。”（《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一《江南東道十三·建州·建安縣》）

《抱朴子·登涉》：“或問：‘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溼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蠚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

《肘後方·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江南有射工毒蟲……常在山間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蟲口中橫骨角弩唧以射人形、影則病。其診法：初得或如傷寒，或似中惡，或口不能語，或惡寒熱，四肢拘急，旦可暮劇，困者三日齒間血出，不療即死。”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蠱毒病諸候·射工候》：“初始證候，先寒熱，惡冷，欠欬筋急，頭痛目疼，狀如傷寒，亦如中尸，便不能語，朝旦小蘇，晡

夕輒劇，寒熱悶亂是也。始得之，四日可治，急者七日皆死；後者二七日，遠不過三七日皆死。其毒中人，初未有瘡，但惡風瘡癰寒熱，或如針刺。及其瘡成，初如豆粒黑子，或如火燒，或如蠟蠅尿瘡，皆肉內有空，如大針孔也。其射人中頭面尤急，腰以上去人心近者多死；中人腰以下者小寬，不治亦死。雖不死，皆百日內乃可保瘥。又云瘡有數種，其一種中人瘡正黑如蠟子狀，或周徧悉赤，衣被犯之，如有芒刺痛；其一種作瘡，久即穿陷，或鎮寒熱；其一種如火灸人肉，熛起作瘡，此最疾，數日殺人；其一種突起如石癧狀。俱能殺人，但有遲速耳。大都此病多令人寒熱，欠伸，張口，閉眼。此蟲冬月蟄在土內……”

《肘後方·治卒中沙虱毒方》：“山間水多有沙虱，甚細，略不可見。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蟲在水中著人身，及陰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鑽入皮裏。其診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後，令百節強、疼痛，寒熱，赤上發瘡。此蟲漸入，至骨則殺人。自有山澗浴畢，當以布拭身數徧，以故帛拭之一度乃傅粉之也。”“今東間水無不有此……比見嶺南人初有此者，即以茅葉茗茗刮去……已深者針挑取蟲子，正如疥蟲，著爪上映光方見行動也”。又：“雜用前中溪毒、射工法急救，七日中宜差，不爾則仍變成溪毒。”

郭義恭《廣志》：“沙虱，色赤，大不過蠍，在水中，入人皮中殺人。”（《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

《肘後方·治卒中溪毒方》：“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灑，一名水病。似射工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頭微痛，目注（《諸病源候總論》作“匡”，《外台祕要方》引作“眶”，當據改）疼，心中煩懊，四肢振淅，骨節皆強，筋急，但欲睡。旦醒暮劇，手逆冷。三日則復生蟲食下瘡，不痛不痒……覺得急，當深視下部，若有瘡正赤如截肉者，爲陽毒，最急；若瘡如蠭魚齒者，爲陰毒，猶小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欲知是中水毒，當作數升湯，以小蒜五寸（按當是“升”之誤字），㕮咀，投湯中，莫令大熱，熱即無力。捩去澣淖，適寒溫以浴身，若身體發赤斑文者是也（‘是也’二字據《諸病源候總論》，又《外台祕要方》卷40引《肘後方》補）。”《諸病源候總論》卷二五《水毒候》：“自三吳已東及南諸山郡、山縣有溪源處，有水毒病。春秋輒得，一名中水，一名中溪，一

名中灑，一名水中病，亦名溪溫。令（按：當是“今”之誤）人中溪，以其病與射工診候相似，通呼溪病。其實有異，有瘡是射工，無瘡是溪溫……又云：若有發瘡處，但如黑點，繞邊赤，狀似雞眼，在高處難治，下處易治。無復餘異診。但同覺寒熱、頭痛，腰背急強，手腳冷，欠欬，欲眠，朝瘥暮劇，便判是溪病，不假蒜湯及視下部瘡也。此證者，至困時亦不皆洞利，及齒間出血。惟熱勢猛者，則心腹煩亂，不食而狂語……十餘日至二十餘日則死。”

《廣記》云：“水弩之虫，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²³⁶

據昆蟲學者的考證，蜮實際上就是半翅目田鼈科的昆蟲田鼈（*Belostoma deyrollei Vuill.*）。²³⁷這種昆蟲棲息在池沼等水中，靠捕食小魚、小蟲為生，夜間則出水。當然田鼈是不會含沙（或氣）射人（或人影）而給人們帶來什麼疾病的。

主張上述沙蟲、水毒、射工病是血吸蟲病的一項重要根據是感染的途徑，如“入水”、“入水浴”、“以水澡浴”，以及“水毒”、“中溪”、“水中病”、“溪溫”、“涉虱”等名稱都表明了入水或涉水的活動使人染病，這與血吸蟲病患者因與疫水接觸，水中的血吸蟲尾蚴鑽進皮膚而得病是一致的。但上引資料，又有“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又“沙蟲水陸皆有”“陰天及雨行草中亦著人”等記載，則沙蟲、射工病病人沒有下水或未與疫水接觸，卻也能染病。這又怎麼解釋呢？其實我們認為要說明這點也並不困難。當代醫學工作者的報告說，媒介血吸蟲病的湖北釘螺是一種水陸兩棲的螺類，它們既能浸處在水中，也可以爬行到岸上，附著於稻莖上以及岸邊雜草的葉上，或攀附棲息於水邊淺灘的蘆葦之上。²³⁸在釘螺體中尾蚴大量逸出，水中尾蚴密度極高的情況下，即使在潮溼的洲灘上或沾有露水的河湖岸草地上行走，或采集蘆葦、捆扎、運送濕草，也可以感染血吸蟲病。²³⁹

236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二十二下，《雜虫門·水虫卸弩》引。

237 胡經甫《圖書集成昆蟲名考》，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6期，頁328。1940年，11月。

238 Asa C. Chandler, *Introduction to Human Parasitology*, 4th ed., p.233.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30. 又見小宮義孝，《關於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意見書》，《中華醫學雜誌》，1957年第4號，頁297，徐國清等《血吸蟲病在四川之分布及其流行因素》，《中華醫學雜誌》1957年第7號，頁533。

239 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湖沼地區防治血吸蟲病的經驗》，《人民保健》1960年第2號，頁89。《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19。

其次發病的症狀，如“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粒”，“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漫漫蜮蜮”，又唐孟詵《孟氏必效方》說：“初著有赤點如米。”按《史記·司馬相如傳》所載《上林賦》：“布濩闊澤，延曼太原”，又所載相如言封禪事遺札：“非唯濡之，汎專濩之。”“濩”有流散、流布之意。那麼，服虔之意當是說短狐所射之瘡，就像疥一樣，流布遍身。疥正是粟米粒般的丘疹，引起劇烈瘙痒，可以蔓延於身體大部分的皮膚病。²⁴⁰而在血吸蟲尾蚴侵入皮膚之後所引起的皮炎，正是紅點密布，成為丘疹，大小如綠豆，使患者感到奇癢的症狀。²⁴¹而“身體發赤斑文”則類似尾蚴在人體內引起的過敏性體徵，即蕁麻疹或風疹塊。²⁴²

再則是惡寒、發熱、頭痛等症候，也與急性血吸蟲病的證候相同；加上上述各資料所說的流行地區，在江淮水、南方、南越、嶺南、及在今江蘇、浙江、福建的山區郡縣，也正是在當代血吸蟲病流行區域的範圍之內。因此據而主張沙虱、射工、水毒等病就是今日的急性血吸蟲病，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生搬硬套。

然而，再進一步地分析上列的相關資料，我們就會發現，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當代的醫學病例報告表示恙蟲病（或沙蟲熱）的早期臨床體徵一樣可以出現全身皮膚上散布有大小不等的紅色丘疹或斑疹，而且一樣發癢。同時也有明確的發冷、寒顫、發高熱，頭痛劇烈等症狀，而當代的流行病學資料顯示，浙江、福建、台灣、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南方地區是恙蟲病的主要分布地區。²⁴³

這樣，只憑上述的討論，我們把沙蟲、射工、水毒病判斷為今日的恙蟲病，也不能說是毫無道理。當然，我們還得就感染途徑做出交代來。

按恙蟲病或沙蟲熱又名叢林斑疹傷寒，是由恙蟲立克次體所引起的急性發熱

240 見《中醫大辭典·外科骨傷五官科分冊》，頁166。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

241 江蘇省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等《急性血吸蟲病的臨床觀察（96例）》，《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5號，頁463至464。《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85。鍾惠瀾，前引書，頁896。

242 徐紀法《紹興蘭亭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隊報告》，《中華醫學雜誌》37卷10期，頁872。1951年10月。劉約翰等《急性血吸蟲病》，《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4號，頁336。江蘇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等，前引文，頁464。《血吸蟲病防治手冊》，頁86。

243 《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頁72。鍾惠瀾，前引書，頁380, 1252。

性斑疹傷寒狀傳染病。它是自然疫源性疾病，我國的主要傳染源是田鼠、溝鼠、黃胸鼠、家鼠、食蟲鼠等鼠類；傳染媒介則是以恙蟬（或稱沙蟬），以地里恙蟬和紅恙蟬為主，多為紅色。恙蟬主要孳生在陰暗、潮溼的叢林邊緣、溪溝、江河沿岸的灌木雜草叢生、鼠類活動出沒的場所。當人經過這些潮溼的水邊灌叢草地時，恙蟬的幼蟲因人呼氣中二氧化碳的刺激作用而感覺出有宿主正在接近，於是爬到人身上短期寄生，叮咬吸取人體的組織液及淋巴液，幾天後離開宿主而去。²⁴⁴上列文獻提及“水陸皆有”、“人在岸上，影見水中”，“入水浴”或“以水澡浴”，或涉水。其實我們不應只注意是否入水或在水中，而重要的是在或經過水畔、水邊，即入水或在溪流岸邊取水都得經過濕度較高的岸邊地帶，這樣就提供給恙蟬侵襲的機會而導致疾病。

然則根據同樣的一批資料，我們可以把沙蟲、射工、水毒病看成是現代醫學所說的恙蟲病。而急性血吸蟲病和恙蟲病是絕不容相混的兩種不同的疾病。那麼，這問題該如何解決呢？1955年朱師晦先生從上引《抱朴子》、《肘後方》的沙蟲病的資料中進行了感染途徑、恙蟬的鑑別、“百節強痛、寒熱、赤上發瘡”等臨床症狀、流行地區的檢討，主張“沙蟲”病就是今日的恙蟲病。²⁴⁵朱氏已指出“赤上發瘡”即恙蟲叮咬處發生潰瘍。雖然他沒有、而他所徵引的《肘後方》有關沙蟲的這段文字也不容許他使用“焦痂”這一恙蟲病診斷學上的關鍵語詞，但他的論斷當是不容置疑的。次年康白先生對古代恙蟲病這一課題作了更細緻的討論，就提出了“焦痂”這一診斷恙蟲病所依據的最重要的臨床症狀，雖然他引用的也是《肘後方》的同一段記載。²⁴⁶不過，無論如何“沙蟲”病就是今天的恙蟲病，也就成了大多數學者都普遍接受的看法。

按康氏的論文已提到李時珍把溪毒、射工、沙虱毒三者通稱為“沙病”。但這沒有引發他的注意，他沒有將三者一並探討，只單獨地將沙蟲挑出來進行了鑽研。我們將三者合起來檢討就可以發現這三者大致上是同一種病。據上引葛洪、

244 佐佐學，《恙蟲病及恙蟲之研究》，《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11號，頁1047。鍾惠瀾，前引書，頁380。

245 朱師晦，《我國古代嶺南的恙蟲病》，《中華醫史雜誌》，1955年第4號，頁251至253。

246 康白，《論我國古代在沙蟲熱方面的成就》，《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11號，頁1027至1031。

巢元方的記載，射工病和水毒病有極相近的臨床證狀，都有“寒熱”，“目疼”（或“目眶疼”），“四肢拘急”、“筋急”或“骨節皆強”、“筋急”、“要背急強”，“旦可暮劇”等。其實這些都是恙蟲病的常見臨床症候。目疼或眼眶疼是由於眼球結膜充血造成的；周身疼痛，四肢酸痛，抽搐即“四肢拘急”、“骨節皆強”、“筋急”等徵候；恙蟲病患者體溫可高達39到40攝氏度以上，而下午比上午要高，也就是所謂的“旦可暮劇”；另外患者有疲倦思睡或嗜睡、煩躁不安、恶心，不想進食、譖妄等體徵，即水毒病的“但欲睡”、“欲眠”、“心腹煩亂”、“心中煩懊”、“不食”、“狂語”及射工病的“欠伸”、“閉眼”、“悶亂”等病狀；病患的氣促、心力衰竭、失語或言語不利等臨床表現即射工病的“或似中惡”、“口不能語”等證狀。²⁴⁷

另外孫思邈提到兩個藥方：“五香散，治江南毒氣惡核射工中人暴腫生瘡方”和“野葛膏，治射工惡核卒中惡毒方”。按北周姚僧垣《集驗方》：“惡核病者，肉中忽有核，小者如豆粒，皮中慘痛，左右走，身中壯熱癥惡寒是也。此病卒然如（另本作‘而’）起，有毒入腹殺人。南方多有此患。”按在絲蟲病的急性期內也常出現淋巴結炎症腫大的臨床徵候，發作時疼痛，並有壓痛感，即“肉中忽有核”，“皮中慘痛”；淋巴結節是可以移動的，因此說它會“左右走”。但絲蟲病一般預後尚可。從“有毒入腹殺人”可以判斷“惡核病”不是絲蟲病，而當是恙蟲病。²⁴⁸即“射工惡核”實際上就是恙蟲病的重要病徵之一的淋巴結腫大。“南方多有此患”說明了常見流行的地域在南土。按姚僧垣父菩提，“留心醫藥”，僧垣“年二十四，即傳家業”，為梁武帝所重，“後領太醫正”。其後西魏取荊州，僧垣因隨于謹北入長安。（《周書·藝術·姚僧垣傳》因此他說“南方多有此患”當是有親身聞見經驗為據的。這是射工病即恙蟲病的又一明證。

247 關於由恙蟲立克次體（Rickettsia tsutsugamushi）所引起的恙蟲病〔在英語世界裡的名稱有scrub typhus（叢林斑疹傷寒或草莽斑疹傷寒）、Japanese river fever（日本江河熱）、flood fever（洪水熱）等名〕，其臨床證狀見吳英俊等《海南島的恙蟲病（沙蟲熱）二例報告》，《中華醫學雜誌》，1956年第11號，頁1044至1045。符任才等，《祖國華南的恙蟲病（65例臨床分析報告）》，《中級醫刊》，1957年第12號，頁4至7。《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頁72至73。鍾惠瀾，前引書，頁381至383。

248 按急性血吸蟲病的臨床表現也可以有淋巴結腫大的體徵，但十分罕見；而恙蟲病淋巴結腫大的發生率可高達病例的三分之一。因此“惡核病”當也不是急性血吸蟲病。鍾惠瀾，前引書，頁381, 897。

但更緊要的則是所發的瘡了，巢元方所錄醫書說射工的一種瘡是“正黑如鱉子狀，或周徧悉赤”。按《備急千金要方》卷七六《治三種射工毒方》作“正黑如黛子，皮周邊悉赤”，而《外台祕要方》卷四十引《備急》作：“正如黑子而皮繞四邊突赤”。《千金方》“黛”當是“鱉”之壞字而致誤。而巢元方在《水毒候》裡也提到“發瘡處，但如黑點，繞邊赤，狀似雞眼”。無疑地，這兩種病的瘡正是恙蟲病的“焦痂”。恙蟬叮咬處最初並不引人注意，到潛伏期末，叮咬處出現小紅丘疹，而後形成水泡，中央部位壞死、出血，並結成黑色痴皮，也就是所謂的“焦痂”，焦痂邊緣稍稍隆起，周圍繞有紅暈，界線十分清楚，即所謂的“皮繞四邊突（隆起）赤”。痴皮脫落之後，中央凹陷形成潰瘍。焦痂可見於36.9～98%的恙蟲病人，是診斷本病最具價值的體徵。²⁴⁹ 上文說朱、康兩氏引用的葛洪所述沙蟲病的資料“赤上發瘡”並沒有述及“黑點”、“黑子”或“正黑如鱉子狀”，因此不當據此四字就說是焦痂。但“赤上發瘡”無疑當指沒有焦痂的潰瘍。又《肘後方》說治沙蟲要用治中溪毒、射工的方法來急救，同時說不這樣做，沙蟲病會變成“溪毒”病。這也可以說明沙蟲病就是射工、溪毒病，也就是恙蟲病。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恙蟬的發現，郭義恭和葛洪都指出了它是紅色的，形體極小，“大不過蠟”，或“大如毛髮之端”。要放在指甲上，“映光方見行動”。由於恙蟬在人身上寄生幾天，因此要捉住它，並不是不可能的。

此外，恙蟲病的來勢急，預後不佳，病死率相當高。上引《玄中記》說射工病死者是十之六、七；葛洪說射工病“不十日皆死”，而沙蟲若不挑出，“與射工相似，皆煞人”。這也有助於我們把射工病等視爲恙蟲病。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認爲，古代醫學文獻裡的射工、水毒病，儘管沒有像沙蟲病那樣提出了疾病的傳播者，或提出的是不可靠的傳播者——射工蟲，但把它們看成跟沙蟲病一樣，都是今日的恙蟲病是比較可靠的。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有一些急性血吸蟲病被劃分到水毒、射工病中去的可能性。

由於文獻不足，我們很難確認歷史上的某些人的疾病就是血吸蟲病。曾有學者主張對漢末三分天下局勢的形成具有關鍵性意義的赤壁之戰中，曹操一軍的失

249 《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頁73。

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急性血吸蟲病在曹軍中的流行。²⁵⁰但戰役的時間正處冬季，並非急性血吸蟲病的發病的時間，因此這一說法尚難成立。²⁵¹

古人南行，不只擔憂瘴瘡，對射工、沙蟲也不得不加意提防。上引楚辭《大招》就是較早的一個例證。雖然這是對死者而發，但實際上是現實世界生活的反映。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木簡《雜療方》就記錄了好幾則在“荆南”地區旅行預防蜮射侵襲或祝咀蜮的法術。²⁵²《抱朴子·登涉》篇也是應在東南山區的旅行者想要預防這些疾病感染之求而作的。宋之間《早發大庾嶺》詩就以嶺表“含沙緣澗聚”為憂。²⁵³白居易《送客南遷》詩特別警告這位朋友說：“水蟲能射影”。又《送人貶信州（江西上饒）判官》詩也要他小心“溪畔毒砂藏水弩”。元稹懷疑他病亡的小女兒是在南方遭“沙蟲毒潛嬰”的。（《哭女樊四十韻》）在四川通州時他又擔心“滿身沙蟲無防處”（《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熙寧年間張方平指出殺害華北戰士的南方病害之一就是水弩、沙蟲之類的疾病：“秦、渭馬軍、弓箭手，本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勁騎，有到京師，猶為不服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水多沙毒，草無藁秸。”（《樂全集·論討嶺南利害九事》）而在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披露了在湖南發生過大批戰士因感染“水弩”病死亡的事故：“湖南轉運使言：澧州（湖南澧縣）水南寨地多水弩射人，戍兵歲死者衆，請徙於臺宜林。從之，仍改寨名曰‘臺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二）按恙蟲病的流行特點，雖然多屬散在性，呈點狀分布，少有爆發流行，但當易感人群大批進入疫區時，也可能產生爆發流行。²⁵⁴澧州水南寨戍兵大量病死或許就是這種情況。當然，由於缺乏戍兵病症的記錄，我們也不排除這次的“水弩”病是急性血吸蟲病的可能性，因為考古學上的證據顯示，荆湖一帶自西漢以來，就有血吸蟲病的流行。而當代的調查也

250 李友松，《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病關係之探討》，《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11卷第2期，頁37至38。

251 《中華醫史雜誌》1982年第12卷第3期有三篇論文或札記對李友松的說法提出了討論和批判，分別是初德維《曹操赤壁兵敗與血吸蟲病無關》（頁116），季始榮《對〈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病關係之探討〉一文的商榷》（頁124至125），田樹仁《也談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病之關係》（頁126至128）。

252 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127至129。

253 宋之間《宋之間集》（《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上，葉14至15。

254 見徐恩靈，前引書，頁203。

揭露了荆湖一帶，包括洞庭湖在內的大小湖泊周圍和長江及其支流沿岸居民的感染率非常高，媒介的釘螺數量也十分可觀。²⁵⁵

(三)絲蟲病

在中國境內寄生於人體的絲蟲只有斑氏絲蟲 (*Wuchereria bancrofti*) 和馬來絲蟲 (*Brugia malayi*) 兩種，分別引起斑氏絲蟲病和馬來絲蟲病。前者的主要傳播媒介是致倦庫蚊 (*C. pipiens fatigans* Wiedemann) 和淡色庫蚊 (*C. pipiens pallens* Coquillett)；其當代的分布主要是在山東、河南、蘇、皖、鄂、湘、浙、贛、閩、粵、川、桂、貴、台、滬等地區。馬來絲蟲病則主要由雷氏按蚊嗜人亞種及中華按蚊傳播；據近年的調查，主要流行在湖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四川、廣西、湖南、貴州、上海、江蘇、河南等地區。馬來絲蟲多寄生在四肢的淺部淋巴系統，特別多出現在下肢，所引發的病症是四肢淋巴系統的炎症，產生淋巴結腫大和象皮腫，象皮腫多出現在下肢小腿、足背，見於上肢及生殖器者都很少。班氏絲蟲的成蟲雖也寄生在淺部淋巴系統中，但大多數均寄生於深部淋巴系統，主要在下肢、精索及腰骶部，除了可使患者發生淋巴結、淋巴管發炎，產生淋巴結腫大、下肢（上肢較少見）淋巴液腫以至於象皮腫外，還可產生泌尿生殖系統的病變，如陰囊象皮腫、鞘膜積液與乳糜尿等。²⁵⁶

清光緒年間吳庚生為重刊本趙學敏所輯《串雅》一書作了補註，說：“水腫腳氣一症，即俗稱大腳風、沙木餒是也，水鄉農人多患之。一腫不消，與尋常腳氣發過即消者迥別……病初起必跨間結核而痛，憎寒壯熱，漸而下行至足，即腫脹，木硬，終身不便，誠可憫也。”²⁵⁷學者以為這是傳統醫學文獻中描述絲蟲病最詳細的記錄。²⁵⁸確實這則箋記揭示了常見的發病地區——“水鄉”，正是傳病

255 《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冊，頁228。

256 見中華醫學會，《新中國絲蟲病調查研究的綜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號，頁28至31。史宗俊等編寫《絲蟲病防治手冊》，頁149至152，154至156，頁36至47。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4年。鍾惠瀾，前引書，頁823至824，827至830，843至844。

257 吳平格補註，趙學敏《串雅內編》卷4，《單方·外治門·水腫腳氣》，葉十七。北京，中國書店據上海掃蕪山房1914年石印本影印，1987年。

258 李仁衆，《血絲蟲病在祖國醫學中的記載》，《浙江中醫雜誌》1958年5月號，頁41。按“血絲蟲病”是舊稱，現已不用，只用“絲蟲病”一名。

媒蚊常見的地區；患者的行業——農作，正是暴露於蚊蟲叮咬機會最多的行業；“跨間結核而痛”，即絲蟲病引起的最常見的腹股溝淋巴結發炎腫大、疼痛；“憎寒壯熱”則是絲蟲寄生引起的淋巴系統急性炎症的表現，即突然寒戰，發熱；“漸而下行至足”是指絲蟲病的離心性淋巴管炎，即沿大腿內側淋巴管有一紅線自上而下蔓延；“即腫脹”、“一腫不消”則係由於淋巴管炎長期反復發作，腿部腫脹的消退日漸緩慢，而腿圍亦因而逐漸增粗。淋巴系統因阻塞導致淋巴液長期滯留在皮下組織內，刺激了皮下結締組織增生，使已粗腫的部位日益堅實、出現麻木感，形成了“象皮腫”，即所謂的“木硬”。《詩·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湄）。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柶，爾勇伊何？”毛傳：“骭瘍爲微，腫足爲柶。”鄭玄箋：“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孔穎達疏：“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之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看來這也是一個“水鄉”居民的小腿腫病。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窪坳饒柶矮”。觀察到湖北的低窪地區多病柶的患者。《諸病源候總論·四肢諸病候·足柶候》：“柶病者，自膝以下至踝及趾俱腫直是也……亦言江東諸山縣人多病柶，云彼土有草名其草，人行誤踐觸之，則令病柶。”指出發病較多的地區在江東諸山縣，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當代的調查正顯示馬來絲蟲病主要流行於南方山區、丘陵及長江流域的平原地帶。²⁵⁹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五《佛阿毘曇論》卷下，玄應云：“《爾雅》腫足爲柶。今巴蜀極多此疾。手臂有者，亦呼爲柶也。”²⁶⁰則這種病也常見於四川，不但有下肢腫的情形，也有上肢腫的體徵。巢元方對四肢，特別是下肢的離心性淋巴管炎有更清楚的描述：“膿病者……甚狀赤脈起如編繩，急痛，壯熱。其發於腳者，患從鼠蹊起，至踝，赤如編繩，故謂膿病也；發於臂者，喜腋下起至手也。可即治，取消其潰，洗勝則筋攀也。其著腳若置不治，不消復不潰，其熱歇，氣不散，變作柶腫，緩濬相搏，腫膿已成膿也。”（《諸病源候總論·癰疽病諸候·膿病候》）

在泌尿生殖系統的體徵方面，余雲岫先生已指出，古代醫學記載裡的“癰

259 史宗俊等，前引書，頁158。《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86。

260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28號，740頁，下欄，“柶血”條。

“疝”當包含有陰囊象皮腫在其中。²⁶¹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及《五十二病方》分別記載了“墳(癩)山(疝)”和“膏癰(癰)”、“膏弱(溺)”、“穜(腫)橐”、“積(癩)”、“積(癩)尤”；出土竹簡《天下至道談》也提到“穜(腫)橐”。²⁶²膏癰及膏溺當即乳糜尿，其餘均與陰囊腫大有關。而在《五十二病方》中，腫橐、及癩等方緊接在膏溺方之後；又提到癩者行動需要人“抱”、“挾提”，並稱之為“癩尤”，按《說文解字》十篇下又“尤，越也，曲脛人也。”從尤部的字多表示“行不正”，走路姿式因病而不便利之義，則“癩尤”意謂因癩腫而行走不便。學者據此認為這些病當包含有絲蟲病引起的睪丸腫大症狀在內。²⁶³

《靈樞·刺節真邪》：“岐伯曰……‘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于睪，水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熒然有水，不上不下，鍼石所取，形不可匿，常(裳)不得蔽，故命曰去爪’……”睪丸日漸腫大，排尿困難，俯仰不便，非但不能行走，連衣服都已不能遮掩了。學者指出這是傳統醫學對睪丸鞘膜積液的認識與治療的最早記載。²⁶⁴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十《治水腫方》引陳延之《小品方》說：“四肢腫如皮囊盛水，晃晃如老蠶色，陰卵堅腫如斗。”從“堅腫”來看，當是包括象皮腫在內的病症。²⁶⁵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甲本《陰陽十一脈灸經》云：“厥陰脈……是動則〔病：丈〕夫墳(癩)〔山(疝)〕，婦人則少腹穜(腫)，要(腰)痛〕，不可以仰(仰)”。²⁶⁶《靈樞·經脈》的記載與此大致相同：“肝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癩疝，婦人少腹腫”。金張從正對此頗有發揮，所撰《儒門事親》卷二《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說：“癩疝，其狀陰囊腫絰，如升如

261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釋名病疏》，頁225至227。

262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48至52，164。

263 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附於《五十二病方》之後，見《五十二病方》，頁184。

264 余自漢《我國最早對睪丸鞘膜積液的認識和療法》，《中華醫史雜誌》1988年第18卷3期，頁189。

265 引文據日本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5年刊本。

266 《五十二病方》，頁17。

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溼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又：“殄寇鎮一夫病瘡瘍……水道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于升斗。”透露了江、淮地區的湖沼低濕地帶多見這種病症，這無疑地是絲蟲病引起的症狀。宮下三郎認為陳言《三因極一病症方論》：“陰癩偏大，上攻臍腹疔痛，膚囊腫脹，或生瘡瘍，時出黃水，腰腿沈重，足胫腫滿，行步艱辛”也是絲蟲病的體徵。他並推測“黃水”是乳糜尿。²⁶⁷但我們看來，“黃水”當是鞘膜積液。鞘膜積液一般呈“草黃色”或“琥珀色”。²⁶⁸與“黃水”正相合，而乳糜尿呈乳白色，說成“黃水”是不妥當的。

《五十二病方》所載膏癰和膏溺當是目前所發現的中國傳統醫學文獻中有關乳糜尿的最早的記錄。1972年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出土的漢代醫簡中有“治諸癰”方，其中也有“膏癰（癰）出膏”一證。²⁶⁹《說文解字》四篇下：“膏，肥也。”又：“肪，肥也。”膏即脂肪。晉范汪所撰醫方中有“療五淋方”，據姚僧垣《集驗方》說：“五淋者，石淋、氣淋、膏淋、勞淋、熱淋也……膏淋之爲病，尿似膏白出，少腹膀胱裏急。”（《外台祕要方》卷二十七《諸淋方·五淋方》）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十四《膏淋候》：“膏淋者，淋而有肥，狀似膏，故謂之膏淋。亦曰‘內淋’。此腎虛，不能制於肥液，故與小便俱出也。”按班氏絲蟲病引起的乳糜尿呈乳白色，尿液靜止時，上層浮起膠狀凝塊的脂肪，中層爲乳白色的液體，下層爲沈澱物。由於乳糜尿中脂肪及蛋白質的含量很高，常凝結成塊狀，造成尿道阻塞，排尿困難，引起尿液瀦留，排尿疼痛，即所謂“少腹膀胱裏急”。據此膏溺、膏淋當是絲蟲病所導致的乳糜尿無疑。²⁷⁰

綜上所述，瘧疾、血吸蟲病、恙蟲病、絲蟲病等疾病大體自古以來即較流行於江、淮以南的南方。

267 宮下三郎，前引文，頁130至131。

268 史宗俊等，前引書，頁41。又世界衛生組織編，劉翠珍等譯，《淋巴絲蟲病》，頁23。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

269 甘肅博物館等，《武威漢代醫簡》，“摹本、釋文、注釋”部分，葉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270 史宗俊等，前引書，頁41至44。

五、南方環境、疾病對南行北人的影響

由上所述，自遠古以來，北方的居民對南土疾病較為流行已有相當的認識。在他們的印象裡，南方的水土是不利健康的，南方有許多不見或罕見於北地的致命性的疾病，總之，南土是危險的“炎瘴地”、“瘴癘地”。

南方的居民因而壽命不長，上引《史記》、《漢書》說今長江中下游一帶“丈夫早夭”。唐張謂《長沙風土碑序》：“郡臨江湖，大抵卑溼，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臚之人，鄉無班白之老。談者之過也。”（《方輿勝覽》卷二三）姑不論張謂所駁斥之說是否失實，可以肯定的是人們，特別是北人對湖南懷有一歷時久遠的刻版印象，即當地多下溼之疾，人多不壽。嶠南居民早夭更是人們所熟悉的事。《隋書·地理志下》：“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溼，皆多瘴癘，人尤夭折。”沈佺期《入鬼門關》詩云：“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全唐詩》卷九十七）白居易《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也說：“土民稀白首”。劉禹錫在嶺表時也有《南中書來》詩答嶺北友人之間：“君書問風俗，此地接炎洲，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劉夢得文集·外集》卷八）

因此在北人看來，南土的許多地區都是致命的鬼域，上文述兩廣的“大法場”、“小法場”或“人間生地獄”、“鬼門關”等名稱或“春、循、梅、新，與死爲鄰”之類的諺語十足地反映了這一點。即使在嶺嶠之北，也不乏這類地方。黃山谷謫居黔南，路經峽州時，有《竹枝詞》二首，其一云：“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宋人任淵等注云：“鬼門關在峽州路。”²⁷¹山谷又說“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請三誦，乃得之。”其三云：“命輕人鮀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哭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五）

這樣，北人通常是不樂南行的。例如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三班院以幽州

271 宋人任淵、史容等注《黃山谷詩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60年），頁16。

歸明三班奉職張希正爲賓州（今廣西賓陽）監押，上曰：‘南北風土異宜，此行必非所樂，可改任荆湖北路州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五）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時，有《桐花》詩：“況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熱。”可見即使在長江流域，北人也不見得感到適應；張耒也有《齊安（今湖北黃岡）行》報導自己的親身體驗：“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死生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張右史文集》卷六）嶺外則更難感到安適：“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斜川集》卷五《論海南黎事書》）嶺南州縣甚至成了忌諱，韓愈《順宗實錄》卷五：說韋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²⁷²

因此北人也多不樂官宦於南土，特別是嶺外地區。梅堯臣《送臨江軍監軍李太傅》：“三江卑溼地，北客宦游稀。”《晉書·良吏·吳隱之傳》：“廣州包山帶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當作“吏”）。元稹自注《和樂天送客游嶺南二十韻》云：“南方去京華絕遠，冠冕不到。”據北宋楊億的估計，由中央選派赴嶺南任官的人，“生還者十無二、三”。（《宋朝事實類苑·風俗雜誌·仕宦嶺南》）兩宋之際朱弁《曲洧舊聞》也說：“嶺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說似中州，人則顰蹙，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²⁷³南宋周必大提供了十二世紀後半葉的一個具體地點，即封州（廣東封開）的情形是：“地苦瘴癘，三歲郡官死四十餘人”。（《文忠集》卷三十五《提轄文思院葉君楠墓誌銘》）這些數字所代表的精確意義不容易把握到，但對當時將赴南土任官的人來說，無疑是具有極高的嚇阻力的。

在任命爲南國卑溼、瘴疫地區的地方官、監察官、特使時，辭不之官或設法迴避的情況也不時出現在歷史文獻中。如《宋書·良吏·阮長之傳》：“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溼，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梁書·王亮傳》：“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溼，辭不之官。”《舊唐書·良吏·宋慶禮傳》：“充嶺南採訪使。

272 《韓昌黎文集校注》，頁422。

273 引文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卷四，頁30。

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唐書·宋慶禮傳》則說“使者至，輒苦瘴癘，莫敢往。”又《柳公綽傳》：“出爲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溼，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又按《舊唐書·職官志二》：“其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唐書·選舉志下》：“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唐會要》卷七五“南選”一目，文宗開成五年（840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當道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民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日之弊是北選。臣當管二十五州，唯韶、廣兩州官寮每年吏部選授，道途遙遠，瘴癘交侵。選人若家事任持，身名真實，孰不自負，無由肯來。”則長久以來中央選派到炎瘴之鄉的官員不願接受任命的難題始終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二月也有“所擬寶州錄事參軍孟蠻避遠宦不之任，詣匦自陳”而受到嚴厲處置的事件。（《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七，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七月“己酉殿直、新欽州咄步寨主王素配刺荆南。是寨久闕官……三班以素充選，仍令馳驛赴任。素以地多瘴毒，不欲行，托疾，在道二百餘日，至襄州，又稱病甚，求免。故黜之。”宋仁宗甚至不得不採取行動來對付這些規避者：“詔審官院：京朝官當入西川、廣南、福建路差遣，而用荐舉規避者，委本院執奏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一）北宋劉敞《送楊鬱林（今廣西玉林）序》：“鬱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于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²⁷⁴嶺南的一個郡守沒有人願意就任，還要皇帝特別下詔甄選“奇偉倜儻之士”來充任。由上述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採用制度化的方式來解決嶺表官吏的選授問題是絕對有必要的。

唐代南選制度施行的範圍只限於嶺表、黔中等瘴癘地，而拔擢的對象則係當地的“土人首領”（《唐會要》卷七五“南選”上元三年條），據此可以推測這一制度所以採行的背景，除了少數民族或地方勢力等政治社會因素外，無疑也有風

274 見《公是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十五，葉六。

土氣候、疾病醫藥衛生條件的考慮在內。從宋代的一些措置，我們也看到了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年）閏二月：“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俊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俊擇僞官，因其俗治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十二“詔：舊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峽、廣南官。或有非本土人而願者，聽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天禧四年（1018年）“六月甲申右諫議大夫李應機言：‘嶺南惠州河源、韶州翁源、循州興寧（今廣東河源、曲江南、興寧）錫場、梅州（今廣東梅州）管界縣分，屬嵐瘴多處。其令佐及梅州知州、監押，望並用廣南人充。所冀習其風土。’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五）包拯《請廣南添差職官一》：“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原無職官處，各令置一員，關掌郡事。尋蒙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嶺外遐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員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土人充攝官。”²⁷⁵足見這一問題解決十分不易。有時採取特殊的優待也是必要的：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梓夔路察訪司言：‘瀘州江安、合江縣（今四川江安、合江）深在瘴地，夷漢事多。乞自今知縣並依戎、瀘州通判例酬獎。如無第二任知縣人，候到任三年，與減磨勘三年。’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二）《楊文公談苑》：“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二、三……舊日小郡及州縣官，率用土人攝官莅之，習其水土。後言事者以爲輕遠任，朝廷重違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賜賚。貪冒之徒，多亦願往，雖喪軀不悔也。”（《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一引）又，《宋史·地理志》：“廣南東、西路……大率……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瘴頗甚，許土人領任。”《泊宅編》卷中：“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

封國或封邑在南方的貴族也希望自己家人或封地能夠遷往北方。《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舂陵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零道縣之舂陵鄉……[孫]仁以舂陵地軌下溼，山林毒氣，

275 引文據《包拯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39。

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又《馬援傳》附子《馬防傳》：“防及〔馬〕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

另一方面歷代也因而把南土當成貶斥放逐或流徙尤其是北人的地方。西漢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史記·五宗世家》）反之，由南而北徙則是嘉獎。《漢書·淮南王傳》：“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於濟北以褒之。”有時貶逐到瘴鄉，實際上是處死刑的另一種方式，如梅堯臣《書竄》詩所說的：“立貶嶺外春，速欲爲異物。”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北人又不得不南徙。貶斥放逐或流徙即是其中的一種。逃難避地常常導致成批的大量人口南遷。每當在北方的中央政權崩潰、發生戰爭、劫掠，或塞外異族入侵中原的時節，逃難的南下人口就一波又一波的往南遷移。兩漢末葉，兩晉之際，南北朝時期，晚唐五季，兩宋之間，無不如此。這是讀史者所熟知的事。南遷人口不只是遷移到發展較先進、距離較接近北方的長江流域，也深入到瘴疫流行的嶺嶠之南去安家落戶。例如“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三國志·吳書·士燮傳》）《新五代史·南漢世家》：“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南方因發生戰爭或民變時，也常把大量的北地戰士、民夫引向南土；戍邊、徭役也迫使大量的北土居民不得不南行；沈重的賦役負擔也可以導致大批農民逃亡到南方去，例如東晉時，長江下游的農民逃亡嶺外的就爲數不少，《晉書·庾亮傳》附《庾翼傳》：“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宋史·周湛傳》則提到掠賣人口到嶺南的事：“〔湛〕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另外當然還有因貶謫、任官、遊覽、經商而南行的人口了。²⁷⁶

276 白居易有《送客春遊嶺南》詩，有句云：“須防盜裡蠱，莫愛橐中珍。北與南殊俗，身將貨孰親？嘗聞君子誡：憂道不憂貧”。所送之客看來是一企圖到嶺外做買賣的人。王棗指出有不少商人到嶺表去做生意：“商於此者，以貨出而有厚息”。（《嶺南衛生方》卷上，《指迷方瘴瘡論》）

大量人口的遷移，常因移入者對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的缺乏而導致病疫的流行，造成移民人口的大量死亡。東漢王符《潛夫論·實邊》篇說：“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²⁷⁷雖然他企圖處理的是東漢西北邊區的問題，但他所說的卻是不局限於西北邊疆的普遍情況。對移徙於南土來說，這種情形尤其顯著。北人不但是不樂南行，還更怕南行，上引《論衡·言毒》篇即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李觀《送流人》詩也說：“人情自古怕遷移，更去南方路險巇”。有些路段對南行者而言是有致命的危險性的：“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宋史·凌策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二月“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仕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驥，何以至此？’故條約之。”提出這種彈劾的理由，竟得到皇帝及大臣的同意，並據以制定法令，足以說明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南行至嶺表留處是極其可怕的事。

南行等於前往就死，就像鼂錯所說的那樣：“楊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漢書·鼂錯傳》）《三國志·魏書·郭嘉傳》裴注引《傅子》曰：“太祖……又與〔荀〕彧書：‘……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因此不得已，南行者多作了思想的準備，預先和祖先、親人告別。《後漢書·馬援傳》：“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決。”又《公孫瓊傳》記公孫瓊曾為郡吏，後太守坐事“當徙日南，瓊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蘇軾啟程往海南島之前也作了最壞的打算：“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與王敏仲》尺牘，第十六首）

277 引文據《潛夫論箋校正》（彭鐸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二十四，頁281至282。

出發前或南行之初，也設法張羅醫藥，有時親友也會贈送或指點應備的藥物。上文已提及白居易在江州接獲元八所贈防瘡的藥物。如宋不著撰人《翰苑新書·前集》卷五三，《太守下》：“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又如蘇東坡答章援書：“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川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黨。”（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李綱說自己出入嶺表而能保全性命，就是因為他攜帶了葛洪的《肘後方》前去：“深入循梅瘴癘鄉，煙雲浮動日蒼涼。踰年踏徧嶠南去，賴有仙翁肘後方。”（《梁谿集》卷二十六）

來到南土，則提心吊胆，惟恐舉手投足之間即有所差錯。白居易《送客南遷》詩有句：“客似驚弦雁”，韓愈任陽山縣令時《縣齋讀書》詩：“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都描寫了北人處在南土的心理狀態。南方卑溼，他們穿上特製的鞋子來作防範。《嶺表錄異》：“枹木，其輕如通草。夏月著之，隔卑溼地氣如杉木。今廣州諸郡牧守初到任，檐下皆有油畫枹履。”（《太平御覽》卷二十二《時序部七·夏中》引）嚼檳榔也是禦濕的手段：“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胸中痞滯，故常啖檳榔，日數十口。”（《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引《倦遊雜錄》）

南土多毒草，元稹提醒友人要特別注意，“毒草莫親芟”。（《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當代的調查工作顯示微小按蚊及大劣按蚊均常棲息在草叢或雜草叢、灌木叢間²⁷⁸。十分可能是人們因割草、除草而易於被叮咬感染瘡疾，卻誤以為是受了草毒之害。

對於水，則更須謹慎處置。飲水必須特別小心。陳藏器《本草拾遺》說：“陰地流泉，二月、八月行途之間勿飲之。令人夏發瘴瘡。”（《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五引）即瘴瘡所以感染發病可以由飲水而起。這一看法並非陳藏器個人所獨有的見解。周去非也說：“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今廣西恭城），江水並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嶺外代答·風土門·瘴地》）《夢溪筆談》卷二四：“漳州界有一水，

278 《瘡疾防治手冊》，頁85, 87。

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皆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

²⁷⁹ 又上引《補筆談》也說嶺南“溪澗中水皆有毒”，當地人路行多剖取大竹中水飲用，王彥祖連烹飪都用這種“竹水”。方勺也說“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嘗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捐二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泊宅編》卷中）章傑《嶺表十說》為預防飲水致疾，特別提倡喝開水：“若經烹煎，則非生水。”

過河也得十分留意，必須把握適當的時機。有瘴氣的水面應當避開。《水經·若水注》：“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合校水經注》卷三十六）估計就是行人都儘量避開渡過這處水面的結果。行旅渡河應選擇在津渡水面或岸邊不發瘴氣或少發瘴氣的季節。《若水注》說：“禁水……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又說：“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為傑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指點了瘴害嚴重的危險季節。一般而言，掌握發瘴的時辰是很重要的。元稹《表夏十首》之三：“江瘴炎夏早，蒸騰信難度。”水面在炎夏蒸起瘴霧時，不宜過渡，因此他要友人注意渡水的時刻，應趕在江面霧氣未起之前：“瘴江乘早度。”（《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如要涉水而過，除了上述《雜療方》的那些法術或投石入水等防備射蜮的手段之外，葛洪也為南遊者提供了預防射工、沙蟲之害的藥物：“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和其他的方法。（《抱朴子·登涉》）對長期停留在水畔、常下水或涉水的人，他則建議：“居射工之地，當養鵝，鵝見此物能食之，故鵝辟此物也。”（《齊民要術·養鵝鴨》引《葛洪方》）

梁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上》云：“越州……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高處。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在瘴疾發作最為頻繁的時節遷移處

²⁷⁹ 又，葉適《周鎮伯墓誌銘》：“授漳浦主簿……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腳溪’者，左足未投，右脰已駢黑”。見劉公純等點校，《葉適集》，頁473。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所以免感疾，是從空間上避開疾疫較流行的地區；到了宋代則制定出法令，允許由外地赴嶺表就職的官吏在上任的時間上來避開疾疫最嚴重的季節。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太祖開寶九年（976年）三月“上將西幸……遣〔錢〕倣歸國，上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已注意到京城與浙江的風土有異，及早返回，可以避開炎夏，減少染病的機會。這一體恤的顧慮在真宗在位時終於普遍地霑及到仕宦廣南的外地人身上。《宋史·地理志六》：“廣南東、西路……大率……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宋史·真宗紀二》：景德四年（1007年）“詔嶺南官除赴以時，以避炎瘴。”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五真宗景德四年夏四月癸酉條：“詔嶺南官並於春、夏除授，聽秋、冬赴治，以避炎瘴。”

干欄式的居室是南土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即流行的建築形式。²⁸⁰人們認為這種設計形式有防避瘴疫的功效。《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一《嶺南道·賀州》“風俗”條：“又俗多構木爲巢，以避瘴氣。”又卷一六九《雷州》“風俗”條：“地濱大海，人雜夷獠，多居欄，以避時疫。”南遷北人有時也採用這一小數民族的傳統居室形式，以防瘴害。如《獨醒雜志》卷二：“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

在日常的飲食、生活起居方面，來到南方瘴癘地的外人也必須密切注意。北宋虞策“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方勺評論說：“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獨禦瘴癘而已哉！”（《泊宅編》卷中）確實這首詩成了後世特別是嶺南地區人們在日常飲食生活起居上常見的座右銘。²⁸¹這當然是脫胎自傳統醫學的濃縮的養生、衛生知識。簡鍊的語言使它易於記憶，便於傳誦，它能夠廣泛地流傳當不是偶然的。²⁸²《後

280 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的干欄式房屋遺跡是目前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干欄式建築遺存。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1期，頁39至48，93。

281 章傑，《嶺表十說》之二已改此詩句爲“莫飲卯時酒，莫食申後飯”，並說是“嶺南諺”。（《嶺南衛生方》卷中）。

282 明人鄺露所撰《赤雅》一書抄錄了虞策這首詩，稱之爲“瘴中要訣”，足以說明其便於記憶、傳誦。

漢書·馬援傳》：“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已表明漢人已有在瘴鄉生活需要節欲的看法。北宋劉安世的事蹟也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宋馬永卿編《元城語錄》：“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按：即劉安世對其師司馬光的尊稱）語云：‘北人在煙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²⁸³以通醫理著稱的蘇軾在惠州時《與錢濟明》第四首尺牘也說：“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王堯《指迷方瘴瘧論》說自己在嶠南防瘴“但用修養之法”，其中須遵循的一項就是“重節色欲，以固真氣”。汪南容《治冷熱瘴瘧脈證方論·瘴病後將息法》也指示：“瘴病纔住……可記初發幾日，依前日數，十分畏謹。大率瘴不發後……一、兩月後戒房室事，能戒百日尤好。”（《嶠南衛生方》卷上）釋繼洪《治瘴續說》也要人“避風寒，戒房室”。

上文已表明嶺外多霧，多大霧、濃霧。前引《呂氏春秋·盡數》篇說“大霧”“動精則生害”，是“養生”者必須防範的。王充也指出：“今人行，觸繁霧、蜮氣，無從（縱）、橫、負（背）、鄉（向），皆中傷焉”。（《論衡·難歲》）葛洪所提出的“養生之方”也要人“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抱朴子·極言》）上引《聖濟總錄》也說人“衝煙霧”，“呼吸斯氣，皆成瘴疾”。因此陸路行旅也應盡力避免觸冒、呼吸霧氣。《水經·延江水注》：“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其水注引瀆口石門，空岫陰深，邃間閭密，傾崖上合，恆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無不危心于其下。”報導了當時瘴地行旅避瘴的實際情形。

按《名醫別錄》：“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殺百邪惡毒氣”。《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二五引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昔三人晨行觸霧，一人健，

283 引文據明王崇慶《元城語錄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葉十。按周密《癸辛雜識前集》有“寡欲”一章，云：“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乘崖至撫劍自誓，甚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實際上劉安世南遷之日，司馬光已去世多年，根本沒有行前求教之事。而清褚人穫《堅瓠祕集》卷三《忍欲》一條不察其非，仍沿其誤。

一人病，一人死。健者飲酒，病者食粥，死者空腹。此酒勢辟惡，勝於作食”。²⁸⁴這是醫藥專著第一次提出來酒可以抵禦霧氣的毒害。這一意見得到後世的普遍地信任。前引蘇轍詩云：“山深瘴重多寒勢，老大須將酒自扶”就是一個認為酒可以禦瘴的例子。又，蘇過《冬夜懷諸兄弟》詩：“下床但藥餌，遣瘴煩樽俎。何須薦墮時，方念平生語。”（《斜川集》）也是一例。《宋史·食貨下·酒》：“惟夔、達、開、施、瀘、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這些不施行榷酤或不禁止私釀的地區，除了河東之外，川、閩、廣、湖西都是著名的炎瘴之鄉。梅堯臣以為朝廷不在嶺表施行榷酤，是一種安撫遠民的政策：“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書竄》）所以如此是由於當時流行的看法認為在嶺南等瘴癘之地，酒是不可或缺的禦瘴藥物，因而不宜在這些地區榷酒。北宋梅摯在昭州時曾賦“我愛昭州好”詩十首，中有“千家不禁燒”一句。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七說：“此亦唐人燒春之意。國朝以南方瘴霧，特弛其禁，家自市魯酒。務多而賤售，人以其廉而引滿，不知反以得疾。”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九《潭州奏役稅酒狀》也指出：“……竊聞惟酒之有榷，本朝家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按：當是“浙”之誤字）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貪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酤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閩、廣之比，然其密鄰桂莞，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二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²⁸⁵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元史·世祖紀七》）仍舊承襲了這種見解和政策。

南方卑溼，古人也認為酒可以禦溼或在這樣的環境中用來養生。如上引《史記·袁盎傳》記盎為吳相，其姪袁種對他說：“南方卑溼，君能，日飲。”又，梅

284 《藝文類聚》（汪紹楹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二《天部下·霧》引《博物志》曰：“王肅（《太平御覽》十五作‘爾’）、張衡、馬均昔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云：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雖不一定可靠，但當是陶氏所本。

285 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九。

堯臣《送邵戶曹隨侍之長沙》詩云：“……風土雖卑溼，醇醪可養生。”

然而劉安世則主張瘴地養生必須戒酒：“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概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加以酒，必發大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避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於五臟之間，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元城語錄解》卷上）王棐《指迷方瘴瘧論》也說：“外人之至此者，飲食有節，皆不病。若因酒食之賤而狼餐，必不免於病矣”。釋繼洪《指要方續論》謂：“更有病方作時，便飲大蒜酒數升，謂可避瘴。殊不知惟感冷氣滯及夏月閉汗，或可飲之。若正受熱瘴，加以酒發，百脈熱，蒜發虛陽，是乃以火益火耳。”（《嶺南衛生方》卷上）都不贊成以酒禦瘴，章傑《嶺表十說》之二講得更詳細：“《本草》載三人冒霧晨行，飲酒者獨不病。故北人度嶺，必相勉以飲酒。且遷客羈士往往醺酣以自適。而嶺外弛榷酤之禁，異時酒價尤廉。販夫役卒亦得肆意杯酌，咸謂可以辟瘴。殊不知乃瘴病之源也。何以言之？南土暑溼，嗜酒則多中暑毒；兼瘴瘧之作，率因上膈痰飲；而酒尤能聚痰飲。嶺外諺曰：‘莫飲卯時酒，莫食申後飯’。此誠攝生之要也。然忌夕食者，人所易曉；戒卯時酒，則多以爲疑。蓋嶺南氣候不常，雖盛夏陰雨必寒；雖窮冬日出則燠。一日之間寒燠或屢變。要之，晝多燠，夜多寒。飲酒過度，固非所宜，而卯酒尤甚。方其朝寒而飲，遇暴熱則必爲病也。”

檳榔也是人們相信可以禦寒的一味藥。按在醫書中檳榔用爲藥始見於《名醫別錄》，但述其“除痰癖”，而未直接言其禦瘴之功效。其後各家論其效用，亦復如此。到北宋時才有人明白聲稱檳榔可以除瘴，《清異錄》卷二，《藥·藥譜》：“洗瘴丹：賓（檳）郎（榔）”。²⁸⁶蘇頌《本草圖經》：“嶺南人噉之，以當果實。其俗云：南方地溫，不食此，無以祛瘴癘。”（《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

286 引文據台北新興書局影印《筆記小說大觀》4編，冊三，卷二，葉十。關於《清異錄》作者的問題，可參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18。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

十三引)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檳榔”條也說：“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²⁸⁷

而章傑對此亦持相反的意見：“嶺表之俗，多食檳榔，多者日至十數。夫瘴癥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痰結。而檳榔最能下氣、消食去痰。故人狃於近利，而闔於遠患也……嶠南地熱，食檳榔，故臟氣疏洩，一旦病瘴，當下則虛羸而本不能堪。所以土人多體瘠色黃，豈盡氣候所致？蓋亦檳榔爲患。殆弗思耳。”(《嶺表十論》之一)周去非也不認爲吃檳榔對瘴病有益：“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爲禮……詢之於人，何爲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氣，消食。’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嶺外代答》卷六《食用門·食檳榔》)

此外，陳藏器《本草拾遺》說：“茗、苦棟，寒，破熱氣，除瘴氣……”(《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十三引)因此也有人用茶來防禦瘴害的。例如李綱《飲修仁茶》詩：“北苑龍團久不嘗，修仁茗飲亦甘芳。誇研鬥白工夫拙，辟瘴消煩氣味長……”(《梁谿集》卷二十三)

曾在廣西多處任官的王棐指出在瘴鄉生病“不可全咎於風土，皆不攝不節，有以致之。”從他自述在廣西的養生方法，我們就可以瞭解大致上在飲食生活起居方面該怎麼做：“間自入廣來，但用修養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啖少粥，巳時早食，申時晚食，夜間服消食等藥。時一聚會，少飲不妨，不宜大醉及頻數耳。但天氣不常，一日之間寒暖數變，卻須脫著似時，稍稍失節，亦無深害。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餐油膩，則胸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欲，以固真氣。如此將攝，決可保其無恙也。”

導引行氣是戰國以來養生者所常採行的方術。身處瘴地而以此養生者不乏其人。蘇軾說：“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快，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藥，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

287 近年的實驗表明檳榔鹼不具抗瘧的功效。見唐汝愚等《常山鹼乙與檳榔鹼的抗瘧試驗》，《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年2月號，頁37至39。

鄉，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²⁸⁸蘇軾也透過章援向其父，即貶居雷州的章惇，建議應行氣養生：“丞相知養內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閉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物也。”（《雲麓漫鈔》卷九）

身入瘴鄉，難保不會染疾發病。因此留意醫方也常是南行者的當務之急。既可以藉以保全自身及家人，又可救人濟物。南朝宋顏延之說：“……余祖世已來，務敦藥方。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宋書·顏延之傳》：“出爲始安太守”），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一《序例》上）

唐王燾曾“以婚姻之故，貶守房陵（湖北房縣），量移大寧（山西大寧）郡，提攜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嬰痾，十有六、七，死生契闊，不可問天。賴有經方，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難稱述，遂發憤刊削，庶幾一隅。”（《外台祕要方序》）在今湖北一帶的瘴疫經驗促使他發憤編纂了這部著名的醫方。

《舊唐書·陸贊傳》：“貶贊爲忠州（四川忠縣）別駕……贊在忠州十年……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這也是一個著名的例子。按《唐書·藝文志三》有“韓景晦《古今集驗方》十卷”，自注：“元和刑部郎中，貶道州刺史”。不知這部醫書的纂集是否也有貶處道州這一“炎瘴地”的背景。此外，《外台祕要方》所輯錄治“山瘴瘡方”中有下列幾首：“療瘴瘡常山丸方”自注云：“桂廣州家傳，已用有效”。“麻黃散方……此許仁則五方。元比部云在嶺南服得力大驗。”“《近效》療瘴瘡、孟補闕嶺南將來極效常山丸方”；在療“間日瘡方”中又有“桂廣州法醇醸湯方”。這些都爲我們留下了曾居嶺外的官吏留心醫藥的活動的痕跡。

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唐代開始，出現了針對嶺表地區風土、疾病或南遷北人的特殊需要而編撰、蒐集的地方病醫方專著。《唐書·藝文志之三》所收錄

288 見《蘇軾文集》，卷73，頁2334，《侍其公氣術》。

的有：《嶺南急要方》二卷，李暄《嶺南腳氣論》一卷、又《方》一卷，李繼皋《南行方》三卷，鄭景岫《南中四時攝生論》一卷等數種。按唐人常稱嶺南爲“南中”，《宋史·藝文志六》錄此正作“鄭景岫《廣南四時攝生論》一卷”，二者無疑是同一書。又兩唐書、《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所不載，而蘇頌《本草圖經》及金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均引有“楊炎《南行方》”一書。²⁸⁹按《舊唐書·楊炎傳》，楊炎曾貶爲“道州司馬”，後又貶爲“崖州司馬同正”，而“去崖州百里賜死”。則此醫方若是楊炎所輯，當在謫居道州之時，或自道州返回之後所撰。

鄭樵《通志》卷六九《藝文略》第七《醫方類》第十始專有“嶺南方”一目，除唐志所收各書之外，又有《治嶺南衆疾經效方》一卷。《宋史·藝文志》則又較唐志多出“李璆、張致遠《瘴論》二卷”及“董常《南來保生回車論》一卷”兩種。

王棐在廣南時“嘗觀《嶺南衛生方》乃李待制、張給事所集”（《指迷方瘴瘡論》），則當時已有人將李、張二《瘴瘡論》合刊而名爲“嶺南衛生方”了。今日的《嶺南衛生方》無疑是經過釋繼洪的撰集而成書的，他彙集了王棐、汪南容、章傑及自己所撰的各篇，附於李、張二論之後。釋繼洪所寫各篇，據其自注，多在宋末，因此這書大體上也在當時編成。

據李璆說：“紹興庚戌（按，當作“戊”）年蒼梧瘴癘大作。王及之郎中、張鼎郎中、葛彖承議三家病瘴，悉至滅門。次年余居於彼，復見北客與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勝數……其年余染瘴疾特甚，繼而全家臥疾。”²⁹⁰至於張致遠，他也曾知廣州。（《宋史·張致遠傳》）王棐據其自述，曾到過嶺南多處：“就辟入南……至桂林”，又“始至蒼梧，繼宰柳城，後攝宜陽，今守南容。”（《指迷方瘴瘡論》）按《宋會要輯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記紹興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289 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十二，楮實條引。又《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五，頁155引。

290 見所著《瘴瘡論》（《嶺南衛生方》卷上）。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爲庚戌，次年改元紹興，因此紹興無庚戌年。下一庚戌年爲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宋史·李璆傳》，璆爲政和（1111年至1117年）進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62云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五月“戊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璆卒”。則李璆絕不可能活到光宗紹熙時。李璆所記蒼梧大疫及其居蒼梧之年尚待進一步之考定。

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言……”²⁹¹撰《嶺表十說》者或許即是其人。汪南容與王斐不知是否為同一人，尚待考。²⁹²釋繼洪自記其所撰諸篇的所在地點有柳州、五羊、封川（廣東封開）、熙平郡（廣東連縣），按南宋無熙平郡，而隋代有，繼洪所用當係古名。這樣看來，這醫方的撰輯，都和撰寫者親歷嶺表，自身、家人曾遭瘴癘或親身接觸過許多北來的人和當地人感染瘴疾的經驗有分不開的關係。

宋代頗有些仕宦瘴鄉的外地士大夫在努力改變當地信巫不信醫的風俗的同時，也為醫藥在當地的傳播作出了貢獻。如上述劉彝在知虔州時“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獨醒雜志》卷三）效果如何？按《宋史·劉彝傳》說是“俗遂變”。我們估計這種改造在短期內是不會出現很高的成功率的，但其在傳布有病當用醫藥治療的觀念上當是功不唐捐的。

在嶺南則范旻與陳堯叟的事蹟最為人知。《宋史·范質傳》附子《范旻傳》：“遷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計千人。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宋史·陳堯佐傳》附兄《陳堯叟傳》：“遷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則不但供當地居民採用，也針對南行的過路北人的需要提供了服務。但陳堯叟傳布醫藥於嶺南的努力並不僅止於此。他上言真宗說：“嶺表炎蒸，又多瘴癘，請官給紙墨，寫攝生藥方，散付諸州。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

在這方面邵曄也有不少的貢獻。《獨醒雜志》卷三：“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曄出為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曄始。”按《宋史·邵曄傳》，當時曄任“交趾安撫國信使……”

291 引文據北京，中華書局據北平圖書館影印本重印，1957年。

292 見中醫古籍出版社所出《嶺南衛生方》之《前言》。按《嶺南衛生方》中稱各篇著者均使用其官職，《指迷方瘴癘論》著者王斐自述云：“今守南容”。而釋繼洪《治瘴續說》云：“況汪南容有言：瘴病後調攝又倍於外方之難”與王斐之說：“病後將攝，則比之外方尤難”。幾乎完全相同。《前言》疑二者實係同一人是極有可能的。

駐嶺表”，而非帥廣右。又《真宗紀》言“賜廣南《聖惠方》，歲給錢五萬市藥療病者”。則賜醫方及藥錢又不限於廣西一路。這事在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真宗景德三年二月已經“詔：廣南地多瘴霧之毒。凡軍民有疾者，給官錢市藥瘳治之。”則邵曄也不是官給藥錢治疾者的創意人，但他的建議或請求使這一臨時性的救濟有了常規性的長年經費。另一方面，在此之前，皇帝已將《太平聖惠方》一書賜給過淮南地區的地方官。²⁹³而自這次邵曄要求賜書之後，《聖惠方》及“嶺南方”或“南行方”等醫書也漸流布於各瘴癘之地，則邵曄在這事上曾起過提醒、促進的作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夏四月“己巳賜戎、瀘、富順監《聖惠方》各一部，其地多瘴疫也。”又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八月“丁未，內出鄭景岫《四時攝生論》、陳堯叟所集方一卷示輔臣，上作序，命刊板模印付閣門，賜授任廣南臣僚，仍命分給諸道州軍”。又卷二三七，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辛丑詔：文臣京朝官至幕職、州縣官，武臣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期辭日並罷賜誠勵敕，並《七條》、《攝生論》，其賜《儒行篇》亦罷之。內《攝生論》並藥方，惟廣南州軍各賜一本，與《聖惠方》同頒之。”

《聖濟總錄》卷三七《瘴氣》有“治瘴木香檳榔丸方”，說：“昔人嘗刻石于大庾嶺，蒙效者不可勝數”。²⁹⁴又廣西臨桂劉仙崖摩崖：“按《廣南攝生論》載養氣湯方……皇祐（1049～1053年）、至和（1054～1055年）間，劉君錫以事竄嶺南，至桂州遇劉仲遠先生，口授此方。仲遠是時已百餘歲。君錫服此湯，間關嶺表數年，竟無嵐瘴之患。後還襄陽，壽至九旬。嘗云：‘聞之仲遠曰：“凌晨盥櫛訖，未得議飲食，且先服此湯，可保一日無事。旦旦如此，即終身無疾（？）病

293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一有《謝賜聖惠方表》一文，中云：“陛下之述作，功參化源……豈區區小郡，碌碌下臣能諤頌於聖德歟！當州地居僻左，路遠京師，授敕數年，引頸以日……獲此大賚，謹當抽俸金以市藥，給官本以救人。資聖祚於無疆，流聖惠於不朽。盡納淮甸，歸於華胥……”則本文當作於任職淮畔地方長官時。按《小畜集序》云出守滁州，在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其年十二月又“移知廣陵”，均在淮南，而揚州大邦，不得云“地居僻左”。又《序》文作於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則賜《太平聖惠方》當在守滁州之時，而次年冬，王禹偁徙守蘄州，卒於道。（《宋史》卷293《王禹偁傳》）不及見景德賜書之事。

294 據沈括說，刻石於大庾嶺的是“李校理敦裕”，見《蘇沈良方》，卷三，葉六至七。但稱“十五味”，“五”當為“七”之誤。

矣”。’宣和四年（1122年）上已日朝請郎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晉江呂渭記。”²⁹⁵兩者也都是爲嶺北人南行而備的南行方。

上述這些多是仕官南土的士大夫的有關活動的記錄。在歷史上，南行北人中，當以戰士、戍卒、轉輸民工等爲最多數，然而有關他們的活動的細節，卻罕見報導。他們與南遷的士大夫不同的是，士大夫多因個別的授官任職或貶謫而與家人、婢僕同行，到達後也自擇居室獨住；而士卒、民工則不僅人數衆多，同時還成批的、集體的南下，抵達後，又集中居住、勞動，而生活條件、衛生環境都遠不能與一般士大夫的相比。由於缺乏或沒有免疫力，因此在進入疫區之後，常易引起疾病的暴發流行，造成大量的人員發病、死亡。其情況，已見上文。關於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的安南戰役，《續資治通鑑長編》有不少詳細的記錄。對戰士們的健康、疾病等問題，神宗屢有詔書過問、指揮防治，現摘錄如下：

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病寄留者，令所寄州軍專選官管勾醫治，提點刑獄往來提舉。如能用心醫治，痊損數多，候師還日比較分數，當議優獎。

詔：安南行營軍士如疾病，將官宜親撫視，嚴責醫療，逐將月具平安及疾病死亡人數以聞。

又批：聞安南兵過嶺多疾病，其令宣撫司曉告勿食生、冷，嚴立酒禁。

詔：安南行營兵士以不習水土，多病瘴癘致死，至宜令隨所在州縣，即時依編敕及移牒住營州縣，依廣勇例給孝贈。

上批：安南行至邕州四將下諸軍，九月上旬死病近四、五千人。此乃將、副全不約束，恣令飲食北人所忌之物，以致生疾，可火急嚴誠勵，仍切責醫用藥治之。

詔太醫局合治瘴藥三十種，差使臣齋付安南行營總管司。上批：已差入內供奉官梁從政齋文字往邕州宣撫司，聞將士被疾者極衆，可下醫官院，選習知治瘴者五七人，令從政率領之，乘驛速往。如治療多癒，當不次優賞。

詔：安南行營將士疾病者衆，遣同知禮院王存禱南嶽，遣中使齋香，建祈福道場一月。

295 摩崖拓本見耿鑑庭，《醫藥金石過眼錄》，《中華醫史雜誌》1955年第4號，頁286至287。

又詔：安南諸軍及應募人病死者，常賜外，加賜絹二匹，當得糧食亦併給其家。

次年，六月“丁酉手詔：今歲嶺外大熱，病瘴者多。方屯兵未解，官吏將校在彼者衆，深慮難於醫藥，枉致死傷。醫官院選差醫學三人，賜絹五十匹，遣赴桂州，委趙禹分掣差使。候一年差替，經略司具所愈人數，保明聞奏。”

七月丙子“詔：河東、永興、秦鳳等三路就糧諸軍及漢蕃弓箭手、蕃兵，常經召募赴安南行營，染有瘴癘者，御藥院以安南軍前治瘴藥方下逐路經略司修合，隨病證給賜。”

可以看出最高統治者對南下的戰士們不能算不關切、不加照顧、救治，然而如上所述，這次戰役所動員的軍士、民工三十萬人，“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痺”。李師中所說：“嶺南自古不利戍兵”（《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嘉祐三年九月丙子條）當是確有根據的經驗之談，但不只是戍卒如此，戰士、民工也一樣。

六、結語

自司馬遷《貨殖列傳》以來，在歷史文獻中，對廣大南方的許多地域的描述，一直不斷地重複著“地廣人希”、“無積聚而多貧”、“無千金之家”之類的字句。所以如此，我們認為主要並不是由於後人對前代記錄的因襲，而是有事實依據的。

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南土，特別是五嶺以南的地區，由於氣候炎熱、多雨潮溼，為衆多的疾疫病原或傳病媒介生物提供了適宜的孳長、繁殖、活動的環境。而居住在其中的南土人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醫藥衛生條件等因素正為各種疾病對人們的侵害製造了大量的機會。這導致南方相對地比北土流行著較多的疾病；或同一種疾病，在南土流行的程度常比北方要嚴重得多。而在生產勞動或日常生活中，廣大的農民最常暴露在各種致病因素的威脅之下，因此文獻紀錄中所說的南方“丈夫早夭”、男子“半羸長病”，“不耐作苦”等，並不是偶然的，這也是長久以來南方相對地比較貧窮落後的重要原因。由北方南遷

的農民，自然可以增補南方農業的生產勞動力，有助於南於的墾殖發展。但是他們也必須面對南方那不可完全避免的染病致疾、甚至死亡的危險。明末徐霞客在雲南西部所採訪到的一則消息，對於瞭解南土長期而緩慢的進展是頗有幫助的：“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是塢南北二坳，北都魯，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僰彝、儼儼居之，漢人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即‘發擺’，寒戰頭痛也（按：當即瘧疾或打擺子），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徐霞客遊記》卷十上，《滇遊日記十二》）

北方人由於較缺乏或不具免疫力，下行南國，就難免感染發病，甚至死亡。這不但造成北地居民不願意、並恐懼南行的心理，也給歷代政權在統治南方的工作中帶來了許多問題，導致困擾、不便、損失、挫敗和大量的生命犧牲。例如由於北人不樂南遷或仕宦於南土，導致南方的炎瘴地區大量職位長期無人擔任，雖然優厚其待遇，也常無法補足；另一方面因而願往任官南方的人素質常較差或多或少不能廉潔；或不得不任用“習其水土”或有免疫力的“土人”來任官，形成特別的“南選”制。這樣就難免影響到行政的效率和吏治政風。

生活衛生及醫藥條件的嚴重不足以及瘴疾的流行，不但使南遷的戰士、戍卒、民夫大量的疾疫、死亡，使得戰鬥力大為減弱，軍事行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對外不能有效地、徹底地對付入侵生事的外族或國家；對內也常無力解決叛變的少數民族或暴動、劫略的民衆。如《宋史·兵志十》：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往彼屯守，多緣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知山川道里、林壑曲折，故盜不能禁。”又李綱《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說：“虔之諸縣多是瘴煙之地”，而“盜賊”所處的“巢穴深遠，山多瘴癘，官兵憚於窮討”。（《梁谿集》卷一百七）西漢元帝時棄珠崖的重要考慮也是當地“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漢書·賈捐之傳》）這樣，使得統治者在處理南土的外來入侵或境內的民變、少數民族叛變等問題上常傾向於採取以夷制夷、招安等策略。例如東漢順帝時交趾、九真二郡兵士反叛，“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當時李固駁斥衆議，他所提出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者十必四、五”。他並建議“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在唐宋時代也有許多人建議，就像在瘴區選用習其水土的土人來出任當地地方官那樣，徵調與瘴鄉風土氣候類似的鄰近地區的人民，或當地的土人或少數民族來充當戍卒。例如《唐書·楊收傳》：“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宋包拯《論蠻賊事二》也不贊同朝廷“差撥禁軍”赴嶺南討蠻，他說：“緣北人乍到，不諳風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起兵進討。況虔、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使臣往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近應副，事體至便”。²⁹⁶上引張方平《論討嶺南利害九事》也說應將秦渭馬軍、弓箭手”自嶺外撤回，而“使荆湖多募壯丁，蒐補諸土軍，其將士服習土風，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止用南馬”。而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確實曾“詔：頃以東兵戍嶺南，冒犯瘴癘，得還者十無五、六。自今歲滿，以江、淮教閱、忠節、威果代之。”（《宋史·兵志十》）上述李師中說自古嶺南不利戍兵，他因而建議“置土丁”。蘇過《論海南黎事書》指出當時有“朱崖屯師千人”，他也主張“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耐其風土瘴癘”。（《斜川集》卷五）張田知桂州時確曾以“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宋史》卷三百三十三《張田傳》）《宋史·兵志五》：“熙寧中，王安石言：‘……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南方，多死，害於仁政’……於是蘇緘請訓練二廣峒丁。……〔元豐六年〕提點廣西路刑獄彭次雲言：‘邕苦瘴癘，請量留兵更戍，餘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給禁軍錢糧。’詔許彥先度之。彥先等言：‘若盡以代正兵，恐妨農。請計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輪二千赴邕州肄習武事。’從之。大觀二年（1108年）詔：‘熙寧團集左、右江峒丁十餘萬衆，自廣以西賴以防守’。”宣和七年詔：“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健勇輕捷者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擒捕（嶺南盜賊）。令樞密院行之。”（同上）這樣就使邊防以及兵役制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國家財政制度上也受到南土瘴疾的影響，即上述南土邊區不行酒榷的制度。

總之，南土的上述政治、軍事、財政制度或措施的歧異以及南方居民與北人

296 《包拯集》，頁127。

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

相較之下大相逕庭的若干生活習俗，都反映了南方自然環境、醫藥衛生條件對南方發展的深刻影響。在南方緩慢的發展過程中，人為的努力也能使衛生環境得到局部的改進，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秋七月甲寅條所載：“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廣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李〕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爲田正，復科役。於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按在農業墾殖生產活動中，填平水坑、溼地；或平整田地以利灌溉和排水，可以減少灌溉餘水或雨水瀦積而形成的淺水溼地，這樣就減少了媒瘧按蚊的孳生地。砍伐林木、灌叢、清除茅菅雜草，可以使大劣按蚊賴以生存的環境受到破壞。這樣就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瘴瘧的傳播。²⁹⁷然而在另一方面，農田水利灌溉的建設，水田面積的擴大，卻又能增加蚊蟲孳長的空間，擴大瘧區的範圍。因此在古代的科學技術水平之下，衛生條件的改進總是相當緩慢的。

（本文於八十年八月十五日通過刊登）

297 《瘧疾防治手冊》，頁134。